

QINHEFENGYUN

HONGDAOYIA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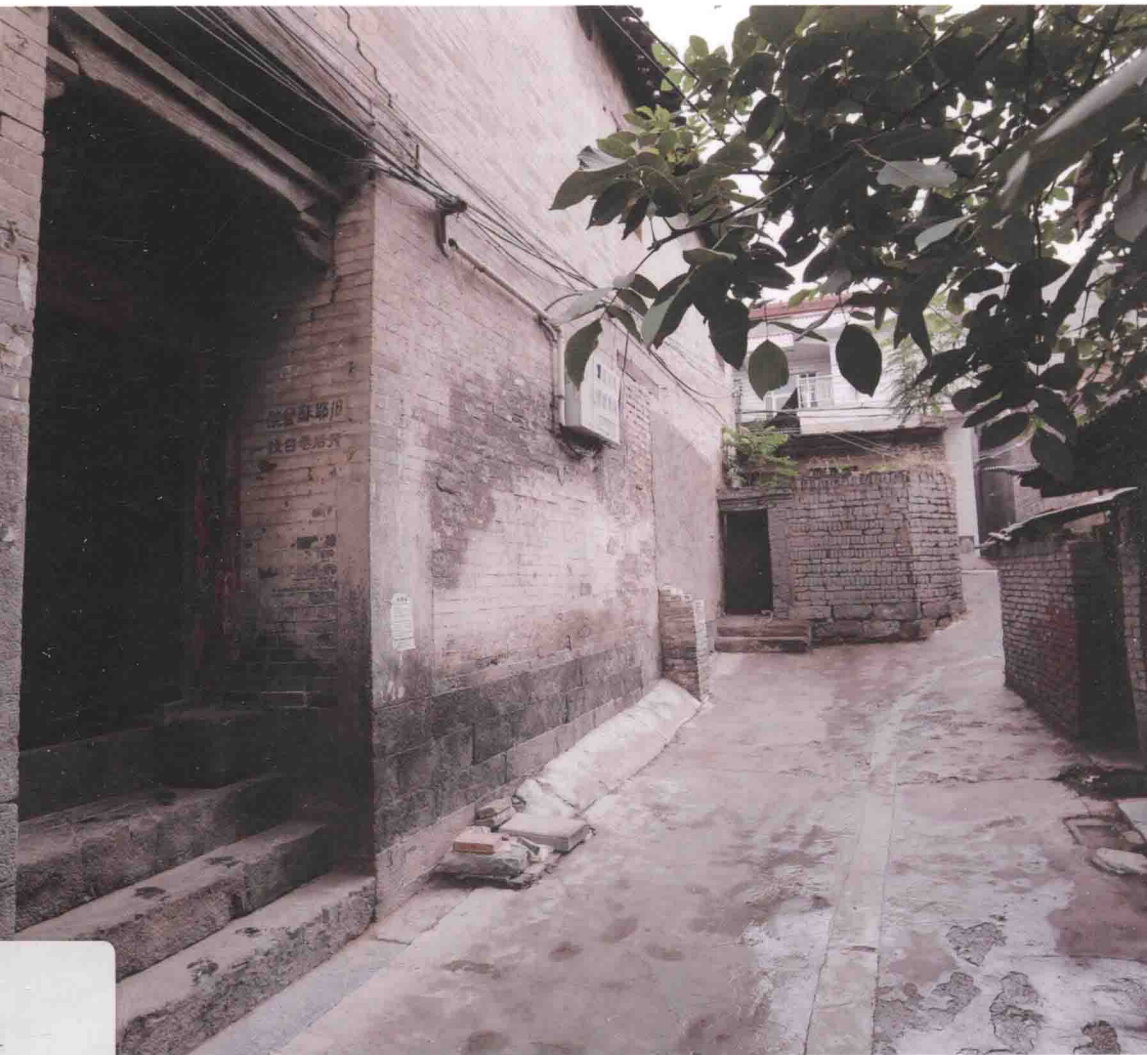
沁河风韵系列丛书

主编 | 行 龙

# 弘道遗爱

## 来华英国女传教士艾伟德传

赵中亚 | 著



QINHEFENGYUN

沁河风韵系列丛书

HONGDAOYIAI

主编 | 行 龙

# 弘道遗爱

来华英国女传教士艾伟德传

赵中亚 | 著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弘道遗爱: 来华英国女传教士艾伟德传 / 赵中亚著. —太原: 山西人民出版社, 2016. 6

(沁河风韵系列丛书 / 行龙主编)

ISBN 978 - 7 - 203 - 09612 - 2

I. ①弘… II. ①赵… III. ①艾伟德, G. (1902 ~ 1970) - 传记 IV. ①B979. 956. 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103629 号

### 弘道遗爱: 来华英国女传教士艾伟德传

---

丛书主编: 行 龙

著 者: 赵中亚

责任编辑: 王新斐

---

出 版 者: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山西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太原市建设南路 21 号

邮 编: 030012

发行营销: 0351—4922220 4955996 4956039 4922127 (传真)

天猫官网: <http://sxrmcbs.tmall.com> 电话: 0351—4922159

E - mail: [sxsccb@163.com](mailto:sxsccb@163.com) 发行部

[sxsccb@126.com](mailto:sxsccb@126.com) 总编室

网 址: [www.sxsccb.com](http://www.sxsccb.com)

---

经 销 者: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山西人民出版社

承 印 者: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山西新华印业有限公司

---

开 本: 720mm × 1010mm 1/16

印 张: 14

字 数: 250 千字

印 数: 1 - 1600 册

版 次: 2016 年 6 月 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6 月 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203 - 09612 - 2

定 价: 45.00 元

---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风韵是那前代流传至今的风尚和韵致。

沁河是山西的一条母亲河。

沁河流域有其特有的风尚和韵致，

那悠久而深厚的历史文化传统至今依然风韵犹存。

这里是中华传统文明的孵化地，

这里是草原文化与中原文化交流的过渡带，

这里有闻名于世的北方城堡，

这里有相当丰厚的煤铁资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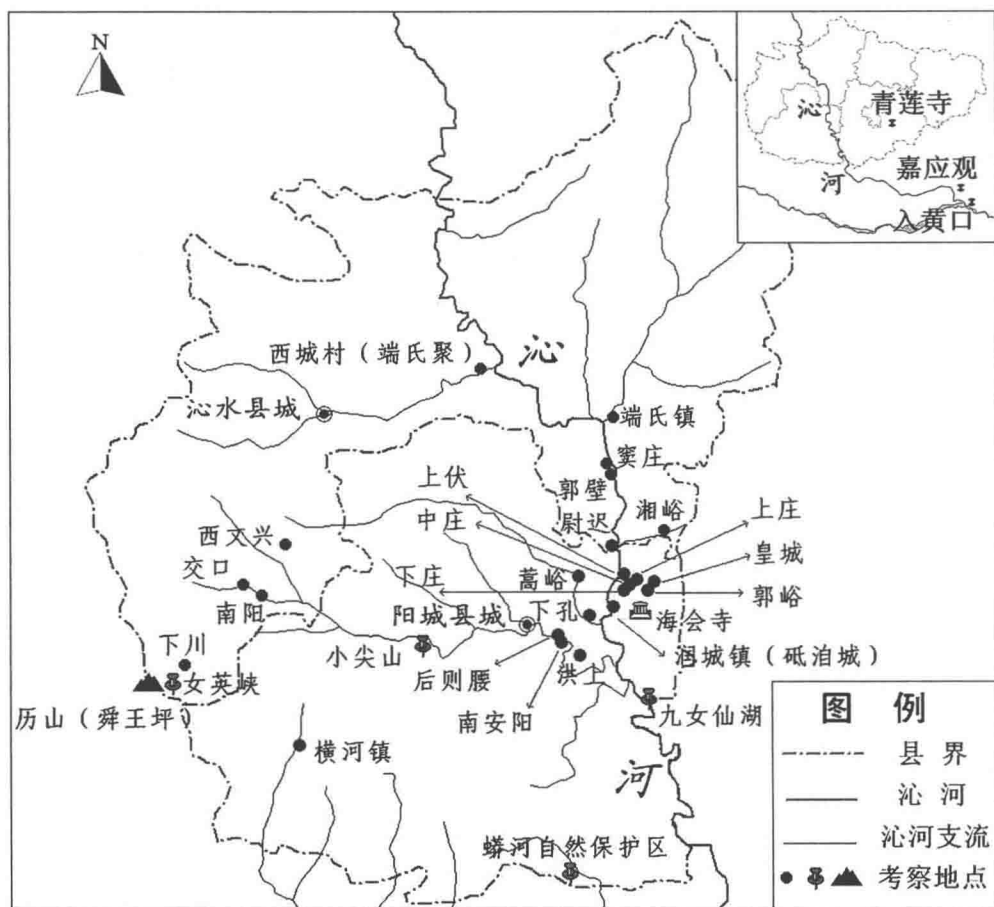
这里有山水环绕的地理环境，

这里更有那独特而深厚的历史文化风貌。

由此，我们组成“沁河风韵”学术工作坊，

由此，我们从校园和图书馆走向田野与社会，

走向风光无限、风韵犹存的沁河流域。



“沁河风韵学术工作坊”集体考察地点一览表（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 李嘎绘制）

三晋文化传承与保护协同创新中心

# 沁河风韵学术工作坊

一个多学科融合的平台  
一个众教授聚首的场域

第一场

鸣锣开张：

走向沁河流域

主讲人：行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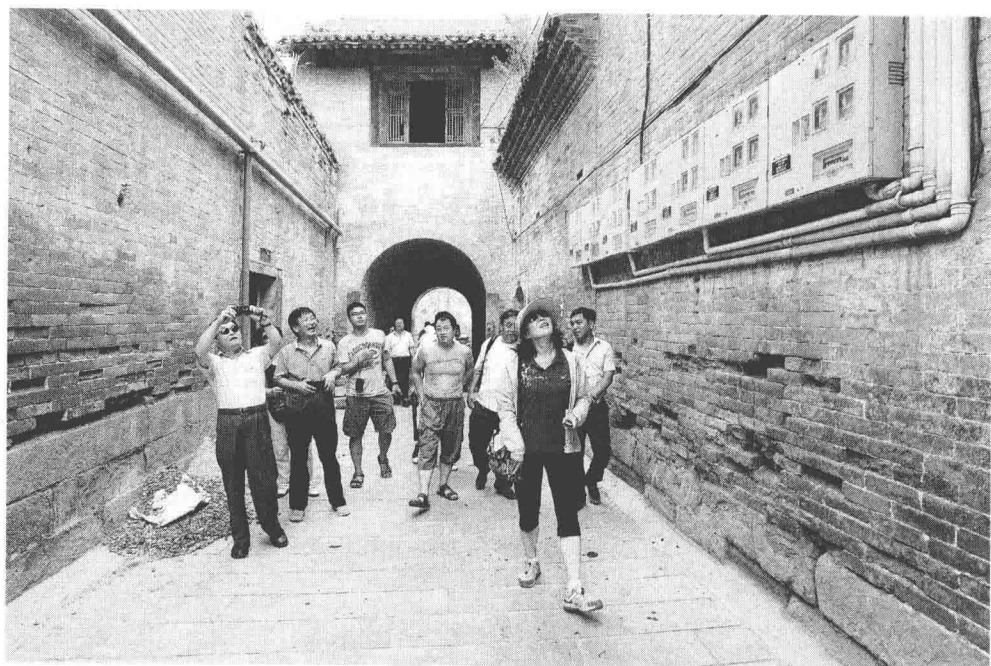
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 教授

时间：2014年6月20日 晚 7:30

地点：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晋知楼）

“沁河风韵学术工作坊”海报





田野考察



会议讨论

# 总序

行 龙

“沁河风韵”系列丛书就要付梓了。我作为这套丛书的作者之一，同时作为这个团队的一分子，乐意受诸位作者之托写下一点感想，权且充序，既就教于作者诸位，也就教于读者大众。

“沁河风韵”是一套31本的系列丛书，又是一个学术团队的集体成果。31本著作，一律聚焦沁河流域，涉及历史、文化、政治、经济、生态、旅游、城镇、教育、灾害、民俗、考古、方言、艺术、体育等多方面，林林总总，蔚为大观。可以说，这是迄今有关沁河流域学术研究最具规模的成果展现，也是一次集中多学科专家学者比肩而事、“协同创新”的具体实践。

说到“协同创新”，是要费一点笔墨的。带有学究式的“协同创新”概念大意是这样：协同创新是创新资源和要素的有效汇聚，通过突破创新主体间的壁垒，充分释放彼此间人才、信息、技术等创新活力而实现深度合作。用我的话来说，就是大家集中精力干一件事情。教育部2011年《高等学校创新能力提升计划》（简称“2011计划”）提出，要探索适应于不同需求的协同创新模式，营造有利于协同创新的环境和氛围。具体做法上又提出“四个面向”：面向科学前沿、面向文化传承、面向行业产业、面向区域发展。

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2014年春天，山西大学成立了“八大协同创新中心”，其中一个是由我主持的“三晋文化传承与保护协同创新中心”。在2013年11月山西大学与晋城市人民政府签署战略合作协议的基础上，在

征求校内外多位专家学者意见的基础上，我们提出了集中校内外多学科同仁对沁河流域进行集体考察研究的计划，“沁河风韵学术工作坊”由此诞生。

风韵是那前代流传至今的风尚和韵致。词有流风余韵，风韵犹存。

沁河是山西境内仅次于汾河的第二条大河，也是山西的一条母亲河。沁河流域有其特有的风尚和韵致：这里是中华传统文明的孵化器；这里是草原文化与中原文化交流的过渡带；这里有闻名于世的“北方城堡”；这里有相当丰厚的煤铁资源；这里有山水环绕的地理环境；这里更有那独特而丰厚的历史文化风貌。

横穿山西中部盆地的汾河流域以晋商大院那样的符号已为世人所熟识，太行山间的沁河流域却似乎是“养在深闺人不识”。与时俱进，与日俱新，沁河流域在滚滚前行的社会大潮中也在波涛翻涌。由此，我们注目沁河流域，我们走向沁河流域。

以“学术工作坊”的形式对沁河流域进行考察和研究，是由我自以为是、擅作主张提出来的。2014年6月20日，一个周五的晚上，我在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学术报告厅作了题为“鸣锣开张：走向沁河流域”的报告。在事先张贴的海报上，我特意提醒在左上角印上两行小字“一个多学科融合的平台，一个众教授聚首的场域”，其实就是工作坊的运行模式。

“工作坊”（workshop）是一个来自西方的概念，用中国话来讲就是我们传统上的“手工业作坊”。一个多人参与的场域和过程，大家在这个场域和过程中互相对话沟通，共同思考，调查分析，也就是众人的集体研究。工作坊最可借鉴的是三个依次递进的操作模式：首先是共同分享基本资料。通过这样一个分享，大家有了共同的话题和话语可供讨论，进而凝聚共识；其次是小组提案设计。就是分专题进行讨论，参与者和专业工作者互相交流意见；最后是全体表达意见。就是大家一起讨论即将发表的成果，将个体和小组的意见提交到更大的平台上进行交流。在6月20日的报告中，“学术工作坊”的操作模式得到与会诸位学者的首肯，同时我简单

介绍了为什么是“沁河流域”，为什么是沁河流域中游沁水—阳城段，沁水—阳城段有什么特征等问题，既是一个“抛砖引玉”，又是一个“鸣锣开张”。

在集体走进沁河流域之前，我们特别强调做足案头工作，就是希望大家首先从文献中了解和认识沁河流域，结合自己的专业特长初步确定选题，以便在下一步的田野工作中尽量做到有的放矢。为此，我们专门请校图书馆的同志将馆藏有关沁河流域的文献集中在一个小区域，意在大家“共同分享基本资料”，诸位开始埋头找文献、读资料，校图书馆和各院系及研究所的资料室里，出现了工作坊同人伏案苦读和沉思的身影。我们还特意邀请对沁河流域素有研究的资深专家、文学院沁水籍教授田同旭作了题为“沁水古村落漫谈”的学术报告；邀请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阳城籍教授张俊峰作了题为“阳城古村落历史文化刍议”的报告。经过这样一个40天左右“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的过程，诸位都有了一种“才下眉头，又上心头”的感觉。

2014年7月29日，正值学校放暑假的时机，也是酷暑已经来临的时节，山西大学“沁河风韵学术工作坊”一行30多人开赴晋城市，下午在参加晋城市主持的简短的学术考察活动启动仪式后，又马不停蹄地赶赴沁水县，开始了为期10余天的集体田野考察活动。

“赤日炎炎似火烧，野田禾稻半枯焦。”虽是酷暑难耐的伏天，但“沁河风韵学术工作坊”的同人还是带着如火的热情走进了沁河流域。脑子里装满了沁河流域的有关信息，迈着大步行走在风光无限的沁河流域，图书馆文献中的文字被田野考察的实情实景顿时激活，大家普遍感到这次集体田野考察的重要和必要。从沁河流域的“北方城堡”窦庄、郭壁、湘峪、皇城、郭峪、砥洎城，到富有沁河流域区域特色的普通村庄下川、南阳、尉迟、三庄、下孔、洪上、后则腰；从沁水县城、阳城县城、古侯国国都端氏城，到山水秀丽的历山风景区、人才辈出的海会寺、香火缭绕的小尖山、气势壮阔的沁河入黄处；从舜帝庙、成汤庙、关帝庙、真武庙、



河神庙，到土窑洞、石屋、四合院、十三院；从植桑、养蚕、缫丝、抄纸、制铁，到习俗、传说、方言、生态、旅游、壁画、建筑、武备；沁河流域的城镇乡村，桩桩件件，几乎都成为工作坊的同人们入眼入心、切磋讨论的对象。大家忘记了炎热，忘记了疲劳，忘记了口渴，忘记了腿酸，看到的只是沁河流域的历史与现实，想到的只是沁河流域的文献与田野。我真的被大家的工作热情所感染，60多岁的张明远、上官铁梁教授一点不让年轻人，他们一天也没有掉队；沁水县沁河文化研究会的王扎根老先生，不顾年老腿疾，一路为大家讲解，一次也没有落下；女同志们各个被伏天的热火烤脱了一层皮；年轻一点的小伙子们则争着帮同伴拎东西；摄影师麻林森和戴师傅在每次考察结束时总会“姗姗来迟”，因为他们不仅有拍不完的实景，还要拖着重重的器材！多少同人吃上“藿香正气胶囊”也难逃中暑，我也不幸“中招”，最严重的是8月5日晚宿横河镇，次日起床后竟然嗓子痛得说不出话来。

何止是“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不停地奔走，不停地转换驻地，夜间大家仍然在进行着小组讨论和交流，似乎是生怕白天的考察收获被炙热的夏夜掠走。8月6日、7日两个晚上，从7点30分到10点多，我们又集中进行了两次带有田野考察总结性质的学术讨论会。

8月8日，满载着田野考察的收获和喜悦，“沁河风韵学术工作坊”的同人们一起回到山西大学。

10余天的田野考察既是一次集中的亲身体验，又是小组交流和“小组提案设计”的过程。为了及时推进工作进度，在山西大学新学期到来之际，8月24日，我们召开了“沁河风韵学术工作坊”选题讨论会，各位同人从不同角度对各选题进行了讨论交流，深化了对相关问题的认识，细化了具体的研究计划。我在讨论会上还就丛书的成书体例和整体风格谈了自己的想法，诸位心领神会，更加心中有数。

与此同时，相关的学术报告和分散的田野工作仍在持续进行着。为了弥补集体考察时因天气原因未能到达沁河源头的缺憾，长期关注沁河上游

生态环境的上官铁梁教授及其小组专门为大家作了一场题为“沁河源头话沧桑”的学术报告。自8月27日到9月18日，我们又特意邀请三位曾被聘任为山西大学特聘教授的地方专家就沁河流域的历史文化作报告：阳城县地方志办公室主任王家胜讲“沁河流域阳城段的文化密码”；沁水县沁河文化研究会副会长王扎根讲“沁河文化研究会对沁水古村落的调查研究”；晋城市文联副主席谢红俭讲“沁河古堡和沁河文化探讨”。三位地方专家对沁河流域历史文化作了如数家珍般的讲解，他们对生于斯、长于斯、情系于斯的沁河流域的心灵体认，进一步拓宽了各选题的研究视野，同时也加深了相互之间的学术交流。

这个阶段的田野工作仍然在持续进行着，只不过由集体的考察转换为小组的或个人的考察。上官铁梁先生带领其团队先后七次对沁河流域的生态环境进行了系统考察；美术学院张明远教授带领其小组两赴沁河流域，对十座以上的庙宇壁画进行了细致考察；体育学院李金龙教授两次带领其小组到晋城市体育局、武术协会、老年体协、门球协会等单位 and 古城堡实地走访；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董江爱教授带领其小组到郭峪和皇城进行深度访谈；文学院卫才华教授三次带领多位学生赶去参加“太行书会”曲艺邀请赛，观看演出，实地采访鼓书艺人；历史文化学院周亚博士两次到晋城市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搜集有关蚕桑业的资料；考古专业的年轻博士刘辉带领学生走进后则腰、东关村、韩洪村等瓷窑遗址；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人类学博士郭永平三次实地考察沁河流域民间信仰；文学院民俗学博士郭俊红三次实地考察成汤信仰；文学院方言研究教授史秀菊第一次带领学生前往沁河流域，即进行了20天的方言调查，第二次干脆将端氏镇76岁的王小能请到山西大学，进行了连续10天的语音词汇核实和民间文化语料的采集；直到2015年的11月份，摄影师麻林森还在沁河流域进行着实地实景的拍摄，如此等等，循环往复，从沁河流域到山西大学，从田野考察到文献理解，工作坊的同人们各自辛勤劳作，乐在其中。正所谓“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

2015年5月初，山西人民出版社的同志开始参与“沁河风韵系列丛

书”的有关讨论会，工作坊陆续邀请有关作者报告自己的写作进度，一面进行着有关书稿的学术讨论，一面逐渐完善丛书的结构和体例，完成了工作坊第三阶段“全体表达意见”的规定程序。

“沁河风韵学术工作坊”是一个集多学科专家学者于一体的学术研究团队，也是一个多学科交流融合的学术平台。按照山西大学现有的学院与研究所（中心）计，成员遍布文学院、历史文化学院、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育学院、体育学院、美术学院、环境与资源学院、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城乡发展研究院、体育研究所、方言研究所等十几个单位。按照学科来计，包括文学、史学、政治、管理、教育、体育、美术、生态、旅游、民俗、方言、摄影、考古等十多个学科。有同人如此议论说，这可能是山西大学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真正的一次学科交流与融合，应当在山西大学的校史上写上一笔。以我对山大校史的有限研究而言，这话并未言过其实。值得提到的是，工作坊同人之间的互相交流，不仅使大家取长补短，而且使青年学者的学术水平得以提升，他们就“沁河风韵”发表了重要的研究成果，甚至以此申请到国家社科基金的项目。

“沁河风韵学术工作坊”是一次文献研究与田野考察相结合的学术实践，是图书馆和校园里的知识分子走向田野与社会的一次身心体验，也可以说是我们服务社会，服务民众，脚踏实地，乐此不疲的亲尝亲试。粗略统计，自2014年7月29日“集体考察”以来，工作坊集体或分课题组对沁河流域170多个田野点进行了考察，累计有2000余人次参加了田野考察。

沁河流域那特有的风尚和韵致，那悠久而深厚的历史文化传统吸引着 我们。奔腾向前的社会洪流，如火如荼的现实生活在召唤着我们。中华民族绵长的文化根基并不在我们蜗居的城市，而在那广阔无垠的城镇乡村。知识分子首先应该是文化先觉的认识者和实践者，知识的种子和花朵只有 回落大地才有可能生根发芽，绚丽多彩。这就是“沁河风韵学术工作坊” 同人们的一个共识，也是我们经此实践发出的心灵呼声。

“沁河风韵系列丛书”是集体合作的成果。虽然各书具体署名，“文责自负”，也难说都能达到最初设计的“兼具学术性与通俗性”的写作要求，但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每位作者都为此付出了艰辛的劳作，每一本书的成稿都得到了诸多方面的帮助：晋城市人民政府、沁水县人民政府、阳城县人民政府给予本次合作高度重视；我们特意聘请的六位地方专家田澍中、谢红俭、王扎根、王家胜、姚剑、乔欣，特别是王扎根和王家胜同志在田野考察和资料搜集方面提供了不厌其烦的帮助；田澍中、谢红俭、王家胜三位专家的三本著述，为本丛书增色不少；难以数计的提供口述、接受采访、填写问卷，甚至嘘寒问暖的沁河流域的单位和普通民众付出的辛劳；田同旭教授的学术指导；张俊峰、吴斗庆同志组织协调的辛勤工作；成书过程中参考引用的各位著述作者的基本工作；山西人民出版社对本丛书出版工作的大力支持，都是我们深以为谢的。



# 引 言

1807年，英国传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ison，1782—1834）来华，开启了西方基督教新教传教士来华传教的事业。此后百余年里，数以千计来自西方各国的传教士来到中国，引领了中西间的文化交流，并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他们不仅建立了教堂，还创办了大量的学校、医院、出版、社会福利等机构，将西方宗教、政治、科技、文化、教育、医学等近代知识引入中国，同时借由书信、报告、日记、回忆录，乃至传记、报刊等著述形式，将其在华的所见所闻介绍给西方的读者，促进了西方对中国的认识。

但是，中国民众（甚至学者）较为熟知的绝大部分是男性传教士：例如美国人丁韪良（W. A. P. Martin，1827—1916），在中国生活达62年之久，任京师大学堂及其前身京师同文馆总教习30余年。英国人傅兰雅（John Fryer，1839—1928），长期供职于晚清时期最重要的官方翻译机构——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共译出各类西学著作一百数十种，是清末士人获得近代西学新知的重要来源；1896年起任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首任东方学教授，1912年拿出个人积蓄6万两白银在上海设立盲童学校，救助当地的残疾人士。英国人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1845—1919），1876—1879年间，华北数省爆发极为严重的旱灾，李提摩太积极募款，先在山东，继而在灾情最为严重的山西进行赈济；19世纪90年代，李提摩太在上海主持清末极负盛名的基督教出版机构——广学会的工作，并在报刊上发表了大量著述，呼吁中国进行变革，对后来的戊戌维新影响甚大；“庚子事变”后，主张以新式的西方教育来弥合中西之间的隔阂，由是创立了百年学府山西大学的前身——山西大学堂。

上述三位皆以在中国长期从事社会文化事业方面的工作而为人所熟知，在信仰的层面影响较大的则是英国人戴德生（Hudson Taylor，1832—

1905)。戴德生创立的中华内地会（China Inland Mission）是19世纪末中国规模最大的基督教传教团体，也是世界最大的基督教差会之一。该会是没有宗派的传教团体，强调信仰的纯正；以向中国内陆省份传扬福音为宗旨，要求传教士离开沿海口岸城市，到那些被遗忘忽略的内地群体中传教；注重适应中国当地的文化和习俗，传教士在生活、语言、起居和衣着上尽量中国化；传教工作不倚靠政治势力的庇护，在发生民教冲突如义和团运动后，在人员、财产损失上也多不主张索赔；在经济上完全凭信心，传教士没有固定的薪水；该会最重要的使命是传教，其他以文字、教育、医疗等方式去影响中国，均属次要的部分。<sup>[1]</sup>

然而，来华的传教士并非全为男性，里面也包含了不少女性。19世纪西方基督教内出现女性传教运动的著名口号“妇女工作为妇女”（Woman's Work for Woman）。1877年，在上海举行的第一届全国基督教传教士大会上，美国传教士哈巴安德牧师（A. P. Happer, 1818—1894）将其引入中国。（*Records of the General Conference of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of China Held at Shanghai, 1877*）从哈巴安德的报告以及会上的回应来看，基督教界普遍支持女传教士在中国妇女传教活动中的角色。此后，女性传教士在中国传教事业中所扮演的角色在日益加重，其绝对数量以及在所有传教士中的比例都在上升。（见表1）

关于女传教士在教会内部以及教育、医疗和其他社会服务中发挥重要作用的研究已经开始有一些，如英国学者杰弗里·考克斯（Jeffrey Cox）在《1700年以来的英国传教事业》（*The British Missionary Enterprise since 1700*）一书系统研究了女性在近代以来英国全球传教活动中的重要性；美国学者简·亨特在《优雅福音：20世纪初的在华美国女传教士》一书中研究了20世纪初来华的美国女传教士。但总体上而言，女传教士还是常被学术界忽略，甚至在教会历史的书写中也籍籍无名。

---

[1] 中华内地会是近代山西流布最广的基督教团体，而且与传主艾伟德存在一定的关系。

表1 基督教近代来华传教的女传教人员数量及比例

年份	传教人员总数	男传教人员	女性传教人员			女性人员所占比例
			独身	已婚	合计	
1876	817	410	63	344	407	49.8%
1889	1296	589	316	391	707	54.6%
1905	3445	1443	964	1038	2002	58.1%
1917	5338	1818	1818	1819	3637	61.6%
1920	6204	2285	2015	1904	3918	63.2%

注：本表根据1877、1890、1907年三次来华传教士大会记录以及1922年出版的《1901—1920年中国基督教调查资料》附录八的统计资料整理而成。转引自王奇生：《教会大学与中国女子高等教育》，《近代中国妇女史研究》总第4期（1996），第138页。

英国女传教士艾伟德（Gladys Aylward，1902—1970）无疑是女传教士中较为幸运的一个，她同特蕾莎修女（Teresa，1910—1997）那样独特的人物一样，具有强烈地服务社会的意识，故而她的经历与模范性的人生常被人讲给新的读者听，而且常被写成新的传记，用于教育孩子们。（David Nash, *Christian Ideals in British Culture: Stories of Belief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Palgrave Macmillan, 2013）据笔者目力所及，迄今为止，关于艾伟德的传记已不下数十种，而且她在中国传教以及救助难童的经历还被拍成了一部广受欢迎的电影，即1958年由好莱坞著名影星英格丽·褒曼主演的《六福客栈》。

艾伟德在西方世界久已广为人知，但是相关传记多由宗教界人士撰写及使用，更多重视的是其垂范以及教化的功能，对人物史实的部分并不看重。艾伟德为中国尤其是中国内地民众所了解，是近些年才发生的事。相关中文著述主要包括张继新等人翻译的《八福客栈》（甘肃人民美术出版社2006年版），林云编译的《震撼世界的六福客栈：英国小妇人艾伟德与中国阳城》（山西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以及张石山、谭曙方的《六福客栈：小妇人艾伟德传奇》（山西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需要指出的是，后两部书的作者均为艾伟德广为人知的事迹发生地——山西省的人士。在他们的创作中，进行了大量实地调查及访谈，对于推广普及人们对艾伟德

生平的了解具有重要意义。但是，迄今为止，对艾伟德的事迹进行较为严谨、系统的研究型著述仍极为少见。

历史学是一门以文献为基础的学科，所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有了扎实的史料，才可能做出较为出色的研究。本书所依据的材料主要涉及艾伟德的传记，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图书馆所藏的艾伟德个人档案资料（包括书信、剪报以及其他个人物品），此外还有中国香港、中国台湾以及英国、澳大利亚等地的报刊资料。现对本文所利用的史料略为交代如下：

首先是传记。有关艾伟德的传记众多，本文主要参考的有三种，做出这样的选择主要是基于其出版年代均较早，而且是艾伟德在世且参与的情况下完成的，相对而言，史料的真实性与完整性会好一些。

1. R. O. Latham, Gladys Aylward : *One of the undefeated* ,London : Edinburgh House Press , 1950. 这是第一本介绍艾伟德的小册子，仅48页。1949年，艾伟德返回英国后，由拉森（R. O. Latham）记录的她本人的口述文本。本书初版于1950年，至1952年已经是第8次印刷。本书与1949年10月英国广播公司所推出的同名广播纪录片可能存在密切的关系。

2. Alan Burgess, *The Small Woman*, New York : E. P. Dutton & Co., 1957. 该书共256页，封面有三个汉字“小妇人”，故该书通常即译作《小妇人》。该书一部分来自英国广播公司制片人伯吉斯（Alan Burgess）对艾伟德的访谈，也有一部分是作家文学性的创作，篇幅较前一种扩充了数倍，故成为后来撰写艾伟德传记的重要参考书。艾伟德身高不到1.5米，因此被伯吉斯称为“小妇人”，而后或因该书极为畅销的关系，致使艾伟德开始有了“小妇人”的称号。1958年，美国20世纪福克斯电影公司（20th Century-Fox）更是以本书内容为基础，拍成电影*The Inn of the Sixth Happiness*（中文译为《六福客栈》）。借助这部电影，艾伟德成为西方世界家喻户晓的女性人物。该书作者伯吉斯还是一名畅销书作家，他的这部著作的故事情节很是引人入胜，但其中关于艾伟德的记述常有不实之处，对此艾伟德曾做过说明，“另一部分记忆不起者，则由作者自己找人求证，或由作者自己的臆断加以补充”。（黄铭：《小脚妇人与〈六福客



栈》》，香港《工商日报》1958年2月3日）所以利用时，需要谨慎。该书国内已有中文译本，即张继新等人编译的《八福客栈》，甘肃人民美术出版社2006年出版。该书中引用伯吉斯的传记时，一般从英文原版入手，称该书为《小妇人》，而以译本《八福客栈》作为参考。

3. Gladys Aylward, Christine Hunter, *The Little Woman*, Chicago: The Moody Publisher, 1970. 该书是艾伟德定居台湾时期，由其本人口述，并由亨特（Christine Hunter）记录的回忆录，而且是唯一一部作者署名内有艾伟德名字的传记。因此，本人以为该书所述艾伟德相关史实较之前两部传记或更为可靠一些。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本书中关于艾伟德在来华之前以及在中国内地活动的部分，倘若没有更为可靠的史料（如书信或者报刊资料），本书将以艾伟德署名的回忆录为主体材料直接译出，而标记为“据艾伟德回忆”；而以伯吉斯的《小妇人》中的记述作为补充。

至于档案资料。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所藏艾伟德档案包括书信、剪报以及艾伟德的个人生活物品、照片等，对于揭示艾伟德在华期间的个人情感世界，还原她对中国社会的观察与认识，具有重要的意义。目前相关研究对此类重要材料仍未加以利用，故而充分利用艾伟德的档案资料也是本书研究的重要特色。在利用这批材料时，本书专门用了两节加以论述，并没有将其拆解与前述传记材料进行互相参证，这主要是因为，一方面这批材料涉及的时段较短，与传记的相关部分重合的地方甚少；另一方面，艾伟德后来的回忆中出现小的出入很常见，这是她本人证实过的，1940年大病之后她的记忆有些模糊。

最后是报刊资料。作者投入大量时间，利用各种渠道，尤其是充分利用到各种网络数据库，收集到中外媒体关于艾伟德的各种报道。目前所涉及的报刊资料主要来自中国香港、中国台湾以及英国、澳大利亚、美国等地的中英文报纸。

本书力图在扎实的文献史料基础上，参照艾伟德个人以及中英社会的历史大背景，努力呈现一个真实、复杂的艾伟德，揭示她从一个普通的女

仆到社会楷模的演变历程以及背后的影响因素。最后要指出的是，因为时间关系，本研究未能进行深入、系统的田野及口述访谈，这也是引以为憾的事。

# 目 录

引 言	1
一、艰辛的来华之旅	1
1. 来华之背景	2
2. 来华遭拒及努力	5
3. 跨越欧亚大陆	9
4. 进入山西	12
二、传教于晋东南	17
1. 八福客栈	21
2. 放足监督	25
3. 救助难童	34
4. 监狱传教	39
5. 家信中的战前生活	43
三、抗日战争中的艾伟德	59
1. 艾伟德笔下的战争	60
2. 救助伤兵、难民	77
3. 刺探日军情报	80
4. 教化土匪	83



# CONTENTS

四、大迁徙及在中国内地最后的岁月·····	85
1. 转移难童的原因·····	86
2. 大迁徙·····	87
3. 病倒·····	94
4. 在中国内地最后的岁月·····	95
五、晚年的艾伟德·····	99
1. 享誉故乡·····	100
2. 对电影《六福客栈》的态度·····	107
3. 艾伟德的心结·····	120
4. 《六福客栈》公映之后的艾伟德·····	125
5. 去世·····	132
余 论·····	139
主要参考文献·····	144
附录一 艾伟德年谱简编·····	150
附录二 艾伟德相关文献选编·····	176
后 记·····	199

## 一、艰辛的来华之旅 |

1902年2月24日，艾伟德出生于英国伦敦北部埃德蒙顿地区（Edmonton）的一个普通家庭，据英国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英国《国家传记辞典》（*The Dictionary of National Biography* 1961—1970, 1981），其父亲是名邮差，母亲是家庭主妇。作为家里的长女，艾伟德还有一弟一妹。14岁时，艾伟德从学校辍学，故而未能接受过足够的教育，在其给家人或者朋友的信中存在大量的拼写、语法等错误印证了这一点。艾伟德先是在伦敦繁华地带的玛莎百货公司（Mark and Spencer）上班，18岁时则主要从事女仆的工作，工时长，工资又低。

## 1. 来华之背景

艾伟德的青少年时代在英国，虽然已有不少年轻人对信仰不再感兴趣，但基督教信仰对英国社会的影响仍不可低估。据英国学者卡勒姆·布朗（Callum G. Brown）在《基督教在英国的衰落》（*The Death of Christian Britain*）一书中的研究，19世纪末20世纪前十年出生的英国人里，半数是在父母至少一方常去教堂的家庭长大，他们经常参加主日学校（Sunday School）学习，以及各类宗教组织（如救世军）；而在父母不常去教堂的家庭，孩子经常参加教会活动的情况也很普遍；许多家庭里都有信仰方面的书籍，除了常见的《圣经》之外，还有给孩子们礼拜天学习的绘画版《圣经故事》；此外宗教类报刊如《基督教先驱报》（*Christian Herald*）等在英国社会中流传很普遍。

而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受五四运动的影响，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爆发了声势浩大的“非基督教运动”。<sup>[1]</sup>梁家麟在其著作《福林中华：中国近代教会史十讲》中指出，非基督教运动最初发起者主要是青年学生，后来蔡元培等教育界、思想界的著名人士也加入进来，攻击基督教为西方帝

---

[1] 有关“非基督教运动”的详细讨论，可参考杨天宏：《基督教与民国知识分子：1922—1927年中国非基督教运动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年。

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先导。1926年，随着国民革命军的北伐，中国社会的动荡进一步加剧。这些因素造成大量的传教士逃离中国，来华传教士的总数从1922年巅峰期的8300人急速降到了1928年的3150人，下降了近六成，基督教在华的传教工作基本陷于停顿的状态。

在这种背景下，英国人戴德生创立的中华内地会却发起了“前进运动”（Forward Movement），在西方各国进行广泛的呼吁，征召200名新的传教士加入中国，尤其是边疆偏远地区的传教工作。据曾到过中国的女传教士董艳云（Phyllis Thompson）的著作《何斯德：与上帝同行的王子》（*D.E. Hoste: A Prince with God*）记载，虽然20世纪20至30年代西方各国基督教的传教热情普遍下降，而且各国经济又处于大萧条的前夜，加之中国社会传教的环境也在恶化，但是内地会仍然在不到四年的时间（1929—1932）里完成了目标，共征召到203名新的传教士。

除了时代背景以外，自身背景也是艾伟德成为传教士的重要原因。

其一，个人信仰方面。据英国《国家传记辞典》记载，艾伟德出生于基督教家庭，其父曾经是埃德蒙顿一间教堂的开门人，在艾伟德9岁时加入了附近的一个传教组织。而艾伟德小时候也定期去教堂（Aubrey Church）上主日学（Sunday School）课程，虽然稍大以后她对宗教的事并不是很在乎。

其二，青年时期的艾伟德有自己的追求，可惜没有实现。根据艾伟德的回忆，她早年虽然没接受过多少教育，但很会说话，而且喜欢舞台表演。那时大部分普通工薪家庭的女孩多从事服务行业的工作，因为对她们来说几乎没有其他的工作机会，所以艾伟德作了一名女仆。但艾伟德并不甘心从事女仆的工作，晚上坚持去上戏剧的课程，希望有机会登台演出。然而，几经努力，直到近30岁，她的愿望仍然未能达成。

其三，加入传教的志愿组织。简·亨特在《优雅的福音》一书中曾指出，在促使年轻男女投入传教的因素中，发挥作用最大的或许是宣扬基督再临的志愿者组织。而据艾伟德后来的回忆，25岁时，她参加了一次聚

会，或许即其后来所声称的“青年生命运动”<sup>[1]</sup>（Young Life Campaign）的聚会。在这次会上，艾伟德接受耶稣成为她的救主。就是在这个组织里，她在一本杂志上读到关于中国的文章，文中讲到中国数以百万计的人民从未听说过基督的福音，她感到相当震撼，觉得自己应该做些什么。艾伟德向基督徒朋友们诉说了这种想法，却没有引起他们特别的注意。

其四，由于生在一个“不幸”的年代，艾伟德来华之前或已有来自结婚的压力。1914—1918年间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造成英国大量适婚的男性去世，对当时英国社会产生了诸多影响。据弗吉尼亚·尼克尔森（Virginia Nicholson）的研究《落单：一战后英国两百万女性没有男人如何生存》（*Singled Out: How Two Million Women Survived Without Men After the First World War*），一战除了导致“日不落帝国”走向衰落之外，对1885—1905年间出生的英国女性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她们在20世纪20年代已被称为“多余的女人”。虽然结婚是她们与生俱来的权利，但长达四年血腥的世界大战剥夺了她们中许多人的这种权利。而到了20世纪30年代，她们想觅到人生伴侣已经变得更为困难。而根据简·亨特在《优雅的福音：20世纪初的在华美国女传教士》中的研究，逃避婚姻的压力恰好是女性成为传教士的重要原因之一。而事实上，在来华传教士中，独身女性的比例确实越来越高，1920年甚至超过了男士以及已婚女性。艾伟德正好属于上述时段出生的英国女性，她来华之前也确实成为大龄女青年。据艾伟德回忆，她最初是试图支持弟弟到中国从事传教的工作，但弟弟的反应却是对她的嘲讽：“那是老处女的工作，你为什么不去自己做？”

中国在遥远的东方，距英国是那样的遥远，艾伟德为何选择中国为传教的目的地？而且据英国学者凯斯·哈利（Cathy Hartley）的《英国

---

[1] “青年生命运动”是由英国人弗里德里克·伍德（Frederick Wood）以及亚瑟·伍德（Arthur Wood）两兄弟于1911年创立的一个组织，至今仍然存在。该组织的宗旨是，将基督教福音带给成千上万的年轻人，并祝福英国国内外基督教的各项工。 “青年生命运动”以篝火、野餐等定期聚会的方式吸引年轻人参加，并鼓励年轻人之间的信仰分享。艾伟德如今已成为该会历史上的典范人物。



女性历史辞典》( *A Historical Dictionary of British Women* ) 的记载, 去中国之前, 艾伟德很少远行, 她离家的最远距离是到威尔士的城市斯旺西 (Swansea), 那里距离伦敦不过300公里。20世纪60年代, 美国作家伊丽莎白·艾略特 (Elisabeth Elliot) 在其著述《让我成为一名女人》( *Let Me Be a Woman* ) 中记载曾亲耳听艾伟德讲到年轻时很为之难过的两件事, 或可以说明一些问题: 一、所有的朋友都有一头漂亮的金发, 而艾伟德的却是黑色的。二、朋友们还在长个子的时候, 她却停止了发育, 最终艾伟德只有四尺十寸 (约合1.48米) 高。这让她有些沮丧或者自卑。而当作为一名传教士并最终抵达中国后, 艾伟德发现中国人都是黑头发, 而且都在她停止发育的年纪也不再长高。这令艾伟德感到宽慰, 她甚至还为此感谢了上帝。

## 2. 来华遭拒及努力

艾伟德决定从事传教的工作, 在时间点上, 正好是中国内地会发起的“前进运动”时期。1929年12月12日, 经中华内地会妇女委员会人员的介绍, 艾伟德得到内地会传教士甄选委员会的接纳, 得以进入“女传教士训练所”接受赴中国之前的语言训练以及《圣经》方面的教导。当日的会议记录记载: “艾伟德女士, 现年27岁, 在伦敦市埃德蒙顿区住有10年, 已由本会接见。艾女士系在有基督信仰的家庭长大, 18岁进入社会工作时, 由于认识本身的需要而悔改信主, 在服务之处有良好之见证, 也曾做露天布道及青年聚会工作。由于艾女士本身所表现之能力, 所以妇女会建议给予一学期之试验, 视其能否适应学习。甄选委员会经特别慎重考虑以后, 接纳妇女会推荐。” (转引自陈中陵: 《孤儿之母: 女传教士艾伟德的生平与形象》)

然而, 进入传教士训练学校 (C. I. M Training Institute) 就读, 并不意味着一定能成为真正的传教士。1936年来华的女传教士奥德丽·韦瑟雷尔 (Audrey Wetherell Johnson) 在其回忆录 ( *Created for Commitment* ) 中

称：“中华内地会的传教士录取比例大约是6名候选者取1位，而且直到踏上去中国的船才能确定自己是否真的中选。”而在阿兰·伯吉斯（Alan Burgess）的《小妇人》（*The Small Woman*）中，艾伟德所参加的传教士训练学校，不仅对候选者进行神学方面的训练，强调个人以及公开祈祷的作用；还要训练候选者对不同性情、秉性人群的适应能力，应付突发事件比如战争等环境的能力；此外，还要学习中文以及中国史。整个训练为期三个月，最后进行学科能力的测验。

结果艾伟德的学习成绩并不理想，她的《圣经》等课程的进度远落后于其他人。而根据1949年11月4日英国报纸《西部每日报道》（*Western Daily Press*）中的报道——《艾伟德在布里斯托》（*Aylward Gladys in Bristol*），那年艾伟德已年近30岁。这个年纪对于掌握中文这门语言来说太难了。年纪较大也是艾伟德来华传教申请遭拒的重要原因。

遭到拒绝后，艾伟德非常失望，但她仍执意要去中国。她不想再做女仆的工作，而是在内地会甄选委员会人员的建议下，到了布里斯托市，（Bristol）照顾一对传教士夫妇。艾伟德从他们身上学到了很多，最重要的是他们对上帝那完全的信心。他们也告诉艾伟德之前在国外生活的情形，学会信奉上帝，向他祈祷。与这对年长的传教士夫妇的相处，强化了艾伟德去中国的信心，而且她更加相信那是上帝的意思。后来，艾伟德还去了尼思市（Neath），为女性基督教协会（Christian Association of Women and Girls）工作，但在那里没找到更好的去中国的机会。于是，艾伟德又去了斯旺西（Swansea），在那里从事救护的工作；晚上在码头附近漆黑的街道上，在闪着黄光的煤气灯下，劝说那些深夜还游荡的女人及年轻女孩们回家。她还走进酒馆，帮助那些被船员灌醉的女孩们，带她们到旅馆。到了礼拜天，艾伟德尽力请那些新认识的朋友参加当地教会里的聚会。社会服务是基督教吸引人皈依的路径之一，艾伟德喜欢这样的工作，也从中得到一定的历练。

然而，艾伟德是那样地向往中国，即使没有人支持，但她还是确信，只要自己想去，上帝就一定会带领她。艾伟德决定回伦敦，重操女仆的工

作，并且不停地寻找兼职的机会，筹集到中国的旅费。当时从英国到中国有两种交通方式：一是海运；二是铁路。海路最便宜的船票也要90英镑，太过昂贵；铁路车票比较便宜，从伦敦到中国天津最便宜的票只有47英镑，但要从英国跨过海峡，经欧洲大陆、苏俄的西伯利亚，再经中东铁路进入中国东北。这条路线通过太多国家，需要办理签证，多次换乘，语言交流也将是问题。但艾伟德还是选择了第二种交通方式。她马上用自己的积蓄在英国旅行社预订了一张到天津的三等单程火车票，而且请求以分期付款的方式支付费用。此外，艾伟德还抓住机会阅读与中国有关的书籍，了解位于遥远东方的那个国度。

但是，到了中国，将要在中国的什么地方落足，也成为艾伟德必须要面对的问题。还好不久就有位牧师来拜访她的母亲，顺便提出请艾伟德去其教会里帮忙。在一次聚会中，有人告诉艾伟德一个好消息。苏格兰女传教士劳森夫人，73岁，在中国传教多年。不久前，劳森先生去世，劳森夫人回到了英国，但无法安定下来，于是不顾自己的年纪又回到了中国。劳森夫人写信给英国的友人，称希望找一个年轻人协助并接续她的工作。艾伟德相信自己就是劳森夫人需要的那个人，于是她马上给劳森太太写信。许久之后，艾伟德收到劳森夫人的回信。信中称，如果艾伟德要去中国的话，到中国的旅费需要自己想办法解决，而且到中国后没有薪水，并且称她们可以在天津见面。

虽然劳森夫人信中开列的条件有些苛刻，但艾伟德仍毫不迟疑，她只想到中国去。艾伟德的父母对女儿独自一人踏上那漫长而充满未知的旅程非常担心，而且极有可能是永远无法再见面的，但他们并没有试图改变艾伟德的决定，而是为她尽力准备。母亲在艾伟德的外套和紧身衣里缝了隐蔽的口袋，可以存放车票、护照、《圣经》、钢笔还有两张各一镑的旅行支票；手提箱里有饼干、腌牛肉还有铁茶壶、炖锅等，这些是艾伟德随身所带的全部东西。艾伟德没钱买吃的，她打算靠随身携带的食物充饥。

艾伟德的父母还专门在埃德蒙顿区的市政厅举行了送别女儿的聚会，邀请亲友以及教会的人士参加。惜别会上有音乐，有茶水，还有牧师的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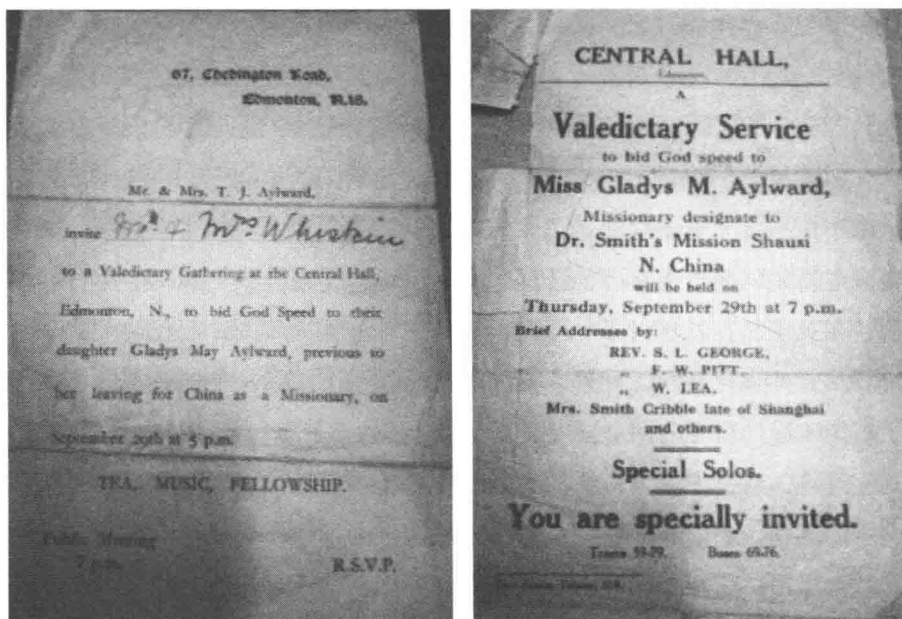


图1.1 艾伟德的父母为女儿所办的惜别会请柬

讲。从图1.1右边的请柬还可以看到艾伟德将要服务的教会属于在中国华北地区山西省的传教士Dr. Smith（中文名字为司米德）。聚会举行的时间为某年9月29日（周四）下午5点。

关于艾伟德离开英国的时间，一直存在有两种说法：1957年艾伟德的传记《小妇人》（*The Small Woman*）中写的是1930年10月18日。艾伟德去世后墓志铭上的来华时间也是1930年。前述中国内地出版的两种艾伟德的传记因循的即是这一判定。但1970年出版的《艾伟德自述：小妇人》（*The Little Woman*）里则是1932年10月15日。在两种说法中，后一种是正确的，相关证据很是丰富。最早的一条文献是1936年4月10日英国的一家报纸《每周先驱报》（*The Weekly Herald*）上刊载的文章《埃德蒙顿女传教士在中国》，已经提到艾伟德来华时间为1932年10月。而1949年艾伟德返回英国后，英国甚至其他国家的媒体对其事迹的报道中亦多记作1932年：如1949年11月4日《西部每日报道》（*Western Daily Press*）中的《艾伟德在布里斯托》（*Aylward Gladys in Bristol*）以及1950年2月24日《调查

镜报》(Surrey Mirror)中的《十字架道路》(At the Cross Road),此外,还有1950年1月9日澳大利亚纳拉布赖的《西北通讯》(The North Western Courier)中的《艾伟德的英雄主义》(The Heroism of Gladys Aylward)都明确艾伟德的来华时间是1932年。2012年,香港笃志传道会(艾伟德于1957年创立)在英国找到上述艾伟德父母为其举行惜别会的请柬,上面明确记载其离英的时间为1932年10月15日。(陈中陵:《奔走天路的小妇人:艾伟德1932年来华八十周年纪念》,《基督教论坛报》第3478期第12版,2013年3月23—26日)

### 3. 跨越欧亚大陆

据艾伟德的回忆,她是在1932年10月15日,星期六,上午九点半,从伦敦的利物浦街车站出发的。在与亲友告别后,艾伟德踏上了旅程,此后她所能依赖的只有她的上帝。艾伟德随身带了两个箱子,一个箱子里放有一本《圣经》和她的衣物,另一个里面装些简单的食物,还有一只烧水煮饭的酒精炉,口袋里的全部旅费仅有两英镑九便士。

旅途起初很顺利,艾伟德花了不少时间给家人写信。火车从哈维克(Harwich)到福拉汛(Flushing),跨过英吉利海峡,进入荷兰。此前在利物浦街车站与家人话别时艾伟德就注意到上车的一对夫妇,那先生留着山羊胡子。到了福拉汛,艾伟德在车厢里再次见到他们,就坐在她的对面。那夫人很亲切,因为之前在利物浦街车站时他们也注意到艾伟德。当了解到艾伟德要去中国的时候,这对夫妇起初以为她是到中国与人结婚;而当艾伟德否认并称到中国是做传教士之后,他们对艾伟德变得更为热心。他们也是教会人士,刚参加完在凯斯威克举行的基督教大会(Keswich Convention),要回海牙的家。艾伟德很高兴认识他们,于是小声地交流起来。后来那女士与艾伟德约定,只要活着就彼此为对方祈祷。女士还把自己的名字写在艾伟德的《圣经》上,同时要艾伟德将名字也写在他们的《圣经》上。火车到了海牙,那对夫妇离开后,艾伟

德发现自己的手里多了一张一英镑的纸币，正是那位荷兰的男士离开时放在她手里的。艾伟德那时还以为再也用不到英国货币，但她还是把它收在自己的口袋里。不曾想到的是，后来那张纸币在千里之外帮她摆脱了极为危险的处境，救了她的命。

火车离开荷兰，艾伟德真正感到了孤单，车上的人穿的衣服和她都不同，说的话也不一样。火车到了德国的柏林，有铁路职员过来试图问艾伟德些事情，她完全听不懂对方在说什么。还好有个德国女孩会点英文，帮她解了围。艾伟德最终被迫在柏林停留了一晚。德国女孩是个很好的人，还带艾伟德去了她家，第二天又带她在柏林四处转了转。之后，艾伟德就又踏上漫长的旅途，列车经由波兰的华沙到了苏联。在陌生的国度，身材矮小的艾伟德更加感到孤单，尽管如此，想到旅途中所遇到的一切，她还是确信到中国传教是上帝的安排，上帝会保佑她的一切。由于无法与人交谈，艾伟德感到单调而无聊，她偶尔会在车厢走道里来回散散步。列车在苏联的领土上，时常颠簸得很厉害，艾伟德发现自己变得没了胃口，很不舒服，但她以为那是缺乏适当的运动所致。

10月22日，星期六，艾伟德已经离家第七天，火车进入了西伯利亚，奔驰在白雪覆盖的广袤土地上，她从未见过那么大的雪。晚上天气非常冷，甚至要身体保持一点暖意都不容易。

10月24日，星期一，列车长带着一个懂点英文的人到了艾伟德的车厢，很费力地想和她交谈。透过那个人，列车长告诉艾伟德，该趟火车到不了哈尔滨，因为中苏边界正在发生战事，她在那里可能会被拦下。艾伟德为此焦虑了一个晚上，不知接下来将发生什么，也不知该找什么人帮忙。后来艾伟德想到了上帝，相信他一定有能力帮她渡过难关。不知自何时起，火车上已经全是开赴边境的苏联士兵，不过还好，艾伟德得到了优待。在离开英国时，艾伟德已知道苏联和日本处于交战的状态，而这种情况可能会影响到从苏联到中国东北三省间的铁路运行。火车上的士兵们后来证实了艾伟德的忧虑，他们说那趟列车到不了哈尔滨，因为去那里的铁路线已经被封锁。终于有一天，又有苏联铁路职员到艾伟德的车厢，对着

艾伟德比划了一番，看到她完全听不懂，只得无奈地离开。

火车一直往前开，晚上又停下来，所有的士兵都下了火车，而待在角落里的艾伟德起初并不知发生了什么。大约一小时后，她才发现火车已经变得空空荡荡，而且车厢里甚至连车站上的灯都灭掉了，一片漆黑。突然响起来的炮声，把艾伟德吓了一跳，她才意识到自己已到了前线，火车无法继续前进。艾伟德匆忙地收拾了一下自己的行李物品，走到站台上。

天很冷，风很大，还下着雪。艾伟德坐在行李上，又冷又饿，站台一个人也没有。想到这样下去可能会被冻死，艾伟德费劲地摸索进废弃的车站里。在一个小木屋里，艾伟德见到了4个人，管车员、司机、司炉员还有搬运工。这些人之前在赤塔（Chita）时曾试图赶她下车。他们费劲地向艾伟德解释，火车不会再继续往前开，以后将用于运送伤兵，但何时开动他们也不知道，于是，建议艾伟德沿着铁轨往回走。艾伟德喝了一杯他们拿来的浓咖啡，就背上行李朝赤塔的方向走去。

路上的积雪很深，走起来十分艰难，艾伟德用了几乎一天一夜才终于回到了赤塔站。有士兵过来把她带到一个地方，军官过来问她的情况。因为语言问题，双方交流极为麻烦，有人翻了艾伟德的物品以及护照，甚至误以为她是工程技术人员，而想劝她留在苏联工作。艾伟德拿出《圣经》给他们看，那些人才好像明白了。他们给了艾伟德新的签证还有另一段旅程的车票，并提醒她要在尼克希雪（Nikolshissur）车站换车，然后在帕哥伦尼克乃（Pogranilechnai）站再换一次车，才能到哈尔滨。对于他们的帮助，艾伟德很感激。但当艾伟德到达帕哥伦尼克乃时，却发现已经没有火车去哈尔滨了。在好心人的提醒下，艾伟德登上去海参崴的火车，虽然她并不知道接下来自己该去哪里。

在海参崴，艾伟德的经历更为惊险。她碰到一个自称翻译的人，然后被带到一家旅馆。那人表现得很热情，起初还带着她到处看看，却拿走了她的护照。几天后，艾伟德要求那位译员把护照还给她，却遭到了拒绝。这个人同赤塔的官员一样，莫名其妙地以为艾伟德是懂机械的技术人员，后来还曾威胁她哪里也不能去，唯有留下来建设苏联。而后来当艾伟德出

其不意从那人手里抢回护照时，居然发现上面的“传教士”身份已被涂改为“机械师”。但之后艾伟德就被监视起来，不能离开，虽然她屡次声明自己是传教士，也无济于事。

后来，艾伟德碰到了一位年轻的女士，经其帮忙，并在一位老人的引领下，在某天清晨时逃到了海边的码头，在那里恳请日本籍船长带她离开。为了表达谢意，艾伟德送给年轻女孩一双手套还有一双长袜。就在登船的时候，艾伟德被追来的翻译以及苏联军人抓住。艾伟德猛然间想到在荷兰那对夫妇送给她的这张一英镑的钞票，拿出来扔给了身后的士兵，才得以脱身。

轮船离开海参崴驶向了日本中部的敦贺港（Tsuruga），艾伟德才终于长舒一口气。在英国驻当地领事的帮助下，艾伟德很快办好了相关手续，而且得到很好的照顾。第二天，艾伟德乘火车到了神户（Kobe），先是找到英国传教士在当地的教堂。虽然是名不速之客，艾伟德还是得到了英国同行的热情款待，她终于好好地吃了一餐，洗了个热水澡，又舒服地睡了一觉。第二天又在他人的帮忙下拿到神户至中国天津的船票。艾伟德对日本的印象不错，环境整洁，人也热情，完全不会想到几年后日本人会在中国制造那么多的暴行。11月5日，星期六，艾伟德登上神户通往中国天津的客轮，离开了日本。

#### 4. 进入山西

11月10日，星期四，艾伟德乘坐的轮船抵达天津，终于踏上了梦寐以求的中国土地。下了船，她立刻前往英国传教会的总部，那里许多人知道年迈的劳森夫人。艾伟德受到极为热烈的欢迎，大家都为她能平安抵达天津而感谢上帝的保佑。

本以为在天津可以见到劳森夫人，然后一起上路，所以当听说几个月前劳森夫人已经回到位于崇山峻岭中的山西城市——泽州（即今晋城市）的时候，艾伟德几乎要哭了，因为一路走来所遇到的困难比其预想得多



太多。好在劳森夫人已有安排，一位姓路的先生已经来到天津，他将陪着艾伟德一同到山西去。

在天津休息了一天，星期六艾伟德就和路先生一同登上北平的火车。火车奔驰在中国的乡间原野上，她对车外的一切都很兴奋。但是，车委实令人不舒适，每节车厢挤了四五十人，大家在摇晃的火车上总是撞来撞去。到了北平之后，两人找了一家客栈住了一晚，那里环境脏得吓人。第二天早上，艾伟德他们就又乘上火车南下，沿着平汉路抵达河北省的正定县，然后西行，经正太路抵山西、河北两省边界的亚泽（Yutse，或即苇泽关，又名娘子关）。到此，按艾伟德的回忆，他们的铁路旅行到了终点，然后从那里改乘长途汽车。

倘若艾伟德的回忆无误，从娘子关改乘汽车去晋城的话，似乎存在一些问题。根据1932年刊行的《山西省已成、未成公路路线图》（统计截止到1932年8月，见图1.2），从娘子关附近到晋城公路的北段，即由平定经昔阳、和顺到辽县的部分，以及南段经沁县、屯留、长子、高平到晋城的部分，1932年8月前已修通；而中段由辽县经武乡到沁县的部分却并未建成。而另外一条路线，从太原到晋城的公路却早已贯通。故而，艾伟德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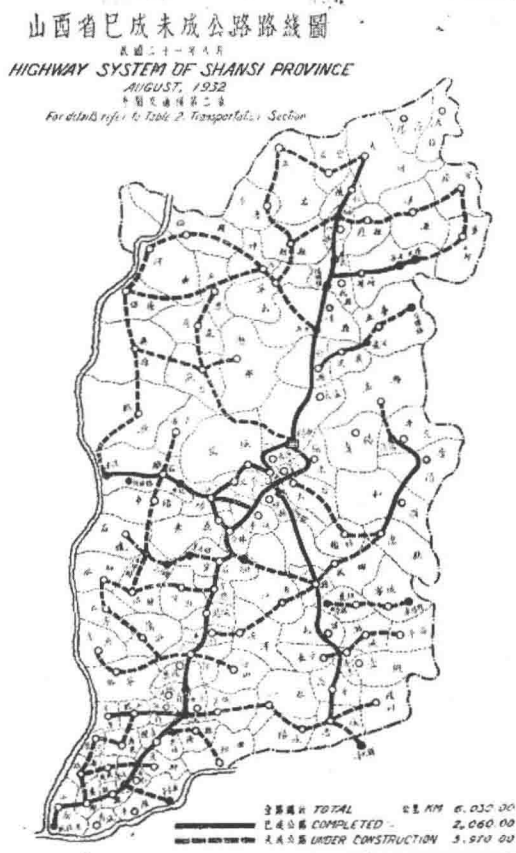


图1.2 山西省已成、未成公路路线图（截止到1932年8月，原载于《统计月刊》1932年9—10期）

可能并未在娘子关下车，而是乘火车直达太原，然后从那里换乘汽车去的晋城。事实上，这条路线上的路程与其回忆中的“车行一日于沁州住宿，两日于泽州住宿”的描述较为吻合，因为从太原到沁州与沁州到泽州的距离似乎较为接近，而从娘子关或者平定到沁州的距离则要比沁州与泽州间的距离远得多。

汽车行驶中，摇晃得很厉害，不断地翻山越岭，涉水过河。如此糟糕的路况也难不倒汽车司机，令艾伟德很是惊讶。每到晚上，乘客们就沿途找家小客栈歇息，而在那客栈里是没有个人隐私的，所有人都睡在同一条炕上，一种用土坯砌成的通铺，通过在下面烧柴取暖。旅客都和衣而卧，人多的时候，夜里几乎不能翻身，而且常常会受到臭虫及跳蚤的骚扰。

长途汽车开行到第三天，艾伟德他们到了泽州。之前在天津时，有人告诉艾伟德，到了泽州大约就能找到劳森夫人；于是，艾伟德直接去了那里的教会，是个名为神召会的组织，没有见到劳森夫人却见到另一位七十来岁的老太太，乃是已故英国传教士司米德（Stanley Smith, 1861—1931）的遗孀。

司米德牧师出身医生家庭，毕业于剑桥大学三一学院，曾任剑桥大学划艇队队长。他是在内地会创始人戴德生的激励下，毅然放弃锦绣前程，与何斯德（D. E. Hoste, 1861—1946）等七人加入中华内地会，并于1885年来华从事传教的活动。与司米德一同来华的七个人出身都很好，多毕业于剑桥大学或与之有其他的系，故而在英美产生极大的影响，被誉为“剑桥七杰”。司米德来华之初，就是在山西传教，先是在洪洞，后至潞安府（即今山西长治市），1896年左右到了泽州。1900年义和团运动爆发后，司米德与中华内地会产生一些分歧，从此离开该组织。此后，据《山西通志·民族宗教志》（中华书局1997年版）中记载，1902年司米德在泽州创立了神召会；1906年，在晋城小东关设立泽州总堂；1913年，将神召会发展到高平、陵川、沁水等县；1915年发展到了阳城。而根据1906年编就的《阳城县乡土志》（刊刻于1934年），当时阳城耶稣教信徒统计数字为零，可知阳城的基督教就是司米德引入的。如前所述，家人为艾伟德举行

的惜别会所用的邀请函内已经提到过司米德，并称其在中国华北的山西地区，艾伟德即是为他的教会工作。而劳森夫人之前或许一直是和司米德夫人在一起的。

艾伟德在泽州得到司米德夫人的盛情款待。司米德夫人是位很有涵养、极富亲和力而且有丰富的在中国传教生活经验的老人，让艾伟德感到十分温馨。从司米德夫人口中，艾伟德获悉劳森夫人此前曾在泽州住过几周，不久前去了阳城。交谈中，司米德夫人建议艾伟德脱掉在当地十分显眼的洋服，因为如果被当地的土匪盯上，会被误以为是有钱的洋人，说不准还会被抓去作洋票<sup>[1]</sup>。为避免不必要的麻烦，艾伟德换上了司米德夫人为其准备的中国女性穿的衣服，这是她融入本地文化的第一步。其实，换穿中国当地的服装，甚至改变自己的生活习惯是司米德之前服务多年的中华内地会的一贯做法，积极融入当地社会以便于传教，正是内地会不同于其他差会的地方。后来，司米德夫人还告诉艾伟德，从泽州到阳城还没有大路，山路崎岖难行，只能骑着骡子过去。

第二天，艾伟德与路先生踏上了去往阳城的旅程。他们翻过了三座大山，跨过数条溪流。艾伟德是第一次骑骡子旅行，感到非常难受，浑身上下似乎每节骨头都是那样的痛，仿佛一直都在抗议。这是一次她永远忘不了的旅行，艾伟德甚至有时会以为自己到阳城之前身体就会散架。11月22日，他们终于到了阳城。（陈中陵：《奔走天路的小妇人：艾伟德教士1932年来华八十年纪念》，《基督教论坛报》第3478期第12版，2013年3月23—26日）

---

[1] 洋票是指被绑票的洋人。早期在华传教士，若不幸被土匪盯上，就会向被掠人勒索赎金。按照中国内地会的规定，若是传教士被绑票，总部是不与绑匪打交道的，以免绑匪有机可乘，传教士则必须自行想法脱困。参贝思飞（Phil Billingsley）主编，徐有威译，《洋票与绑匪：外国人眼中的民国社会》，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 二、传教于晋东南 |

阳城位于山西南部，地处太岳山南麓、中条山东麓、太行山西南、沁河中游。作为历史悠久的古县，金元以来，阳城的炼铁、硫黄、犁镜等手工业曾处于全国领先的地位；作为革命根据地，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有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阳城县城位于县境中心偏东北的山谷盆地，海拔600米左右。同治《阳城县志》是这样描绘阳城的：“万山拱翠，三水抱城，烟树楼台高于雉堞。”

与前述的《山西通志·民族宗教志》中的记载有所不同，据《阳城县志》（海潮出版社1994年版）载，阳城基督教的传入时间是1913年而非1915年，不过明确记载是由英国传教士司米德主导，在东关后巷设立教堂。首先吸收马永顺、卢小旦（东关人）入教，发展教徒91人，后由简称为何、巴、艾的三个英国人依次办教，隶属于泽州总教堂，先后称自立会、神召会。1933年有教徒172人，次年，降为150人。1938年日军侵入阳城，艾教士离阳。这里的艾教士应该指的就是艾伟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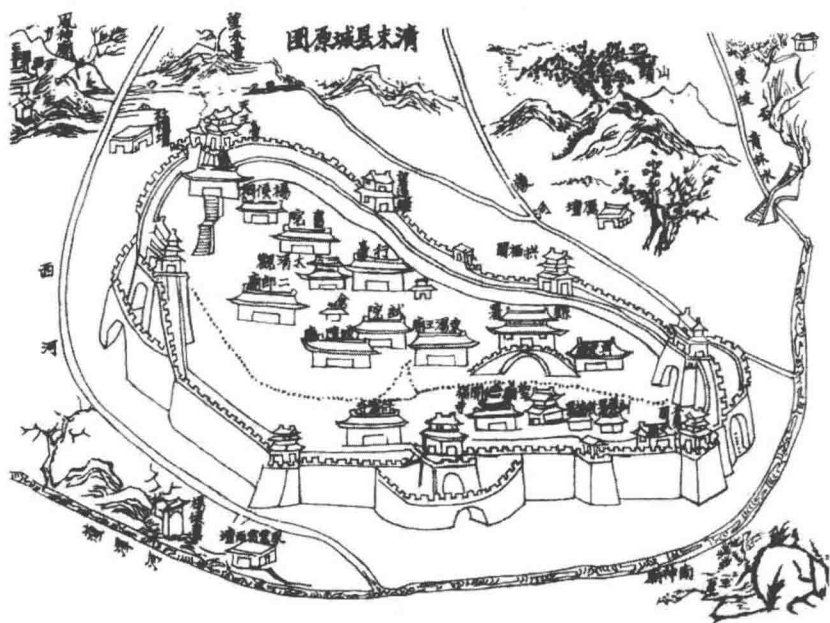


图2.1 同治《阳城县志》所载县城图

而在艾伟德之前参与阳城教务的劳森夫人（Jennie Lawson, 1857—1933），又被称作詹妮，正是接收艾氏来华的苏格兰老传教士。劳森夫人，中文名不详。据1919年出版的《中国内地会传教士及传教站一览表》（*China Inland Mission, List of Missionaries and Their Station*, Cleveland: The Charles W. Wason Collection, 1919）记载，其丈夫劳森先生1887年到的中国，詹妮的来华时间大约和劳森先生差不多。劳森先生与詹妮结婚后曾育有一子，惜不幸夭折。两人最初在山西的平遥进行传教，1896年转到潞安府的余吾镇（今属长治市屯留县），义和团运动时期返回欧洲，1902年又回到潞安府，在那里至少停留到1918年。劳森先生大约在20世纪30年代初过世。来华近五十年，劳森夫人又成了一个人，而且是年近七旬的老妪。虽然可以退休回国，但因离开英国太久，那里一切已变得很陌生，生活在那里更加寂寥空虚，于是劳森夫人选择回到山西继续其事业——传扬上帝的福音。劳森夫人转到阳城的时间也不长，根据陈中陵《孤儿之母》中的记载，她只比艾伟德早到那里五六个月。

劳森夫人或许就住在司米德所创立的神召会在阳城活动的地方，位于阳城县城东城墙脚下（今东关村邢后巷），毗邻小后河。路先生将骡子停在大门口，艾伟德从骡背上滑下来，浑身酸痛，步履蹒跚地走了进去。初见劳森夫人，艾伟德有些忐忑，因不知老太太将如何看待她，因为自己灰头土脸、疲惫不堪，而且也没有什么传教经验。据艾伟德后来的回忆，劳森夫人是情感不太外露的老人，两人的第一次见面并没有令她产生他乡遇故知的感觉。

进了院子，艾伟德迅速地扫视了一下四周的环境。完全不能想象，这是一所典型的两层四合院的房子，地上散落着砖头及其他杂物。想到艾伟德旅途辛苦肯定饿了，劳森夫人去了厨房，不大一会儿拿出一碗奇怪的东西出来。艾伟德接过来，闻了闻，味道有些令人作呕，不过她还是出于礼貌尝了尝，很不习惯，可除此以外再没可吃的，而且自己确实饿坏了，于是勉强吃了半碗。其间，劳森夫人将她雇来的厨子老杨介绍给艾伟德，并聊到这所破旧的房子的一些情况。中国人以为里面闹鬼，没人敢住，于是荒





图2.2 艾伟德与劳森夫人合影



图2.3 艾伟德初至阳城时的照片

废了很久，从而使得租金非常便宜。劳森夫人想好好收拾一下，还没来得及做。

经过长途跋涉，艾伟德感到非常累，想要休息。在阳城睡的第一晚也令其终生难忘。她先是问劳森夫人自己的房间在哪里，得到的回答是随便在哪间都可以。于是，艾伟德打开二楼的一个房间，将地上的杂物收拾起来，放下自己的行李和铺盖。这时她才发现房间的窗户上只有窗框，没有玻璃，也没有窗帘，甚至门也没有。艾伟德想脱下衣服休息，站在一边的劳森夫人却建议她不要那样做。劳森夫人称，睡觉时最好穿上所有的衣服，这样东西才不会被人偷走，因为他们的房子没有门，也无法上锁。

于是，艾伟德在阳城的第一晚是和衣而睡，与在之前沿途的中国客栈的情形一样，并且将所有东西放在自己身旁。第二天早上醒来，艾伟德就马上意识到听了劳森夫人的建议是多么的正确，因为她看到自己房间的窗户上挤满了好奇的中国人，正盯着她看。显然，艾伟德来到东关的消息早已传开，人们都想看看这位新来的年轻洋婆子。倘若之前脱了衣服，那么



现在就要在众目睽睽之下穿上，一定非常令人尴尬的。

## 1. 八福客栈

1958年，美国的20世纪福克斯公司拍摄了举世瞩目的电影《六福客栈》。剧中所描述的客栈其实就在阳城，而且是由劳森夫人与艾伟德共同设立的。劳森夫人与艾伟德设立客栈，或许基于以下几种考虑：

首先，劳森夫人和艾伟德的个人情况决定了她们在短期内无法进入阳城的乡村进行直接的传教活动。阳城地处山区，翻过一座山，对面人们的口音就可能存在很大的不同。学习方言对于劳森夫人以及艾伟德显然并不容易。此外，之前长期主要操持家务，在教堂也主要从事辅助性工作的劳森夫人（根据简·亨特的《优雅的福音》，已婚的女传教士在华从事的工作多是如此）而言，缺乏系统的神学训练，直接走乡串户进行布道，并不现实。而且劳森夫人也真的老了，难以进行长途跋涉，而这也是她发信到英国召唤艾伟德来中国的原因。至于初至中国的艾伟德，她之前只是一名伦敦的女仆，甚至无法通过中华内地会选聘传教士的考试。艾伟德缺乏神学上的训练，而且完全不懂中文，显然也不适合直接到阳城的农村里进行布道。此外，当地除了她们两个传教士之外，似乎并没有其他人，那就表明，传教工作也无法通过医疗或者教育的方式去吸引人们接触基督教。最后，如前所述，艾伟德并非正式的传教士，故而没有组织负责她的生活费用，需要劳森夫人及艾伟德自己想办法解决。

其次，那时阳城的环境适合开家客栈。当时阳城境内还没有真正的马路（参见前文中1932年出版的山西省公路交通图），基本还是坎坷不平仅能供骡子运货的土路及石路。但根据《阳城县志》记载，当地物产丰富，自古以来就有煤铁、丝绸、瓷器等物产行销于省内外。每天有大量的骡车商队从各地过来贩运各种货物，晚上他们就在沿途的客栈里过夜。赶骡子的骡夫们来自天南地北，旅途的艰辛与寂寞使得他们非常喜欢与人聊外地的新闻，也很喜欢听当地人讲本地的趣事。这点启发到劳森夫人，新租的房

子很大，可以开一家客栈，把骡夫们迎进来，这样既可以通过给骡夫们提供住宿和饮食赚些钱，同时又可以用说书的方式，向这些人传播上帝的福音。劳森夫人一直筹划将租来的房子改造成客栈，但因其年事已高，又缺人手，故而一直未能付诸实施。艾伟德的到来使得这项计划重现曙光。

劳森夫人向艾伟德详述了自己开设客栈的设想。对此，艾伟德当然提不出什么意见，虽然在来阳城的途中，她已经住过一些中国的客栈，了解一点里面的大致情形，但毕竟还是新人，完全不清楚该如何开展传教的工作，故而需要劳森夫人的引领。

劳森夫人找来工人先是把房顶修好，清理掉院子里的杂物，并和艾伟德、老杨一起把每个房间打扫得干干净净，然后安上新房的门，装上窗扇，糊上窗纸，最后还请人修好了二楼阳台上的栏杆。劳森夫人给新开张的客栈取了一个既有《圣经》内涵又有中国传统味道的店名——八福客栈。“八福客栈”这个名字在伯吉斯给艾伟德所写的传记《小妇人》（Alan Burgess: *The Small Woman*, 1957）中有记录，并且作了解释。“八福客栈”所谓的“八福”，出自《新约·马太福音》第5章第1-12节里耶稣对其门徒的教导：“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哀恸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怜恤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怜恤。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那么，艾伟德与劳森夫人所创立的“八福客栈”，为何在1958年所拍摄的电影中变成了“六福客栈”？对此，确切的理由现已无从得知。不过，从电影里关于“六福”的阐释，还是可以让我们一窥端倪：片中劳森夫人首先提到了中国的五福，即“财富、长寿、健康、美德、善终”，然后讲到“至于第六福是什么，让他们（中国人）自己去想吧”。最后这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即显示出明显迎合中国人的情感与文化需要的意图，又给自己在中国传扬上帝的福音留下了余地，因为在传教士看来，认识上帝何尝不是中国人之福呢？

在客栈维修、收拾妥当并取得好名字之后，劳森夫人又找人书写了招牌。黑底金字，挂上之后，很是醒目。

现实中的六福客栈如图2.4所示，而且墙壁上还有“旧福音堂”的字眼，但是否就是劳森夫人与艾伟德所创立的那家客栈，尚存疑问。因为，在抗日战争中这家客栈已经被日本人全部毁掉，而且艾伟德本人多次搬过家，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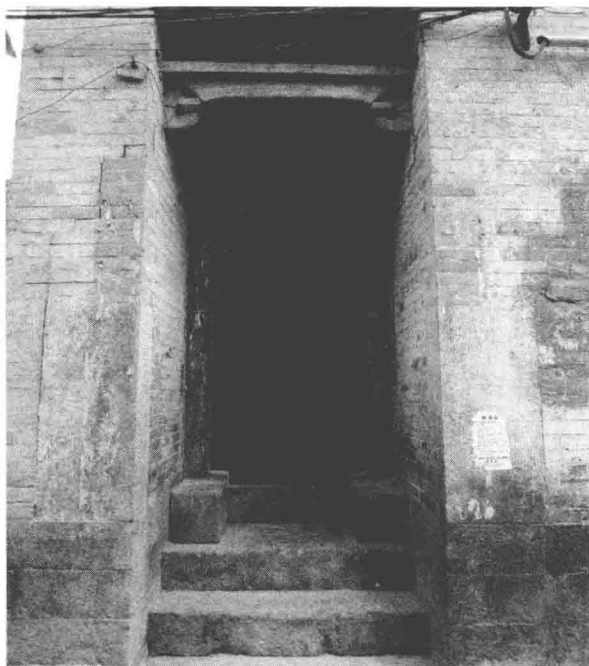


图2.4 位于阳城东关的六福客栈

后便离开了山西，再未能回去。有关客栈被毁的详细情形，见后文艾伟德写给家人的书信，此处不赘。

事实上，在阳城经营一家新的客栈并不容易，而且没有什么客人愿意光顾这两位西洋女人开的客栈。要知道即便如今，偏僻地区的人们与西方人接触还是很有限，对洋人虽然好奇，也多敬而远之。而在义和团运动前后，山西经历甚为严重的冲击，先是义和团团民在各地大肆屠杀传教的洋人，而后也遭受了严厉的惩戒或报复。大部分人因此对洋鬼子仍存莫名的畏惧以及厌恶等负面的情绪。劳森夫人和艾伟德没有气馁，她们努力主动招揽生意，并进行了分工：劳森夫人请来的厨子老杨，负责在客栈厨房为旅客提供较为可口的小米粥、面条等饭食，并给牲畜预备好草料；劳森夫人负责给客人们讲《圣经》里的故事，作为客人们吃饭时的乐趣，这也是其摸索出的传扬上帝福音的新方法；艾伟德的责任最大，需要到街上把经过的骡队想办法弄进客栈的院子里。

在伯吉斯的《小妇人》（*The Small Woman*）一书中，艾伟德是这样揽生意的：她站在了客栈门口，有些害怕在拉骡子缰绳的时候被牲畜踢到或者咬到。老杨教给她几句简单的欢迎词：“没有臭虫，没有跳蚤，好，好，来，来”，“来、来、来，大家快来听故事！”虽然有点马戏团里演员的感觉，艾伟德还是努力进行了各种尝试。她先把牲畜喜欢吃的草料从院子里一直撒到客栈外的街上，然后一看到有骡子商队经过，就冲上去，用蹩脚的中文大声喊出老杨交给她的那几句话。经过屡败屡战，艾伟德终于拉住了一个骡队里头骡的缰绳，尽力把它拽进客栈的院子里，后面的骡队也随之跟着全部进到客栈里。赶骡子的骡夫最初不晓得这个瘦小的洋婆子要干什么，但当他远远地看到同伴们没受到伤害，也就进了客栈。

在晚年自述中，艾伟德也讲到了这间客栈。最初，中国人确实不愿意住进他们的客栈，因为他们听说房子里有鬼。劳森夫人平静地告诉他们，她是信仰上帝的人，已经把鬼都赶走了，至少从她住进来以后，从没有见过任何的鬼！于是慢慢就有人进来了，在劳森太太讲《圣经》里的故事时，艾伟德也在听，并认真、努力地学习当地的方言。但她主要的工作是喂好骡子，刮掉牲畜身上的泥巴，使骡夫们可以安心地坐在房间里听劳森夫人讲《圣经》里的故事。后来，艾伟德也尝试着以并不流利的中文为骡夫们讲那些故事。习惯了聚赌喧闹闲侃的骡夫们，开始没有什么心思听艾伟德讲那些带着奇怪腔调的故事，还常常取笑她，但艾伟德并不灰心。渐渐地，骡夫当中有人在听故事的过程中成了基督徒，他们还自己定了公约，在客店内不准吸烟、饮酒、赌博以及大声喧哗，以免影响艾姑娘说故事。骡夫们的生活逐渐发生了明显的改变，不再抽烟、喝酒、赌博，也不再讲脏话，或唱黄色小调。于是，客栈的生意也变得越来越好，甚至省外都有人知道了这家西方女人开的客栈。当地村民们也一遍又一遍不厌其烦地听艾伟德为他们讲的故事，渐渐也有人相信上帝，从而逐渐形成了教会。以开客栈、讲故事、唱歌传道的方式进行传教，是劳森夫人和艾伟德在实践中摸索出的与众不同的传教方式。

除了客栈工作外，到了星期天，劳森夫人和艾伟德会很早起来，下到周

围的村子。她们找到片空地，就尝试着和当地好奇的人们进行接触交流。艾伟德开始拼命学中文。她不是靠书本，而是通过自己的耳朵去学习，在掌握了几句简单的用语以后，就开始给人们唱歌。晚上，回到客栈，艾伟德继续干着刮掉骡子身上的泥、喂好骡子的工作，并照顾那些走南闯北、有着难闻味道的车夫们。这显然与来华前所想象的生活存在很大的差距，但艾伟德相信上帝，相信他会为自己开路。

劳森太太年事已高，有时身体也不好。两个性格迥异的人同在异乡，劳森夫人年长、个性严厉、处事独断；而艾伟德年轻、充满热情。她们的相同之处就是都完全相信是上帝派她们来到阳城，而她们所从事的是上帝喜欢她们做的工作。艾伟德渴望像劳森太太一样流利地向人们讲话，她为此非常努力。不到一年，艾伟德已能听懂大部分人对她所讲的话，也能让他们听懂她所说的话。渐渐地，晚上由艾伟德为赶骡子的骡夫讲故事的情况多了起来。通过说书，艾伟德得以强化自己的语言训练，而且通过反复讲说《圣经》故事里常出现的词汇，艾伟德也得到了—种非刻意为她自己所设计的传教训练。

大约1933年11月（即艾伟德自称的“来华一年之后”），劳森太太失足从二楼阳台跌下来摔伤，艾伟德尽其所能地精心照顾她。根据陈中陵在《孤儿之母：女传教士艾伟德的生平与形象》中的研究，由于附近没有医生，艾伟德用马车将劳森夫人送到潞安府的西式医院（名为鸿恩医院）进行治疗。然而，劳森夫人还是因为伤势过重而去世了。从此，艾伟德成了阳城地区唯一的欧洲人，作为一个年轻女人，每晚面对那些来客栈的赶骡人，她感到很孤单，处境也很艰难。艾伟德忧虑重重，开始祈祷，想知道上帝是否要她离开阳城，她完全不知道自己的下一步该如何走。

## 2. 放足监督

近代中国的反缠足运动最初是由来华的西方传教士推动的，主要是宣传劝导，少见有组织的活动。甲午战争以后，西方传教士和一些社会改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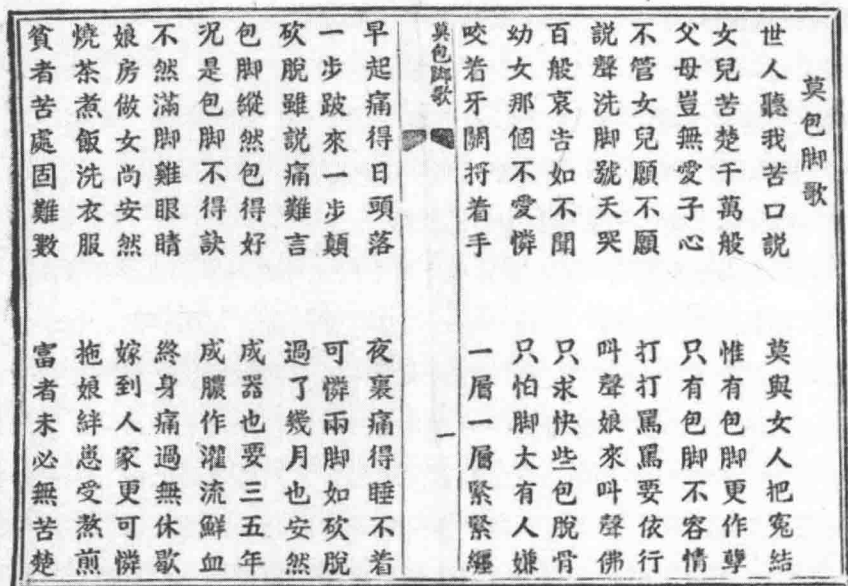


图2.5 《莫包脚歌》书影

人士开始有系统地成立不缠足组织。戊戌变法中，在民间的不断呼吁下，中国官方的力量才开始逐步参与到其中。

山西的不缠足运动较之沿海省份以及通商口岸地区要晚一些。辛亥革命后，留学日本的阎锡山回到山西并掌握了政权，他曾不遗余力地推动山西的反缠足运动。

1916年12月，山西省政府发布了《修正严禁缠足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规定：“妇女未缠者不得再缠，已缠者年在十五岁以下一律解放。同时还禁止给缠足及饰木底之女子做媒，否则科罚媒人，罚金与继续为幼女缠足之父母同。”在实行禁缠令的同时，山西还规定虽然各县委派的女稽查员数量不限，但至少要有五个人，以便分赴城乡进行调查监督。《严禁缠足条例》还规定了女稽查员资质，即毕业的女学生且年在20岁，而且女稽查员必须是天足或者已经放足的女士。为了防止稽查员徇私舞弊，《条例》还规定下乡时稽查员一切食、用，都要自备，

不准由各村提供。（山西村政处编印：《山西村政汇编》，沈云龙：《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98辑第972册）

1917年9月3日，阎锡山被北洋政府正式任命为山西省省长。10月1日，阎锡山发表“六政宣言”，开始实施“六政”，即水利、种树、蚕桑、禁烟、剪发、天足。放足成为阎锡山治理山西的六类重要事项之一，随即山西省指令下属各县成立天足会。阎锡山的重要幕僚晋城人郭象升为此还洋洋洒洒撰写出一篇《山西全省天足总会公启》，详述妇女缠足的六大弊端，即伤身、累事、弱种、诲淫、服妖、碍学。（郑裕孚编：《郭叔叙文钞》，《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2辑第39册）1919年，在阎锡山颁发的《人民须知》中，也特别提到缠足的危害：“妇女缠足的害甚大，不止行动不便，并把筋骨损坏。世界万国都没有这种恶习。前清皇室也同是天足，就是汉人缠足，也是数山西最厉害。所以山西人口越少，身体越弱。这害不除，关系甚大。以后男人有娶缠足女人的，一定要问他重罪。”（阎锡山颁发：《人民须知》，六政考核处1919年印）

在禁止缠足问题上，山西推行得较为认真，但成效却是有限的。早在1921年，山西当局其实已注意到有些地方，如壶关县，为规避放足出现令女早嫁的情况。于是，山西省特别指令壶关县要设法劝禁，鼓励村人实行禁约以除陋习。此外，山西省还曾指示陵川县，不可因农忙而停止下乡严禁幼女缠足的活动（山西村政处编印：《山西村政汇编》，第228~229页），由此可见，山西民间设法规避抵制放足的情形很是普遍，说明放足还是不为民众所了解与接受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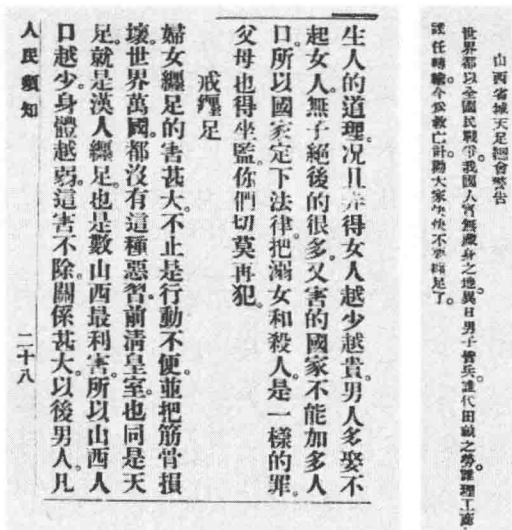


图2.6 山西颁发的禁缠足文件

1928年5月，南京国民政府内政部颁布了《禁止妇女缠足条例》，同年下令各地进行户口调查，统计缠足妇女的人数。为此，山西省做过多次统计，一直在努力推动放足。1932年，山西省制定了《查禁妇女缠足考核办法》，用层层考核的办法推动各县县长、区长推进放足的工作，“由视察员切实查报，以备考核”，并且考核是以完成放足的人数来评定，“如办理查禁缠足之成绩不及百分之七十者申警，不及百分之六十者记过，不及百分之五十者减月俸十分之二”。（转引自杨兴梅：《身体之争：近代中国反缠足的历程》）

早在1919年，阳城即在县知事吴杰的主持下展开了禁缠足运动，当时阳城各村的公共场所，都有“稽查赌博吸烟缠足”的标语。西关村村民王和尚还因隐藏女儿躲避放足被罚过大洋五元。（张惠民：《从绣花鞋漫谈吴知事解放天足》，《阳城文史资料》第1辑，1987年）但是推行了十数年之后，阳城的情况与前述之壶关、陵川一样，并不乐观。1932年《监政周刊》第2卷第5期刊出署名王春的一篇文章，名为《阳城农村状况概观》，指出当时阳城的女子“皆裸娃娃、裹小脚、拾野菜，更无入学者”。可见20世纪30年代前期的阳城，女性缠足仍很普遍，而且接受教育的女性很少。于是，要在阳城当地寻找一名合格的女士担任放足女监督，并不容易。另外，如前文所述，禁止缠足一直是以阎锡山为首的山西省政府推行的“六政”之一，并且放足的效果又是当时山西省府对各地县长考核的重要依据，并且还会直接影响到县长的经济收入。这些背景交织起来，构成来自西方的传教士艾伟德被阳城县县长任命为放足监督的客观因素。

更为重要的是，艾伟德自己也需要找到一份新的工作或者收入来源。劳森夫人去世后，艾伟德经历了到中国后最难熬的一段时间，她需要独自面对许多事，其中最严重的问题是，劳森夫人的去世导致英国差会停止了此前按期汇来的补贴。虽然客栈的租金劳森夫人当时是按年支付的，暂时没有问题；但是假如没有其他收入来源，一旦发生了意外，艾伟德和厨师老杨等人的生活就会出现危机。这时帮助艾伟德渡过难关的是两个人：一





图2.7 劳森夫人葬礼上众人合影。（二排左三为艾伟德）

为厨师老杨，另一为阳城县县长，都是她未曾想到的。

老杨操持了劳森夫人的葬礼，并将劳森夫人放入棺材，密封起来。劳森夫人大半生在中国度过，其葬礼理应肃穆、庄严。为此，老杨从城里找来一位有照相机的老者，拍下劳森夫人下葬前的情景。就在院子里，住店的赶骡子的把式、邻里乡亲，以及皈依基督教的信徒（照片中手里捧着《圣经》），还有几个好奇的孩子，都想被摄入照片里，于是所有人围坐在棺材四周，照相师按下了快门，拍下了当时的景象。这张照片后来被艾伟德寄给了远在英国埃德蒙顿的妈妈，否则可能也不会保存下来。

劳森夫人去世后，艾伟德的生活究竟如何？据伯吉斯《小妇人》里的记载，艾伟德继续从事自己的传教事业，也没关掉客栈。因大山阻隔，许多人一辈子就只在自己的家乡活动，相距二三十里的村子之间交流也可能存在困难。艾伟德意识到方言的重要性，随着时间的推移，她的中文越来越好，并很快掌握了五种方言，可以用阳城各地的话流利地与人交谈。但

在艾伟德自己给亲人的信里，呈现的却是另一番景象，该信作于1936年7月21日，后文还会详述，故此处仅摘出其中的一小段：

劳森女士去世后，我在附近居住了一段时间后，去给霍伊特医生帮忙，他的妻子将要临产……孤零零的生活在中国，我仍然没有一处自己的住所，只有很少的钱，也不懂多少中文，这真是很令人不快的感觉。

不管怎样，艾伟德的生活仍要继续。几周后的一天清晨，客栈里的厨子老杨建议艾伟德去拜见一下县长，表达她对政府的敬意。对此艾伟德起初有些不解，因为她认为张县长不会接见她的，而且事实上她也不习惯与政府打交道。之前劳森夫人在世时，都是老人负责与政府打交道，去办理税务以及执照等问题，艾伟德可以不用考虑这些事，但如今情势已经完全不同，所有的一切都需要她自己面对。而且老杨的坚持也不无道理，县长是一县的最高长官，掌握生杀大权，对于艾伟德以及阳城教会的生存与发展也很重要。艾伟德认清了这个现实，却不清楚拜见县长时的礼仪，比如该穿什么衣服，如何行礼，以及谈些什么，等等。老杨也不清楚，他也从未见过官员。于是，艾伟德让他先出去打听一下。许久之后，老杨回来问过了许多人，都不知像艾伟德那样的外国人该怎样做，只是建议她穿着考究、正式一点。艾伟德没有考究、得体的衣服，不过还是决定去见县长，但她确实有些不安，毕竟要见的县长是当地最有权势的人物。

就在和老杨谈话后的第三天，艾伟德听到客栈门外突然骚动起来。老杨立即跑出大门，很快就慌慌张张跑回来，告知艾伟德，县长来客栈了。艾伟德走到屋外，发现有个人已在众人前呼后拥下进了客栈的大门。这人正是县长，他身材修长，身着考究的长袍马褂。艾伟德不知他为什么来，所以有些紧张，但还是上前深深地鞠了一躬，将其迎进屋内，上茶款待。

因为是初次见面，县长也略有些不知所措，但寒暄几句，尤其是问到劳森夫人的情况，一下拉近了宾主之间的关系。县长接着向艾伟德表明其

来访的目的，是想请她为政府帮忙。对此，艾伟德颇为吃惊。于是，县长向艾伟德解释南京中央政府下令中国各地必须终止缠足习俗的情况；山西省政府推行放足好多年，并制定了严厉的处罚措施，但成效并不显著；如今省政府将监督放足的成绩作为县长政绩考核的重要内容，这极大地困扰到了县长本人。此前，阳城县也遵行省里的指令，设立过放足监督员，多是男人，不方便查看女人的脚；而且监督员多是本地人，下乡巡查时容易受到各种因素的干扰，以致工作效果大打折扣。为了完成上面交托的任务，阳城县必须要找到合适的监督员，检查当地女孩的脚步，禁止她们缠足；同时要劝导年轻的女人们放足。可是，找到合适的监督员确实不是件容易的事！无奈之下，经人提醒，县长注意到居住在县城东关镇的英国女人，想到她们没有人情和传统的羁绊，一定能更加尽职尽责，显然是合适的放足监督人选。

后来，县长还向艾伟德介绍了放足监督的职责与待遇：要经常到全县各地进行巡视，向村民们宣示政府的命令，还要检查女人们的脚，禁止小孩子们缠足，并统计相关数据。如果有人阻挠工作的推动，可以直接向他汇报。至于待遇方面，县里会给监督员提供一匹骡子和两名警察；巡视期间，每天提供一斗小米，还有用于买蔬菜的一些钱。（价值约等于一个便士的四分之一）

来中国之后，艾伟德已注意到缠足对中国女人身体的伤害以及造成的不便，但对于县长突如其来的请求，艾伟德还是不知是该接受还是拒绝。在听完县长的话后，旁边的老杨脸上却现出了惊喜的表情，他一直在暗示艾伟德赶快接受这一任命。因为，虽然县里给的钱粮并不多，但为公家当差的身份还是许多人梦寐以求的。

不过，艾伟德还是时刻记得自己来中国的使命，是要引领这里的人民认识并接受她的上帝，故而向县长提出，在承担监督妇女放足任务的同时，也希望可以在农村里进行传教。这样的要求令县长的随行人员很是吃惊，但县长本人却并不在意，因为省里对地方上放足的执行情况催得很紧，当务之急是找到合适的监督人员；此外，自中华民国成立以来制定的

法律中早就包含了信仰自由的内容，县长也觉得基督教信仰或许有助于当地的人们改变缠足的传统与习惯。故而，县长并未感到艾伟德的请求冒犯到他。于是，艾伟德便成了阳城县的放足监督。

那么，委任艾伟德为阳城县放足监督的那位县长究竟是谁？《震惊世界的六福客栈》一书曾对此有所探讨，文中首先根据艾伟德的来华时间推导出劳森夫人去世的时间，然后再对照《阳城县志》中有关民国时期历任县长的记载，最终确定是1931年任职的山西洪洞人张书榜或1932年担任县长的右玉人毛凤岚。但文中将推理的起点——艾伟德出发来华的时间定为1930年10月（伯吉斯《小妇人》中的记载），无疑是错的，因更为可靠的资料显示其来华时间应为1932年10月。于是，艾伟德担任放足监督的时间只得顺延，应在1933年下半年或者1934年初。如此一来，据《阳城县志》的记载，时任县长就应该是毛凤岚或者员祖千。但是，1958年有旅台山西籍人士曾明确指出过阳城是在1933年成立的查足委员会，艾伟德是应时任县长张书榜之请出面协助当地放足的。（《福斯宴山西同乡就〈六片〉交换意见》，《联合报》1958年1月17日）显然《阳城县志》的记载与旅台山西人士的回忆出现了矛盾，只能存在两种情况：《阳城县志》的记载有误，或者旅台山西籍人士的回忆有误。事实上，1933年9月时，张书榜应该还在阳城县长任上，证据是1934年出版的《山西省禁毒汇编》，内中载有1933年9月23日山西省禁毒委员会曾函请省政府将禁毒不力且被举报在县政府吸毒的阳城县县长张书榜撤职的公文（山西省查禁毒品委员会编辑处编：《山西省禁毒汇编》上册，太原：撷华石印馆，1934）从而说明《阳城县志》记载有误。故而，委任艾伟德担任放足监督的县长是张书榜，应该没有疑问。

县长离开之后，艾伟德回到房内，马上虔诚地向上帝表示自己的感谢，多日来她一直为客栈及自己的将来而忧心忡忡。如今，居然一下就全部得到了解决；而且作为放足监督，虽然是在中国，但是公职人员的身份仍是曾为女仆的艾伟德从未想过的事情。

新的工作很快就有条不紊地开展起来，因为艾伟德要到各地去，而

且通常一去就是一周或更久的时间，所以她把客栈交给了老杨和路运成（音）负责。艾伟德常骑着骡子一大早就起程，骡背上驮着足够的干粮和铺盖，而两个警察就跟随在她的左右。每到一个村子，警察就把所有村民召集到一起，向他们宣讲政府的命令，包括宣布缠足违法，违者要接受惩罚，等等。村民们大多诚惶诚恐地听着，虽然有些男人们看起来不高兴，觉得那是古老的习俗，是美的；女人们也担心孩子不缠足会嫁不出去。接着警察会极为郑重地介绍到艾伟德，让人们了解到这个西方女人是县长大人亲自请来的放足监督，每到一处她都要亲自查看妇女及女孩们的脚，任何拒绝或逃避接受检查的人都会受到县里的惩罚。

在警察们的训话结束后，艾伟德开始说话，她会讲一些类似《小红帽》的童话，让村人们先是高兴起来；接着会教他们唱些歌，并解释那些歌词的意思；然后告诉他们缠足是不对的，男人和女人的脚，生来没什么分别，女人的脚只不过通常比男人小一点，那是上帝让它们生来就那样，他并不愿看到女人们将自己的脚骨弄成畸形而变成小脚。艾伟德还指出中国政府已经在三番五次地颁布命令，要求年轻的女人或者女孩都要有一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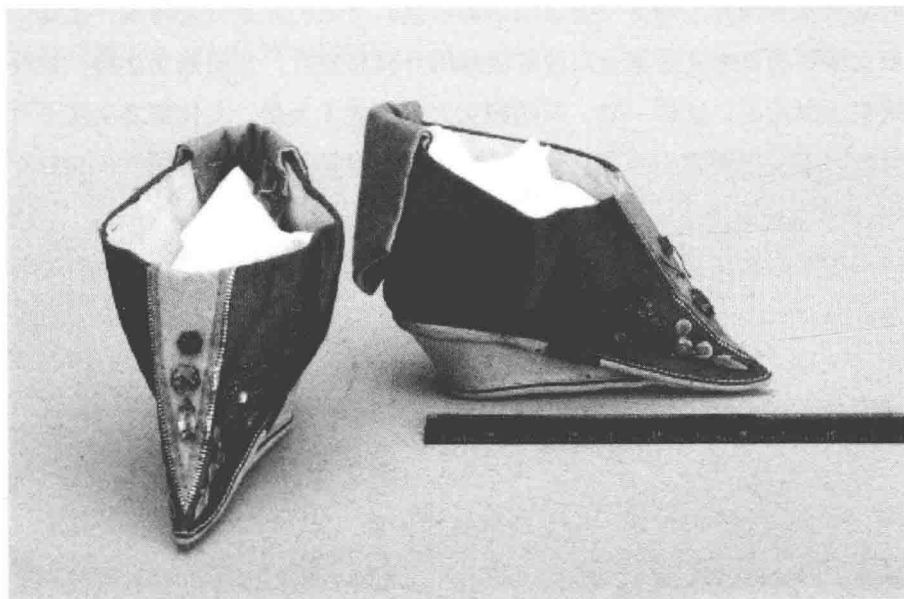


图2.8 伦敦大学亚非学院档案馆所藏艾伟德收集的“三寸金莲”

天足，不能再缠小脚；任何妄图继续给孩子缠足的父母都会受到惩罚，不仅是罚款，而且可能会被关起来。年纪太大的女人脚已没办法矫正，但是年轻的女孩还有机会恢复，必须要放足。最后，艾伟德会要求女孩们自己解开缠脚布，甚至她会亲自动手去剪，然后将女孩们裹了许久的脚清洗干净，换上大点的鞋子。女孩们起初很不情愿，担心将来会嫁不出去，但经艾伟德等人耐心解释之后，比如政府颁布的法律已规定禁止男人娶缠足的女人，接受放足的人逐渐多了起来。

如此，随着时间的推移，艾伟德几乎走遍了阳城的大小村庄，和当地的人们逐渐熟悉了起来，她的中文说得越来越好，很受人们的欢迎。人们时常听到艾伟德讲那些《圣经》里的故事，不少人成了她的朋友，也有不少人成了基督徒。

事实上，作为放足监督，艾伟德为阳城女性恢复天足所付出的努力也留在一些人的记忆里，“民国二十二年（1933）当时曾严令放足，县政府特别成立查足委员会，看见谁裹脚，就强令放足，一般不愿意放足的便穿大鞋，里面衬垫棉花，查足队都是男人，不便动手脱鞋查看，于是当时县长张书榜先生请艾伟德出面协助检查，女人们究竟方便得多，把每个妇女请到房里由艾伟德亲自脱鞋脱袜解开脚布查看，如果确是小脚，她便乘机予以劝说，这样一来，阳城妇女大多都成了天足，艾伟德之功实不可没。”（《福斯宴山西同乡就〈六片〉交换意见》，《联合报》，1958年1月17日）

艾伟德被越来越多的人尊称为有德行的人，她也获得了一个中文名字，即“艾伟德”，但人们还是习惯称其为“艾教士”。

### 3. 救助难童

20世纪30—40年代，华北地区灾害不断，如1933年的黄河大洪水，1934年的全国性大旱灾，乃至1938年黄河花园口决口，等等。灾害造成了饥馑，导致大量乡民背井离乡。而在此一时期，一方面，山西的灾害程

度常较临近的河北、河南、山东等地要轻一些，以1931年四省受灾的县数为例，河北为95个，山东为59个，河南为85个，山西为46个；1939年河北为104个，山东12个，河南为42个，山西为6个；另一方面，1875年的“丁戊奇荒”导致山西人口减损甚大，而人口的恢复速度却较之河北、山东、河南要缓慢得多，故而人口压力相对要小一点。于是，因为地缘关系，山西省成为邻省灾民迁入的主要地区，其中东南部晋城、阳城等与河北、河南直接毗邻的地区，自然也承接了相当数量的灾民。（冯素梅：《20世纪三四十年代晋冀鲁豫的灾荒及农民离村现象》，孙丽萍等著：《1937—1945年山西民众的生存状态》，山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

事实上，20世纪30年代阳城当地的状况也并不是很好。农村经济本已经日渐凋敝，而又遭遇连番的军阀混战，大量军队过境或者驻留，给当地民众造成沉重的负担：1930年中原大战中阳城驻有大军，阳城每日要为军队提供粮米万石，更兼前此每月需贴给晋城粮秣费一万大洋；另外，军队哗变以及土匪的劫掠也对当地造成很严重的侵扰。1929年秋河南新安股土匪八千人窜入，肆意抢掠；1930年冬过境兵一师哗变，1931年当地驻军又有哗变，导致阳城连遭洗劫，民不聊生。（《阳城农村状况概观》，载《监政周刊》1933年第2卷第5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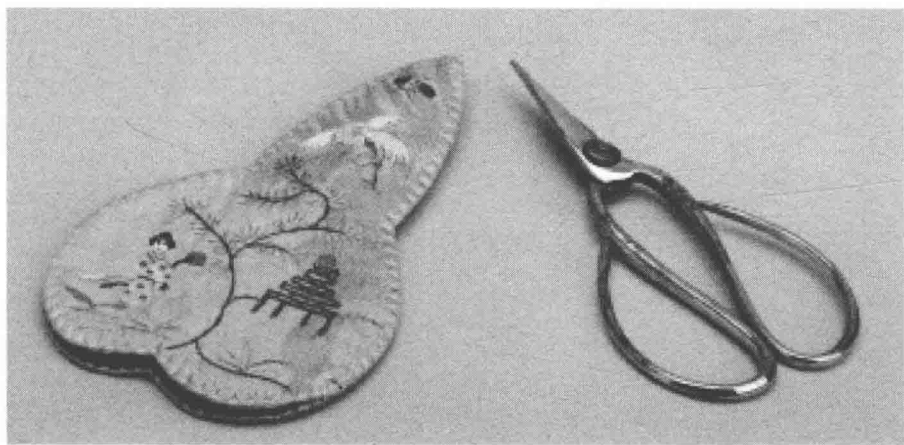


图2.9 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图书馆所藏艾伟德曾用过的剪刀及布袋

中国向来有“多子多孙”的传统，以致生得多、养不起的情况严重，在农村尤其明显，一旦遇到饥馑或者逃难，父母将养不起的儿女遗弃或贩卖的情况并不罕见，其中尤以女童为多。20世纪30年代，南京政府注意到这个问题，并因之实施了《全国普救流浪儿童运动方案》，将1935年定为“儿童年”，以示重视儿童的福利，可见当时遭遗弃的流浪儿童问题是多么严重。（《全国普救流浪儿童运动方案》，见《中华基督教教会年鉴》第13册，台北：中国教会研究中心、橄榄基金会，1983年影印版）

在阳城的时候，艾伟德也注意到流浪的孤儿以及难童的问题，并开始着手进行救助，这些后来成为其人生中最为人所称道的事迹。

某年盛夏的一天，在去拜见县长的路上，艾伟德看到路旁坐着的一个女人还有一个小女孩。阳光无情地晒在孩子的头上，她看起来病得很重，身体又瘦又脏，还生了许多的疮。目睹到这一切，艾伟德心生怜悯，本欲劝说女人把孩子照顾得好一点，却遭到了抢白。女人明言只要给她钱就可以把孩子带走。艾伟德之前有听说过买卖孩子的情况，但并未当真，如今亲眼看到孩子被明目张胆地买卖，真的很生气。艾伟德不相信政府会容忍这样的事情发生，于是见到县长后，直接提出希望政府进行干预。县长的



图2.10 艾伟德与养女“九便士”及其子合影



反应是无能为力，因为买卖儿童是常见的事，管也管不完，除非中央政府颁布相关的法令。艾伟德很失望。在回去的路上，她又碰到那个女人以及孩子，经过讨价还价，她拿出了身上所有的钱，九便士，从女人那里买下了小女孩。艾伟德给她起名为美恩（Mei-en），小名即“九便士”。这是艾伟德正式收养的第一个小孩，也成为日后收养更多难童的滥觞。

“九便士”的到来，给自劳森夫人去世以后陷入空虚寂寥的艾伟德带来了极大的慰藉。她细心地为女孩清理、治疗、包扎溃烂的疮口，给她换上干净的衣服，照顾她吃饭。小女孩很快就恢复了健康，脸上也逐渐显出了红润。起初，九便士因为陌生、胆怯，对新的环境还有些畏惧；当她发现周围的人们并无恶意以后，很快恢复了孩子的天真与烂漫。艾伟德逐渐发现小女孩的眼睛会因她的靠近而放光，这让艾伟德感到一种母性的释放与满足。每天给“九便士”洗澡，一起吃饭，生活中多了个人可以爱、可以关心，来到阳城的艾伟德第一次真正有了家的感觉。据阿兰·伯吉斯所著、张继新翻译的《八福客栈》记载，数月后，“九便士”从街上带回一个小男孩，大家都为这个孩子愿意少吃一口，故他的名字就被叫作“少少”；第二年春天，“九便士”和“少少”又带回一个更小的孩子，艾伟德为之起名“宝宝”。

据艾伟德回忆，在巡视一个名为元村（音，原名Yuan Tsun）的地方的放足情况时，在其本人以及警察的严令下，该村一个秦姓（Ching）女人最终交出了五个缠脚的女孩。艾伟德亲自剪开裹脚布，并用清水为她们清洗已经变形的脚。秦姓女人对艾伟德和警察感到非常害怕，担心自己会被抓到监狱里去；但她更害怕的却是主人回来以后对她的惩罚。经过了解，艾伟德才明白女人是被主人买来的，用于监管女孩们缠脚，而那些孩子也是从外地买来的，等她们长大一些再卖出去。艾伟德先是安慰恐惧的秦姓女人，称上帝会帮助并保护她，最后还把女人以及五个孩子都带回了客栈。当她们回到客栈时，受到“九便士”等人的欢迎。厨子老杨在做饭的时候，还告诉女人艾伟德的为人，比如她不会烧菜，但她爱孩子，对孩子们而言，艾伟德可能远超他们的父母。孩子们有时很顽皮，但艾伟德从不生

气，因为她清楚地讲过上帝爱顽皮、恶劣的人。秦姓女人与孩子们一起吃饭，听他们唱赞美诗，最终也皈依了基督教，留在客栈中帮忙照顾孩子。后来，艾伟德借助与县长的私人关系，通过诉诸司法等合法的手段，将女人及那五个孩子从残暴的人贩子手里解救出来。

随着孩子的增多，艾伟德还从潞安（长治）请来老师，给其中适龄的几个孩子上课，并教他们唱歌。艾伟德继续收养流浪在外的孩子或者孤儿，不过数量并不多。真正大规模收养孩子是在1935年。据阿兰·伯吉斯的《小妇人》记载，这一年黄河发生大水，数以百计的无辜民众在洪水中丧生，更有数以千计的灾民无家可归。为了逃避水灾，无奈的难民只得成群结队地逃往地势较高的深山，从阳城、泽州，直到沁水地区，到处是衣衫褴褛的难民。天灾造成的难童问题很严重，艾伟德与当地教会逐渐承担了本来属于政府的社会责任，甚至县长也认为救助难童是他们的责任。在这次的黄河水灾中，艾伟德一下收容了四十多名难童。（《祖籍英国女教士艾伟德昨抵台》，《联合报》1957年9月3日）除了天灾，人祸亦随之而来。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1938年春季以后，日军数次轰炸了阳城地区，导致死伤惨烈，也造成了大量难童的出现。艾伟德再次积极投入难童的救助工作当中，很快又收容了至少六十多名难童。于是，艾伟德将自己的大部分精力用于筹款解决孩子的吃饭问题以及照顾他们。（《祖籍英国女教士艾伟德昨抵台》，《联合报》，1957年9月3日）

艾伟德来华的最初目的是传教，但在中国的大部分时间里，她投入精力最多的却是救助孤儿、难童。在天灾人祸导致的恐慌中，艾伟德充分发挥女性的特质，在积极救助难童的过程中，也扩展了基督教的影响。据艾伟德的回忆，因为收养孩子的关系，她真正感受到自己是一个为他人所需要的、所尊重的人。事实上，县长也支持她的工作。艾伟德时常进入县长的宅邸，汇报监督放足的事情，有时也会与县长的女眷聊天。随着接触的日益增多，艾伟德与县长之间的友谊也日益加深，他们经常聊到东西方的历史、文化、哲学，甚至宗教等问题，即便他们对另一方所谈的内容还

常存在不少似懂非懂的地方，但无疑拓宽了彼此的视野。虽然县长尚不能接受艾伟德所传扬的基督教道理，但钦佩她在阳城所做的一切；而艾伟德通过与县长的接触与沟通加深了对山西乃至整个中国的认识。在与县长的交流中，艾伟德从没有一种处于劣势或者自卑的感觉，她感受到了从前在英国从没有过的尊重。

在生活中，艾伟德已经完全像个中国女人，穿中国人习惯穿的衣服，吃中国人习惯吃的食物，还讲他们当地的土话。她甚至发现自己开始以他们的方式思考，以至于中国日渐成为艾伟德“自己的国家”，身边那些北方的中国人就是她的同胞。根据伯吉斯的《小妇人》记载，1936年，艾伟德就做出一个惊人的决定，要成为真正的中国人，即加入中国国籍。艾伟德后来屡次谈到自己加入中国国籍的动机，是以“自己人”的身份更好地推动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当然，艾伟德并非最早申请加入中国国籍的西方人。早在1927年，原籍比利时的天主教神父雷鸣远（Frederic Lebbe, 1877—1940），即以同样的心态加入了中国国籍，并且两人在抗战中有过交集，此为后话。艾伟德向当局提交了国籍申请，但因抗日战争的爆发以及自己的离开未能收到政府批准的文件。

#### 4. 监狱传教

在电影《六福客栈》中，珍爱（其原型即艾伟德）置个人安危于不顾，进入阳城的监狱里平息了一场骚乱；伯吉斯的《小妇人》中也有类似的记录，两者皆讲到骚乱是因监狱方面克扣犯人的口粮所导致的。电影《六福客栈》以及《震惊世界的六福客栈》一书还试图还原艾伟德平息骚乱的过程：先是出其不意抢下了犯人手里的斧头，后将监狱变成了布道场所，把犯人当成了传教的对象，给他们讲解耶稣的伟大和博爱，讲解与人和睦相处的道理，讲解洗心革面重新做人的重要，讲解父母妻儿的痛苦与牵挂，最后甚至还为犯人们争取权益，促使监狱为犯人提供了工作的机会，从而使得犯人们得到足够的食物，进而推动了监狱中狱政的改革。

《震惊世界的六福客栈》还指出艾伟德之所以能够成功制止骚乱，并赢得犯人们的信任，是因为她非常擅长与底层民众打交道，而且认为平息监狱暴乱的事迹提高了艾伟德自身的社会地位和知名度，使其逐渐进入了县政府议事圈，并开始列席参与相关的会议。

然而，无论是在电影《六福客栈》还是《小妇人》《震惊世界的六福客栈》书中，都没有明确记载艾伟德在监狱中平乱的时间以及地点等基本信息。而且在艾伟德晚年的个人自述中，也没有提到自己在阳城曾平息监狱骚乱这件事。那么，该事件究竟真实发生过么？抑或只是畅销书作家伯吉斯或者其他人的杜撰呢？

1937年9月，英国杂志《基督再临的见证》（*The Christian Advent Witness*）上有一篇题为《艾伟德》（*Gladys Aylward*）的文章，讲到了艾伟德在监狱传教的经历，当时抗日战争已经爆发。文中截取了艾伟德写给家人的一封信里的部分内容，这里转述如下：

两周前，我像平常一样去了监狱，在这个肮脏、炎热、充满刺激难闻气味的地方，很吃惊地发现了一只很可爱且干净的白兔，属于一个年轻犯人的财产。那个可怜的家伙，既悲惨又颓废，他脚上带了刑具，是和一个老人锁在一起。当时景象令人非常难过，我并不想向你抱怨他们处境的悲惨，那将会导致你们和我一样心痛。当这个可怜的家伙被投进监狱里以后，家人把他所有的物品都带到了监狱，其中即有他最喜欢的宠物——大白兔，就像我们老家的宠物一样。

我尽力讲一些话安慰他。最初他因为心里过于难过而听不进去。但是当我开始唱起了赞美诗时，他抬起了头。于是，我给他讲基督教里的道理，并给他看了一些《圣教故事》里的图画。离开时，我对他说还会再来看他。

同一监狱现在还有两个已经决定皈依基督教的人，认识他们的人们都觉得是个奇迹。在我离开后，他们去看望了那个年轻

## Gladys Aylward

**B**ELOW is an extract from a letter to her sister. She needs our prayers more than ever now the Japanese have reached Shanshi. Gladys has been away now for five years. Her mother would like her to come home on furlough but this is impossible unless the Lord puts it into the heart of His people to provide the means for the journey out and back again.

"The week before last I went into the prison as usual and imagine my surprise on going into that dirty, hot, smelly place to find a lovely, clean, white rabbit, the property of one of the prisoners, a young man. This poor fellow, very wretched and down-cast, was chained to an older man and their feet in stocks. I cannot explain to you the misery of their position, it is too sad and would only make your heart ache as it does mine. Now, when the poor fellow was cast into prison his people cast him off and sent all his goods and chattels after him, among them the white rabbit, his great pet, like ours is at home.

"I tried my best to speak to him words of comfort. He at first seemed too sad to listen but I began to sing; he looked up and then I talked and showed him some pictures and said I would come again. Now in that same prison are two men, who have decided for Christ and are a marvel to all who see them, and they want in to see him after I had gone. 'It's all right to listen to,' he said, 'but it doesn't work, you say you believe in your God but it doesn't work; you are still in here.' One replied, 'It does; our God is working for us although we cannot see it, you have only to believe and keep on praying.' 'Will you pray for me, then?' said the young man. 'Yes, freely,' and they did there and then. Not long afterwards at almost dark the governor came along inspecting; he looked at the young man and pitied him and ordered the chains off and the stocks out. A prisoner able to move about. Now this is almost an unheard of thing. They get so much 'time' with no appeal, but here he was free to move about. You can hardly imagine how eager he is now to listen to the gospel.

"When we went in next time, the two men, said, 'It's Prayer that changes things,' and they believe it. It is their simple faith that is so real. These two men gave me their names and can read, so I gave them some little gospels and an old hymn book. I had it in my heart to give them a bible each, but did not mention it to anyone. One day the younger man came to meet me in tears. He had been reading his gospel and fallen asleep with it by his side and the rats had eaten most of it. I decided there and then to give the Bible and a tin box to keep it in. Next day I took two new Bibles, two new hymn books, with their names on the covers, and boxes. Oh! if you could have seen their faces it was worth going without to buy the books, for their joy in possessing them. My heart was filled with joy! Now they have

applied for a little time each day to have a little service together, surely this is the handiwork of God. I am filled with amazement at the wonder of it all.

"Men hardened and cruel killing each other for a little land, a few clothes or even for food, but crying at the story of Jesus dying for them. 'Well,' they said, 'when the Bibles were given, here is our prayer answered on the day we began to pray for them, and here they are.' God be thanked that He put it into my heart to give them these precious books. The first young man asked me to take the pet rabbit home and care for it and it is at present fast asleep under the platform in the chapel. I have called him Hsing (Star) and I'll send a snap of him to see if he's like our Twinkle at home one day later on.

"My prison work is a great joy to me as well as a great pitiful trial, the scenes there are sad in the extreme but the governor gives me many advantages and I praise God that I am able to speak for Him there in that Chinese Prison as well as in the Market Place or on the Highways and Fairs."

## Jamaica (Manchester Branch)

Dr. R. A. Kennedy and Dr. R. J. deCarteret came over from Brown's Town and gave us splendid help in launching our first meetings, which took place on the 1st of July at Spaldings and at Christiana.

After an introductory address by Mr. W. P. Clark at Spaldings, Dr. Kennedy gave an inspiring message on the parable of the nobleman going into the far country to receive a Kingdom.

At the evening meeting at Christiana, Dr. deCarteret spoke first and gave us a stirring resume of what A.T.P.M. stands for, then drawing our attention to the marvellous way in which God is preparing the world's stage for the Second Coming.

"Behold I come quickly," is the Lord's own most gracious promise and declaration. To them that believe He gave power to become sons of God. How glorious! He has made me a son of God, and so I can look gladly for His Coming. Let us all be prepared.

Dr. Kennedy followed with an address on Rev. 1, 7, "Behold He Cometh" and in the intense stillness we felt that the Lord Himself was speaking with us as the Doctor outlined the splendour and glory of Christ's Return and bade us think of the sheer magnificence and grandeur of that great event to which the world is hastening. "Are you going to be among that happy company?" "Be ye ready, for in an hour that ye think not, the Son of Man cometh!"

The Chairman in closing said that in view of that wonderful Day it is surely worth while going round telling people. Let us go away to-night in the solemnity of this thought that Christ is coming and we want to take part in that glorious event.

图2.11 *The Advent Witness* 杂志中刊载了艾伟德家信内关于在阳城监狱布道的内容

人。年轻人对他们说：“你们相信了上帝也没有什么用，还不一样被关在这里。”一个人回答说：“其实还是有用的，虽然我们

看不到，但我们的上帝一直在做工，只要你相信，并坚持祷告，就一定有成效的。”“那么你们会为我祈祷么？”“当然。”于是，他们就在那里一起祷告。此后不久，有一天傍晚县长去监狱那里视察，看到了那个年轻的犯人，怜悯了他的处境，命令将锁在其身上的链子和枷锁去掉，年轻的犯人终于可以自由活动了。这是人们多年来闻所未闻的事。消息不胫而走，你们无法想象人们如今是多么渴望听到上帝的福音。

在信中，艾伟德接着讲道：

当我们再次去那里时，那两个人告诉我，祈祷发挥了作用，而且他们是真的相信。简单的信仰在他们身上是那么的真实。这两个人告诉我他们的名字，而且他们可以识字，所以我给了他们几本简单的福音书，还有一本老的赞美诗。我最后拿给他们每人一本《圣经》，但并不意味着其他人也可以每人得到一本。某天，一个更年轻的人哭着来见我。因为读的时候睡着了，结果放在身边的《圣经》被老鼠啃掉了大半，让他感到非常伤心。我决定送给他一本《圣经》，还有一个用于装纳《圣经》的小盒子。第二天，我就带给监狱里那两个人两部新的《圣经》、两本诗歌，以及两个放书用的盒子，并且在每本书的封面上写下他们的名字。如果你可以见到他们的话，很值得看一下他们的表情，无偿地获得《圣经》还有赞美诗，令他们非常的快乐。我的内心也非常快乐！现在他们每天都花上一点时间阅读《圣经》。我相信这一切都在上帝的掌管之中，而且我对如今发生的这一切也感到甚为惊奇……我对到监狱里进行布道的工作感到非常快乐，这也是体现上帝充满伟大怜悯的很好见证。那里的环境着实令人难过，但县长给了我许多便利，我可以随时称颂上帝的大能，也可以在监狱、市场还有马路边谈论上帝。

《基督再临的见证》里刊载的这封艾伟德写给家人的信作于抗战爆发之后不久。虽然仅据这封信，我们仍无法判断艾伟德平息了监狱里骚乱的事情是否真的发生过；但从中却可了解到艾伟德在阳城监狱里传教的情景，给犯人们以安慰，耐心为他们讲解基督教的教义，为他们唱赞美诗，并提供《圣经》、赞美诗，等等。艾伟德对犯人没有丝毫的歧视，在其看来，即便是罪犯，也不应被人当成猪去对待，更不应被排除于上帝的怜悯、赦免与恩典之外。这是艾伟德此前救助难童的原因，也是她勇敢地走进县长都觉得可怕的监狱，通过温馨安慰，耐心讲解，促使犯人洗心革面重新做人的原因。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事实上，根据艾伟德晚年的回忆，探访监狱，向犯人们传播福音，都是经过县长批准的，并得到他的赞赏。不管怎样，艾伟德在监狱里的传道工作确实收到了效果，不少犯人因之皈依了基督教。

## 5. 家信中的战前生活

劳森夫人去世后，艾伟德不仅要承担阳城教会的各项工作，除吸引人们皈依基督教外，同时也要管理客栈，还要到各地的农村巡视女人们放足的情况。此外，收养难童之后，艾伟德也要照顾他们的生活，给他们讲基督教的教义，每天都很是忙碌。据艾伟德晚年的回忆，虽然当时已经交到不少的中国朋友，但她仍渴望来自英国的伙伴。为此，艾伟德曾向上帝祈祷了好几年，希望有英国人（尤其是男性）来中国分担一下她的工作。上帝没有回应她的请求，艾伟德只得继续独自一个人工作。许久以来渴望有丈夫、有自己的孩子的梦想渐渐消退无影。在艾伟德看来，上帝可能倾向于让她独自走完自己的一生。但有时孤独确实令人不堪重负，艾伟德也因而曾经感到极度的沮丧。

这种沮丧的产生，多与传教过程中遇到的困难以及身体的疾病有关。同为英国传教士的莫理循，曾经描述过传教士在中国传教过程中的实际情形。在所著《中国风情》一书中，莫理循讲到曾在许多中国城市里遇到

来自社会各个阶层的传教士，虽然他们常自称对传教工作的进展满意，但事实上并非如此。一个传教士每年改变不了几个中国人的信仰，以1893年为例，1511个新教教徒发展了3127个中国人信奉新教，但其代价却相当惊人，花费了相当于伦敦排名前10位的医院收入总和，即35万英镑。而这些所谓的3127名中国人中也并不全是地道的基督徒。所以，尽管多数传教士来中国前满腔热情，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时中国人对这种传道方式多不以为然，认为是“瞎鸡捉虫，白费劲”，可见效果是如何的令人沮丧。

除了传教工作上的挫败感外，来华的传教士们还必须要承受无边的孤独、寂寞。在同一书中，莫理循还提到了在四川见到过的一位女传教士。

在英国，她生活在一个欢快、幸福的家庭里，有兄弟姐妹，家乡气候也很宜人，她精神、身体都很好，全身充满青春活力。她认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真是值得，真是幸运。可是来到中国后，她的感觉完全变了，几乎忘记了健康感觉到底是什么，她的精神错乱，总是担忧，患上了神经性头痛和神经痛。她没有什么快乐和娱乐，唯一的放松就是量体温，唯一的消遣就是祈祷。她被束缚在一栋中国房屋里，生活在一对夫妇那一成不变的生活里。她自己唯一能进行的锻炼，是沿着教会背后水富城的最高地方，像犯人一样的散步。在这样的环境中，女孩的健康与精神处于崩溃的边缘。

如前所述，艾伟德也有过极为孤独寂寞的时期，并需要找同乡倾诉，而带给她这种慰藉的是来自英国的传教士戴维斯夫妇（David & Jean Davies）。据《小妇人》里的记载，曾在泽州接待过艾伟德的司米德夫人，一次在去阳城的途中，因为年迈以及旅途劳顿患了重病，并于阳城病故。于是，被派来接替司米德夫人主持泽州神召会的戴维斯夫妇，来到了山西。根据英国学者凯斯·斯蒂芬（Keith Stevens）的研究，他们抵达的时间是1935年。艾伟德到泽州去迎接他们，并为之介绍了当地的情况。他们





图2.12 艾伟德与英国传教士戴维斯夫妇等人合影

很快成为很好的朋友，此后，艾伟德只要到了泽州，就能得到家庭般的温暖，而她也确实得到许多来自戴维斯夫妇的帮助。

除了孤独、寂寞以及传教工作带来的挫折感以外，大部分来到中国的传教士也会面临健康方面的问题，很多人为此变得小心翼翼。在《我的中国世界——美国著名女作家赛珍珠自传》一书中，赛珍珠曾回忆其在中国的童年：

母亲总是“小心翼翼”，唯恐家人吃了从中国市场上买的生水果会害病，总是坚持要把这些东西煮熟后才能吃。当传染病大流行季节，家里盛食品的器皿总是放到沸腾的开水里消毒后才使用，并且母亲总是亲自监督洗涤，盘子和银器必须用母亲掌管的煮过的擦碗盘的毛巾擦干后才能用。当蚊子被认为是疟疾传播的罪魁祸首时，父亲立即行动起来把粗布钉在家里所有的窗子上，以至于邻居以为他头脑发了昏。但即使这样，大家还是有灾有病。孩子们很小就懂得，不要往嘴里放没有经过热水或肥皂、

消毒剂处理的任何东西，即使手指也不行，违者必死。

可见，传教士对疾病以及瘟疫是多么的恐惧。艾伟德来到中国后，也曾染上了重病。1936年4月10日英国的《每周先驱报》（*The Weekly Herald*）刊载了名为《埃德蒙顿女传教士在中国》（*Edmonton Lady Missionary in China*）的文章，谈到艾伟德当时正在患重病，并曾被送到潞安（长治）进行治疗。身体稍有恢复，她就马上返回晋城的传教站。而当时红军已经进入晋南地区，国共之间的摩擦，也曾对艾伟德的生命安全构成威胁，并因此令其父母以及朋友非常担心。事实上，艾伟德也曾打包行李，随时准备翻过大山进入河南，然后从那里再转到上海。

然而，艾伟德的病似乎并未痊愈。1936年，艾伟德曾到烟台进行疗养及旅行。作为独立的传教士，艾伟德并不隶属于任何的传教组织，也没有任何组织会给予她经济上的支持，故而笔者推测艾伟德的疗养以及旅行是在友人戴维斯夫妇的帮助下实现的。

当时，传教士因为疾病到沿海修养或度假是极为常见的事。据《中国基督教调查资料》（1901—1920）中记载，初来乍到的西方传教士往往对中国的气候和环境很不适应，极容易生病。传教士们通常会采用休假的方式，可以回国，也可能到日本或者在中国的庐山、烟台等地进行疗养，以便恢复身体。在传教团体中，休假人数通常可以占到总人数的六分之一。传教士进行疗养或者度假除了恢复身体之外，还存在另一个原因，为寻求爱与归属以及寻找民族与国家认同的目的。因为疗养地聚集了中国各地的传教士，且多来自一个国家。（吕晓玲著：《近代中国避暑度假旅游研究》（1895—1937），合肥：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13年）

中华内地会虽然主要侧重在中国内地进行传教，但据英国传教士阿美德（A.G. Ahmed）的记载，该会在山东也有活动，不过基本完全集中在烟台，主要包括开办学校和疗养院两个方面。〔（英）阿美德著、陈海涛、刘惠琴译，《图说烟台》，济南：齐鲁书社，2007年〕1936年夏天，艾伟德到了烟台内地会疗养院进行疗养，并在那里给家人写了几封信。

1936年7月21日，艾伟德给刚刚添了宝宝的亲友写了一封信，信中内容表明，之前她在烟台已经给亲友写过信。但在这封信中，艾伟德主要表现出的是对获悉亲友家（属于其母亲的家族）添了新生儿的开心，同时也向亲友们分享自己的日常生活以及情感世界。艾伟德重申自己不再想结婚，但也不讳言自己很孤独的情况，希望英国的亲人们常给她写信，多些交流。此外，艾伟德还谈到在劳森夫人去世后自己曾经协助医学传教士霍伊特（Hoyte）照顾其临产的夫人，并因此得到一些薪水，从而使自己生活得较为体面。而两年前，艾伟德患重病期间得到过霍伊特医生夫妇的帮助，并在他们的照顾下得以康复。在信的末尾，艾伟德告诉英国的亲友，她从晋城到烟台的旅程需历时两个星期。最后，她也向家人交代暂时没有回到英国的打算。以下附上该信的原文：

我该如何表达自己的心情呢？我像你们一样兴奋。刚刚我才离开一个在内地会神道院里学习的女孩子的婚礼现场，然而那算不得什么，你们厚厚的来信才令我很振奋。我拿着信回了自己的房间，打开前，我还在想这次令我兴奋的究竟是什么呢？我跪了下来，为蒙上帝应许的人们祈祷。我确信你们这次定是得到了上帝的应许，没有什么比成为你们孩子的教母更令我开心，你们带给我一个小精灵。我回到家时看到信中的内容时，几乎为你们高兴地要哭了起来。在给你们写这封信的时候，我实在太高兴你们告诉我孩子的名字以及关于他的一切……愿上帝保佑你们。孩子交托给你们了，他尚不知以我为荣，但你们的事情还是令我很快乐，因为我知道什么事会永久，我也保证将一直为你们祈祷。孩子将为荣耀上帝而长大，他会帮助你们，取悦你们。我以后要时常小声哼唱那句赞美诗，“感谢上帝垂听、应许我这个不配的人。”

我最先注意到的是抬头为A.E 维斯基（维斯基是艾伟德母亲原来的姓）及其儿子的便条，看了又看，我突然明白，要看得更

久远一些，我终于止住了幸福的眼泪。我很高兴你们喜欢那些小礼物，想到自己是第一个送孩子礼物的人，我就很骄傲。你一定能够看到礼物里所蕴含的狂热和兴奋，以及我晚上爬起来包装礼物时祈求上帝保守你们的心意。我愿全身心地为你赞美那个孩子。上帝一定会与你们在一起，感谢他所带来的一切美好。我觉得孩子是部分属于我的，所以当然有义务送他礼物。你们不能、其他人也不能剥夺我的这种快乐。我再说一次，我永远不会结婚，但我会和所有的朋友在一起，也会因他们而幸福。

亲爱的，你能够体会我生活中的孤独，时常有些刺激，还存在一些不确定，只有经历过的人才会明白关门上锁后整晚只留下你一个人时的感受。在许多星期里的每天晚上，没有人和你讲话，因为中国人不会也不曾真正理解我们。我爱他们，爱那些孩子，爱教会中的女生，但必须承认的是，我也一直渴望来自英国的友谊。

我很高兴你们告诉我家里的一切，也愿意闭上眼睛想象你们在家里做的事情。妈妈写信告诉我厨房窗帘的颜色，架子上摆放了许多的玫瑰花，我的视线从我所居住的单调、肮脏的中式房子里挪开，停在家乡那间可爱的、红色的厨房里。

我不晓得你是否了解我的情况，劳森女士去世后，我在附近居住了一段时间后，然后去给霍伊特医生帮忙，他的妻子将要临产。你要知道，我们这里没有护士，也没有英国医院的那些东西，因为这里外国人太少了。我所在的地区，中国人基本不懂得清洁、卫生，也没有任何用于消毒的东西。而且你也知道，我并非护士，只是了解一点卫生护理的知识，所以那时候和医生一同守在产妇身边。孤零零的生活在中国，我仍然没有一处自己的住所，只有很少的钱，也不懂多少中文，这真是很令人不快的感觉。

霍伊特医生提供给我一份相当不错的薪水，让我活得像位（体面的）女士。说起来那件事发生在大约两年前，我生了病，他们极

力要我去他们那儿。他们好像觉得照顾我是他们的责任，但是我病得很重，不能长途跋涉，是他们过来把我带到山上的一所大房子里，邀请我在他们家里做客、疗养，使我最终得以康复。

所以，这里你看到我的生活方式，我过去时常回看曾经作过佣人的自己，而今也有几个佣人服侍我，这当然与英国家乡的情况有所不同，因为人们在酷暑下几乎什么都不做。我头上裹着湿毛巾，穿着罩衫坐在这，汗水不断滴下来，以至于难以继续写信。我索性拿下不断滑下的毛巾，这样就不会为一次又一次捡起滑下的毛巾而苦恼。

霍伊特医生及其夫人明年将回国休假，我希望你们能够见面，他们实在太好了。霍伊特医生是中国北方最为聪明的外科医生；其夫人品味高雅，是怀尔德医生的女儿，她本人很聪明，而且满脑子都是对孩子和上帝的爱。

烟台是中国北部的一个海滨城市，在地图上你可以轻松地找得到，就在威海卫的旁边。美国人在（烟台）这个海湾停靠了一些船，英国人则在威海卫有船。从这里到晋城路途遥远，通常会花费我两个星期才能回去。你可以想象用时14天的旅程，伯特（Bert）将来某天可以来，但是如果我们要离开的话，我们必须至少提前一个月筹备，出发之前得抽出一些时间看看朋友，所以我们需要申请两个月的假期，这还没有把所有相关的问题考虑在内。我喜欢旅行，喜欢了解各个地方及当地的人们。你问我将来是否在英国家乡安定下来，目前来看比较困难，估计要到我老得不能做事的时候才会。我还没考虑回家，除非我找到了回去的办法。

两周后的8月5日，艾伟德又写了一封家信，信中附有给家人的一张照片，是艾伟德之前在晋城时与戴维斯夫妇的儿子莫雷·戴维斯的合影，拍摄时间为1936年5月。

July 21 1936 Temple Hill  
Chefoo.

My Dear

Oh how can I write I am so excited  
as you I have been out to a wedding of a girl  
who was in China Inland Mission Training  
College when I was, but that's not the exciting  
news a big fat letter awaits me I take it to my  
room to open wondering who such a budget could  
be from when opened, oh my I just weep on my  
knees & praised again for another answered prayer  
I felt sure you would get HIM this time, I dear  
nothing would delight me more than to be his  
godmother but you make me a sort of fairy one  
oh what a lot I have to see when I come home  
I just weep with joy for you as I write I am so  
pleased do tell me his name I all about him and  
so glad you received the things I did not have  
to pay chess & chess. God bless you both & may  
you realize more every day the precious &  
wonderful charge He has entrusted to you, He has  
not honoured me like this but it just makes  
me rejoice all the more with you because I  
know the longing, I promise to pray continually  
He may grow up to honour God and help you  
he will ever read chess you I just whisper  
"Thank you God for hearing & answering my  
humble prayer."

The first thing I noticed was a bill head  
A. E. Whistler & Son, I looked & looked & it  
suddenly dawned on me to look further &

图2.13 1936年7月21日艾伟德致亲友的信，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图书馆藏

几天过去了，很抱歉这封信一直没有发给你。所以，我现在

发给你，希望一切安好。我下次会给孩子们每个人写信，而且也会给他们写中文的信件。

我仍在烟台，这是一个非常可爱的地方，希望你过来玩儿一段时间，这里的海水很棒。我接到某人（名字不详）的来信，她似乎对你的消息也很高兴。

除非我完全忘了，你想要中国邮票完全没问题，这里附上一张。我明白，在有些地方现代的年轻人关注道德是非常好的事情。但我不清楚这里有没有你在其他地方见到的那些东西，这里只有邮票，每张25分，又称2.5毛，这里100分为1元，寄4封

信就要花掉1元。这里的一元合0.5先令，所以我们寄出的信也是笔很大的开支。我希望你能理解我的信写得如此潦草，我确信你会的。

后面附有我和两个中国孩子（皆是艾伟德收养的难童或孤儿）以及友人儿子莫雷·戴维斯的合影，是在晋城住所的院子里所摄，后面就是城墙。两个孩子中男孩名叫薛勇（音），女孩名叫俊红（音），我的中国男孩很漂亮，胖乎乎的，女儿却一直很瘦。

在写这封信时，艾伟德给亲人寄送了中国的邮票，并附上了一张与养子、养女以及英国传教士戴维斯夫妇的儿子拍摄的合影，还交代了每个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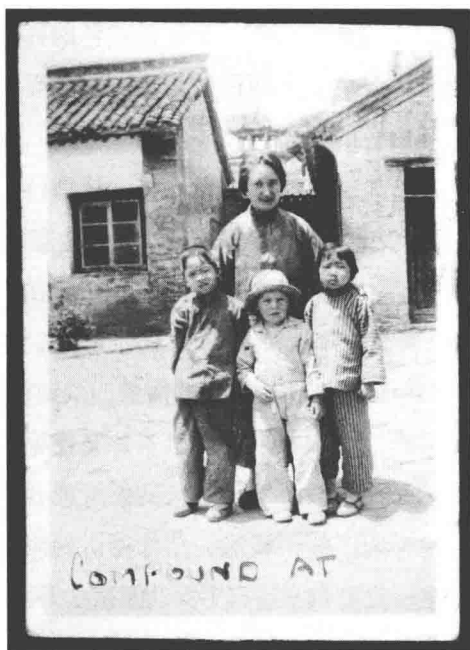


图2.14 艾伟德与其养子、养女及戴维斯夫妇的儿子莫雷·戴维斯合影

子的名字，以及拍摄合影的地点，就在晋城的城墙旁边。信后还附有艾伟德给家人的礼物，是从烟台的裁缝店买的，包括两件白色的羊毛衫，一件针织女装（棕白色），一件蓝色的外套，两件透气外套（白色），一件长旗袍（刺绣），两件丝织物，一双婴儿袜子，一件毛衣（蓝白相间），一件纯白色的外套。

不久，艾伟德结束休养，从烟台返回了阳城。数周后，即1936年11月5日，艾伟德给伯特、凯蒂等女性友人又写了一封信。信中讲到劳森夫人去世后，她曾经搬过几次家，还曾在晋城住过一段时间。之所以在晋城居住，是因为她当时的中文还不够好，还不足以独立进行传教；信中还谈到1936年夏天到烟台途中的情景；谈到在1936年时她的中文已经变好了很多，可以直接去农村进行传教了；艾伟德称自己在阳城的生活很幸福，不打算回国，而且甚至期望自己的侄女或者外甥女（大约十多岁）以后能到中国与她一起工作；最后，艾伟德讲到当时自己所居住的房子格局，有个人卧室，也有教堂还有男女幼童宿舍等。

接到你们所有人的来信，我真是太高兴了。本来应该坐下来马上回答你们的问题，但你们知道这里的状况，一直太忙，于是又过了好几周，才有时间给你们回信。

首先给你们讲讲我曾经居住过的地方。如果你们还记得的话，我刚到中国的时候，是和劳森夫人在一起。她去世以后，我搬过几次家，最终在晋城住过一段时间。在晋城居住的原因是，我当时中文还不够好，尚不足以独立做事，而且巴斯坦小姐也是一个人在晋城，现在戴维斯先生夫妇也在晋城，我时常去那里，每次住上一个半月。我虽然可以去晋城（得承认我非常不情愿），但是还是希望回到阳城，那里我已经收拾好自己的家，感到十分亲切、舒适。我只希望你们到阳城来拜访我，我是多么愿意取悦你们，我会奉上所有的好茶。当然我明白那只是种幻想，因为我怀疑会有人愿意到这里来，因为到阳城的交通极为不便。



今年（1936）夏天，我骑在骡子背上离开了晋城，到了海边的烟台（Chefoo），看到几乎已遗忘了的火车、汽车，并乘车去了大沽（原文为Taiku，似应为太谷），这时我几乎哭了出来。我的状态何其糟糕，火车启动得稍有些快，我居然激动地发起抖来。当意识到自己的行为好蠢时，我不禁笑了出来。

好好设想一下，牲口驮着你还有所有的行李走了大约一小时，开始爬山，越来越高，直到你真正抵达一座高山的山顶，然后俯视晋城，这时下面的城市不过像个斑点。当我们接近山顶时，骡子踩空跌倒，我也被摔到地上，但没有受伤，只是几个西红柿被挤坏了，弄了我一身。接下来的旅程中，我一直在弄残留在头发里的西红柿籽，这是多么好笑的事啊！

我们翻越了两座山，在从第二座山下来时，我的头发被大风吹起来，我只好抓紧缰绳，闭上眼睛，因为我一直担心会从骡子背上跌下来。在两山之间，必须经过一条河，当乘坐舢板渡过时，我确信你会尖叫出来，不过舢板划得很慢，确保人们可以幸运地通过而不会受伤。我将寄给你们一本日历，里面有舢板、轿子的照片。过河的时候，有人带着行李骑在牲畜的背上；但我这次过河时，带了几个箱子，于是他们把轿子（或马车）放在上面，我则夹在两头牲口中间晃荡，这些你们可以从照片里看到。现在讲几则新闻（趣事），虽然只是中国人的，因为除了中国人外，我接触不到任何其他人在偏僻的山区，你们能够想象人们之间彼此都认识对方，并晓得各自的情况，而我对这些细节时常报以一笑置之的态度。当我某天去警署，一个认识我的人过来问：“还记得我曾为你做过事么？”我说：“是的，你那次赶着驴子带我去晋城，那头驴子却总想把我甩下来。”他笑了，以为我是在说笑话。其实，不是笑话，而且我曾多次讲到这件事。

现在我必须结束这封信，因为到了我们要离开的时候了。明天李先生将来和我一起下到村里，我会在那里停留一周或者



图2.15 艾伟德在阳城时的个人用品，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图书馆藏

更久。圣诞节我需要写很多的信，但是如果到时回信晚了，我想亲戚们都会原谅我的，因为我的事情实在太多。

我不会告诉你我是多么的幸福，从未想过回到英国的家乡，虽然有时也会渴望看到自己所爱的人，但是我已经习惯了这里的一切，现在这并不奇怪。我认识这里的每一个人，他们也都认识我。尤可称神迹的是，上帝让我掌握了汉语这门语言。我并未想再探听些什么，只是很想知道凯瑟琳现在在做些什么。她已经离开学校好几年，我是多么想她能过来与我一起做事。山西对于身处和平国度——英国老家的你们而言，显然是非常糟糕的地方，但是上帝会保佑我们，我们也将一次又一次为他作见证，今年春天土匪们来的时候，上帝所带给我们的平安是很奇妙的。

在结束前，我愿意描述一下我现在的家，你可以想象一下，我们有一个就像信中所附的照片中看到的那样的院落。从中国房子的外间及大门左右衍生出里面几个房间，外面没有门，走过去依次是男生们的厨房、灵修室、小教堂以及男生的卧房。在房子

Nov. 5<sup>th</sup> 1936

Yangcheng  
S. Szechuan  
W. China

Dear Bert, Kitty, girls

not to say anything of 'His Highness'

I was so pleased to get your letter with bits from all of you and would have loved to sit down right away and answered all your questions but you know how things are, and so am just now after several weeks finding time.

You will see by the top where I am, when I first came to China if you remember this is where I came to, to join Mrs Lawson, after she died I had a series of moves and finally settled for the time being in Chuncheng, the reason being I did not have enough language to manage on my own. Miss Bostand was alone in Chuncheng, this place could be left that could not, I have been here at intervals since but only to stop for 1 month now we have a Mr & Mrs Davies at Chuncheng & so I can be spared (rather unwillingly I admit) but I have so longed to come back that I just ought to kept on, I have now made my wee home quite nice and comfortable I only wish you could pay me a visit how I would love to entertain you to tea I can only do it in fancy as no one I doubt will ever visit me here for the road is what we call the opiate meaning beyond all.

On leaving Chuncheng which you do on animals by the way when I went to the boat this morning I had forgot of forgotten about boxes & boxes, & when the boat steamed us to Taihu I just went

图2.16 1936年11月5日艾伟德写给家人的信，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图书馆藏

的外面，有楼梯直接通到二楼我的卧室，而在男生卧室上面还有两间是女生卧室，专门留给那些愿意留下来了解福音的人，然后

在教堂上面有我的厨房、餐厅以及会客室，此外，还有一个小的空余房间，人们大多不知道。下次我一定告诉你我们这里的人以及工作的情况，我希望上帝继续保佑我们，光照英国。我要把自己的爱献给所有的人。下次我会给女孩们写信，不要忘记我，一直想念你们，并为你们祈祷。

抗日战争爆发前的某年9月14日，艾伟德在阳城还给自己的外甥女（或侄女）玛姬（Markey）写过一封信，叮嘱她要努力学习，帮妈妈做家务，而且请她为阳城所有的孩子向上帝祈祷。信中还提到自己因为衣服洗了，无法出去寄信的情况。

这是一封写给你的短信。你现在还好吧。我希望你在学校时努力学习，回家后帮助妈妈做些家务，你是个很棒的女童子军，你晚上还祈祷么？当你那样做时，请为阳城的所有男孩、女孩们祈祷，因为在中国的孩子遭受许多的痛苦，并且在冬天到来后还要遭受更多。

当你穿上最好的衣服时，请为中国的孩子们祈祷，给他们最好的祝愿。

现在请代替我吻一下伯纳德，也代我给你自己一个拥抱。

我无法告诉你我是多么的快乐，我深处在各色人群当中，他们对上帝的福音极为渴慕，时常历尽艰辛来参加教堂的活动。

邓秀（音）已经到河边给我们洗衣服，所以我只能等衣服干了以后才能出去寄出这封信，我还要去拜见县长，看看今天发生了什么事。

Sept. 14<sup>th</sup> 19  
S. Shensi  
N. China

Dear Markey.

Here is a little letter to ask you, How are you? I hope you are doing well at school and helping mum when you come home, are you still a Brownie? Do you say your prayers at night? when you do please pray for all the boys and girls in Yangcheng, in fact in China for they are suffering much and will suffer more as the cold weather comes on.

When you put on your best clothes pray for those here who have no own now but all let alone best ones.

How dear give Bernard a kiss for me, and a hug for yourself.

I cannot tell you anything very pleasant as we are all Pisces, and I am in the midst of all sorts of people wanting to know this and to attend these aches and pains.

So I will close and write more cheerily next time.

Jeng Hsien has gone to the river to wash our clothes so I must wait until mine are dry before I go to post this and visit the Mayor to see what today is going to bring forth.

Love as always with many kisses and hugs.

your Auntie Gladys.

The Duchess of Yangcheng.

XXXXXX

图2.17 艾伟德写给侄女（外甥女）的信，撰写时间不详，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图书馆藏





### 三、抗日战争中的艾伟德 |

1937年7月7日爆发的卢沟桥事变，是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开始，也是中华民族进行全面抗战的开始。战火迅速蔓延到整个华北，1937年8月底，日军已经开始进攻山西，遭到中国军民顽强的抵抗。11月8日，太原失守，日军继续南下，1938年春，日军的铁蹄已经践踏到晋东南地区，战火波及阳城。猝然而至的战争对生活在阳城的艾伟德造成怎样的影响，她又是如何面对的？这些从艾伟德给亲友的书信中可以了解一二。

## 1. 艾伟德笔下的战争

受到地理位置以及交通等因素的影响，生活在阳城的艾伟德获知中日战争爆发的消息相对要滞后一点，在给家人的信中，艾伟德首次提到这场战争的时间是1937年8月3日。而后战争蔓延到山西，更是进一步增大了艾伟德从外界获取信息的难度，一方面，生活在乡村的她甚至需要从父母寄来的英国报纸中了解战争的进展情况；另一方面，艾伟德寄出的信也要历时数周才能抵达亲人的手中。当得知战火已经波及山西时，父母对女儿在中国的处境与安危感到非常忧虑，他们数周得不到女儿消息的情况，甚至还引起了英国杂志《每周先驱报》（*The Weekly Herald*）的关注。1937年10月15日，该报以《在中国处于危险中的传教士：自八月以来没有艾伟德小姐的消息》一文报道了艾伟德父母的忧虑，以及艾伟德本人当时在做的一些事情：

埃德蒙顿的艾伟德女士，是位在中国工作的传教士，其安全受到严重关注。她的父母住在查丁顿街67号，已经几周没有收到女儿的消息了。

她的最后一封信写于8月3日，那时她才听说中日已经宣战，不知道将来会怎样。自那以后，中国华北地区的山西，即艾伟德生活和工作的地方，已被日军占领。

外界的消息几乎不能传到艾伟德生活的乡村，她对外界的了



解多来自父母寄的报纸。她的书信要历时几周才能到英国。艾伟德的父母告诉《每周先驱报》的记者，女儿的最后一封信像之前所有其他寄回的信一样令他们很高兴。艾伟德在信中告诉其父母中国角落（即山西阳城）发生的一些事，她每天很忙但也很快乐。“我们对她以及她的那些中国朋友的处境感到甚为忧虑，因为近些天完全没有她的消息。”艾伟德的父母如是说。

### 之前亲历的险境

艾伟德小姐在中国生活的五年中，亲历过许多险境。纵然生活中面临较之以前更为严重的危险，在信中，她从不讲一句丧气的话。相反，她总是说能够帮助淳朴的村民是令她最为快乐的事。去年早些时候，其工作的村庄附近发生了严重的军事冲突，但她没有考虑个人的安危，也没有想过要撤离，而是选择坚守自己的岗位，安慰受到惊吓的民众，救助涌到那里的难民。

### 此前的焦虑

随着局势的恶化，日本侵略了天津，距艾伟德在阳城生活的地方仅十天路程。艾伟德的书信显示，直到最近日军入侵山西之前，她还没有直接的危险。最近，艾伟德的许多朋友和亲人一直去造访她的父母，想知道有没有关于她的消息。（*Edmonton Missionary in Peril in China: no news of Miss Gladys Aylward since August, The Weekly Herald Friday, 15 Oct, 1937*）

由以上这篇报道，我们不难发现艾伟德个人品质里的一些特质：在给家人的信中从不说一句丧气的话，总是以能够帮助当地的村民而感到快乐。在战争面前，不计个人安危，安慰当地受到惊吓的民众，救助因战争涌来的难民。

1938年2月，日军的飞机开始轰炸阳城。之后日军与中国的军队在阳

城展开了拉锯战。9月，当日本人第一次从阳城县城撤离后，艾伟德给亲友伯特（Bert）写了一封信。艾伟德谈到日本人的连续轰炸，已经几乎毁掉了她的家，以致她甚至找不到用于给亲友写信的纸片。在艰难、危险、令人焦虑的环境中，艾伟德控诉日本人的暴行，但也明确告诉自己的亲友，不要以为在中国的她以及旁边的中国人很悲惨。他们不悲惨，即便处于交战的区域，艾伟德还是微笑地面对这一切，她依然向往和平的生活，只是希望英国人了解中国所发生的一切。艾伟德还向亲友介绍了自己在阳城的“家人”情况，以及新近收养的两个因战争而失去家人的儿童的情况，此外，两个十五六岁的养子已经参了军，虽然对她依依不舍，但日本人对他们亲人的屠杀已然在其心中种下仇恨的种子。艾伟德还谈到她对中国政府军的观感，军队里多是些没有到过城市的农村少年，缺乏足够的弹药及必要的训练。原文附录如下：

自上次写信之后，已经太久没有给你写信，现在必须请你原谅，我的纸张已经用完了。这些是我从军营里得到的，质量很好，是不是？那是敌人第一次撤出时留下的。

我记得所有人的生日，却不能写一封信，送一件礼物，但是我希望以后和平到来之时，可以进行弥补。

如今我的家只剩下一半，另一半在炸弹袭击中已不复存在。

我们渴望和平的时代，但每天仍常有轰炸，还能听到密集的枪声，经常有伤员被带走。生活艰难，很多事令人焦虑，然而，到目前为止，上帝一直保护、保守我们，我相信将来也一样。

我已不记得从何时起再没收到你的来信，你近来还好么？

我要谈一下我的家庭情况：还记得以前谁和我一起住吧，当敌人到来，局势恶化时，她就带着苏勇（音）回了自己的家，留下我一个人。但是有个可爱的女人却过来和我一起住，她从不相信上帝，所以这是必须要处理的大事。她接受过良好的教育，年龄和我差不多，已有三个孩子，大的男孩十七岁，已经参军；另

外两个中女孩名为薛罗（音），十五岁，男孩名为薛勇（音），十三岁。我还收养了一个在日军炮火中失去母亲，父亲在军队中效力的九岁女孩（晋城人）；另外一个因家里很快将有第七个孩子而被卖掉的一岁半女童，我为她付了1块钱。

我非常想收到你的来信，有时间时给我讲些新闻，我已经数月没有读报纸或其他东西了，很少有外面的消息，我们因战争而与外面的世界隔离。

日本人离我们这里只有两天的路程。我们能够听到激烈的枪声，看到许多伤员，但我们的情况相对还好。

原谅我写了这么多。两个男孩已经离开，一个十五岁，另一个十六岁，他们现在都在军队。他们来自一个只剩下年迈爷爷的家庭，我一直在当他们的妈妈。他们是我的心肝宝贝。因为生活艰难，没有盼望，他们离开时还哭了。我希望他们将来接受良好的教育，成立好的家庭，但是他们的心肠已变硬，他们恨日本人，你无法想象亲人在自己眼前被杀的人的感受。

这里讲的内容虽然让人有些难以赏心悦目，但却都是事实，我希望英国人知道并理解中国人现在的遭遇。

当我想到你身处和平的英国（祝愿那里有长久的和平），很为你高兴，你不会经历我们的一切，不会等着下一颗炸弹掉下来而不知它会掉在哪，以及爆炸后谁将会死去。他们（日本人）的野蛮是难以言表的，都是我亲眼看到或者亲耳听说的事情，根本没有听说这是什么谣言，我不敢将所有亲见的东西写出来。

请原谅，拉杂讲了这么多，请不要认为我们生活得悲惨，我们一点不悲惨，即便就处于交战的区域当中，而且我们还是会微笑地面对这一切。

毫无疑问，你肯定知道的比我以前从家信中了解到的更多，你知道奎尼的一切，毕竟我们是一家人。

当日本人首次撤出阳城时，我们回到自己的家。（我要说的

是，他们进攻到这时，我们本没打算离开，但因为整个地区的人们陷入恐慌，都逃了，所以才离开）最早回去的是警察，然后是县长，接着我和我的人。我们第一时间去了县政府，门口站了两个新兵。我对着卫兵说：“你们为我向县长通报一声，说一切都好。”他得到命令不许任何人进入，所以很犹豫。我给他一张名片，说：“不用慌，我会在这里一直等到你回来。”那个可怜的人一只手拿着名片，另一只手拿着枪。我确信他还从未用过枪。在给劳瑞写信时，我忘记告诉他这些事，不过告诉你也是必要的，中国士兵多为最宝贵的少年，大多来自乡下，从未进过城，如今却要独立面对所有发生的一切。我从未见到过训练良好的中国士兵，他们出征时，着装颜色不一，六七个人合用一支枪，可能只有三四十发子弹。正是因此，日本在训练和装备上有着明显的优势。

周一，（信是断断续续写的，持续了几天才完成）昨天是星期日，我们在乡下举行了礼拜聚会，我全天都在外面。就我个人而言，只得步行到那里去。我想要你知道的是，路的状况非常糟糕，简直就不是路。走过去10英里，回来也要10英里，这是条唯一可以抵达那里的路。因为战争，这条路被人为切断，路况变得较之以前更为糟糕，随处可见能够把人吓得闭上眼睛却又必须要跳过的大坑；另外还有些情形是路面仅剩下了两寸宽，爬过去时也得时时祈祷自己别掉到旁边的深沟里，那些沟有些深达10—12英尺，里面是各种垃圾。老薛与我一起去了那个村，在经过一条窄路时，他向我抱怨，因为我身材更瘦，所以比他更容易通过。

星期三，自写这封信以来，发生了许多的事，我参加了两次委员会会议，已经忘记这个词在英文中如何表达，就是包括了当地的各种理事。你对这些事肯定想知道，当地政府比以前更需要我们，我也愿意帮助所有值得同情的人，我们怎能不尽力帮助他们呢？

Sept. 1938

Yangcheng.  
S. Chau.

Dear Bert, Kitty & rest of family

It is a long time since I wrote to you and now must ask you to excuse paper mine has all gone this I have got from the military general stationed here its quite nice is it, it was left behind by the enemy when they retreated the first time.

How I have wondered so many times how you all are & how Bernard is growing do let me know when you get this & hear that letters can reach me, we have been having rather a thrilling time as you will no doubt have heard & still are expecting anything.

I have remembered the birthdays but have been unable to send even a letter let alone a present but I hope when things are more peaceful to make up for the omission.

I am living in the half of what remains of my house the other part was hit by a bomb and is no more.

We are hoping for more peaceful times but they are still a.m.s and day by day we can hear the big guns & the wounded are carried in its a hard and anxious life but He our God has protected and kept us up to now and will I feel sure continue to do so.

How I hardly know where to begin I have not heard from you for so long do not know how things are with you all.

I will tell you about my family, Mrs. Lih who you will remember lived with me went to her home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trouble taking Sei Yung with her leaving me alone, I was living alone when the enemy reached here met a dear girl

图3.1 1938年9月艾伟德写给亲友的信，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图书馆藏

昨晚敌人再次进犯的消息传来，我们都没有入睡，而是将并不多的行李打包，以应付将要发生的事情。我要结束这封信了，请为我们祈祷，这些是我们现在非常需要的东西。枪声愈来愈逼近，听起来是那样的清晰，这意味着虽然我们不情愿，也只得马上逃离。

在这封信里，艾伟德讲到，在战争的间隙，他们仍在农村里继续进行礼拜聚会。此外，因为战争的原因，当地政府更加需要教会进行战时的救济活动，艾伟德当时已经参加了两次县里相关组织的活动。在写这封信的时候，日军再次降临，在枪炮声中，艾伟德他们又要踏上逃亡的旅程。

1939年9月9日，艾伟德给年轻的外甥女凯瑟琳也写了一封信，信中谈到，因为战争的原因，她的孩子们已经失学达九个月，以前学过的东西可能全部忘记了。此外，艾伟德还特别讲到自己参加的一次基督徒的婚礼，很值得注意，包括他们去参加婚礼路上的艰辛，以及整个婚礼过程。婚礼是场基督教式的婚礼，教堂会敲钟，新郎新娘只是向客人鞠躬，然后大家一起唱赞美诗。但新娘抵达新郎家的时候，也会燃放鞭炮。此外，艾伟德还讲到新郎新娘的服饰，并与英国人的婚礼服饰作了对比。面对恐怖的战争，艾伟德很坚强，她说：“昨天我们有些受到打击，但是今天我们已经完全没有任何忧伤，我们要准备战斗。”她还希望亲友们多为她本人以及阳城的难民祈祷，因为他们缺少食物、衣服，也没有可以住的地方。

太久没给你写信，不是因为我忘了写，事实上，我时常想到你，而且想知道你的情况怎么样。

你正在长高，我估计已经和我差不多高了。我想知道你的头发是短的还是长的？伯纳德怎么样，你在学校过得好不好？我想知道的事情太多，请写封长信告诉我。你还去主日学校吗？其中女孩的引导课程，你学得如何？

你将会明白，因为你一天天地长大，慢慢就会理解我所在

的这个地方一直处于战争当中，我的信纸以及《圣经》画册和留在卧室的盒子里包裹好的信件、经文都在日军轰炸中被焚毁了，所以不能给你写信。请你先给我写封信，我再回给你。

这里的男孩、女孩们已经超过9个月不能上学读书，我担心许多人已经忘了他们之前学的东西。因为他们现在经历的战争，是单单通过阅读所无法想象的。

几天前我们这里有一个姑娘结婚，所以我想告诉你婚礼的情况。

薛罗和我穿着日常的衣服从家里出发，胳膊上还挎了一个篮子，里面放了几件比较好的衣服。那些好衣服都是借的，因为我们自己的已经不见了。我借了一件白色长礼服，上面布满棕色的叶状圆点；薛罗借的是一件深蓝色的礼服。我们的篮子里还有两双好看的鞋子，因为我们要跨过一条河，过去之后再换上新的衣服及鞋子。我们必须徒步走过长达8英里极为糟糕的路，翻过一座大山，跨过一条在战争时期人为挖成的壕沟，才能抵达新郎的家。

许多人已在庭院里坐着聊天，他们给我们拿来凳子，奉上茶，让我们感觉像在自己家里一样。不一会儿新郎的父亲过来，向我们表达敬意。之后，我们去新郎的母亲那里，她正在另外一边招待客人。经过漫长的等待，有声音传来，Lie La（或许是特殊身份的人）来到洞房门口吆喝，并在前面引路，客人们尾随出去迎接新娘，她是从自家乘坐轿子过来的。当迎亲队伍进入院子时，新郎家人放起鞭炮，很棒。接着举行相认仪式，新人向每个人依次鞠躬，然后新娘被带到新房，在那里她会向婆婆问好，新郎也一样。此后，所有男人退出来，到客厅饮茶、聊天，所有的女人则留在洞房里。很快每个人被分给一碗食物，是一种硬的面条（对我而言很难消化），但是对他们而言却是场盛宴，要吃很长时间，因为他们每个人都要吃上四五碗，客人们可以随意找地方坐。

正式的结婚典礼开始。这时一个男人敲响了教堂的钟，他是教会里的成员，对着所有就座的客人，大声召唤新郎进来。他在前面走，新郎跟进来，身上穿了许多层的衣服，以至于这时候显得非常臃肿，而且肯定很热，并不舒适，但这就是必须接受的传统。

然后又有声音请新娘进来，于是新娘在伴娘的陪同下走出洞房，新郎、新娘都坐下来面朝着司仪，就是那个宣布他们结合的人。客人们在四围坐下，男人在一边，女人在另一边，开始唱歌。然后新郎、新娘再次逐一向来宾鞠躬，首先向司仪鞠躬，接着向主要的客人鞠躬，新郎、新娘彼此也要向对方鞠躬，最后向着人群鞠躬。所有这些完成后，结婚仪式就结束了。人们等着婚礼盛宴开始，这些与英国很不相同，却也很自然。新娘穿着鲜红缎子的外套，粉色的丝绸长裤，头上有难以描述的凤冠，所有一切的衣饰都是借的，但很合适。英国人结婚，新娘穿自己的衣服是不可能的，但对于他们而言一切无所谓，只是个仪式。日本人到来之前，我有一串沃尔沃牌的珍珠项链，是来中国前某个朋友送的。在英国不管贫穷还是富裕的家庭的新娘都会戴的。我很想再得到一串，因为那项链看起来很好看，中国人也觉得很新奇，他们非常羡慕我的那串，大约是他们之前从未见过那样的东西。

现在我必须给玛姬写上几句。我想这次给你的信的篇幅可能短些。很抱歉我没能送你一些合适的东西，但我请你记住我们的需要，当你向上帝说出你的祈祷事项时，很显然我们非常需要一些大的枪支。昨天我们受到一些打击，但是今天我们已经完全没有忧伤，我们准备战斗，因为敌人据说将要撤走，在撤退时他们非常残暴，通常在他们前面没有活的东西可以留下来。

凯瑟琳，亲爱的，要赞美感谢上帝。你在英格兰，那里很和平，不像我们这里，完全是场浩劫。我们这里超过一百户人家里的房子被焚毁，他们变得一无所有。冬天很快到来，我们正在迫切祈祷，希望得到一点点东西，保佑他们。人是一样的



Yungchung.  
Shamai.  
N. China.      Sept. 9th 1938.

Dear Kathleen.

It is a long time since I wrote to you  
 I often think of you and wonder how you are.  
 You are now getting tall & I expect as big  
 as me I wonder if your hair is still bobbed or  
 grown long and how Bernard is, whether you  
 have passed well at school, so because my  
 wonders are many please write me a nice  
 long letter and tell me.

Do you still go to Sunday School and are  
 you doing well as a girl guide?

You will know for you are getting big  
 now and understand things, that this place  
 I live in, have been the scene of fighting  
 so because of this I have been unable to  
 write, my writing paper was all burned  
 by the Japs along with my preaching  
 pictures, letters & tracts which I left packed in  
 a box in my room so this paper will have  
 to do, so please when you write put in a page  
 of plain paper and I will write back.

The boys and girls here have not been  
 able to attend school for over 9 months so I  
 am afraid many will have forgotten what  
 they did learn, for they now understand what  
 was is from experience and not from just  
 reading.

A few days ago one of our girls was married so  
 I would like to tell you about it.

Hsueh Lau & I set out from here as soon  
 as it was light dressed in our every day clothes  
 we carried our best ones under our arms, those  
 we had borrowed because our own have gone  
 mine was a long white gown with little brown  
 leaves dotted all over it and Hsueh Lau's was  
 a pretty blue one. Our best shoes we also had in  
 a packet for we knew we had to cross the river

图3.2 1938年9月9日艾伟德给外甥女凯瑟琳的信，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图书馆藏

人，但不少人在逃出来之后，以前拥有很舒适的家，如今却可能变得一贫如洗，需要依赖他人的救济，解决吃饭、穿衣以及住的问题。

昨天晚上在回家的路上，我去看望了小罗斯，她紧紧地抱住我，口齿不清地说出“爱”这个字，我很渴望带她回去，但是不敢，因为现在我住的地方很冷，没有窗户，也没有门，晚上必须盖好棉被衣物，事实上火炉也坏了。没有人能够进行任何修补，所以你可以想象我们现在的生活状况。

我现在正在想方设法把各种东西拿来穿，邓秀之前一直渴望将我过去红底蓝花的窗帘拿来做成衣服，很快就会变为现实；我也一样，虽然我还未决定是否将那件英式大衣改成短的礼服。其他物品似乎也都不见了，但我们在上帝这里仍很快乐，他一定保佑我们，请原谅有个人一直在说他喉咙痛，你没有办法不去听他讲，然后给他点漱口药，打发他离开。

正如我刚刚说过的，现在请你在向上帝的祈祷中纪念我以及这里所有的一切，倘若你能募集一些钱帮助我们，我会很高兴，不久我会给你写信；而假如你愿意完成主日学校的功课，我也会很高兴这一定对你会有帮助。我知道耶稣爱我，我靠他就可以得到安息。我特别需要耐心、爱心和勇气，我请你帮助我，在这些事项上向上帝祈祷。

凯瑟琳，上帝保佑你，请你不要忘记艾伟德阿姨。将来的某一天我会回到英国的家，我想知道你到时是否还能认出我。

在抗日战争的前半阶段，艾伟德当时仍在阳城，可能给英国的亲友写了不少信件，介绍当时她自己的亲历以及所闻、所感。但目前能够见到的仅有三封。除了以上两封外，最后的一封是写给友人惠特比（Whitby）的，时间为1939年6月21日。艾伟德和惠特比似乎并不是非常熟悉，从信中，我们了解到惠特比参加过艾伟德父母为她举行的惜别晚会，此后一直

关注艾伟德的情况，曾给艾伟德寄过书，还写过信，这里是艾伟德的复函。信并未马上寄出，因为6月22日艾伟德又补充了一些内容。惠特比的来信完全出乎艾伟德的意料，却令她非常高兴。在这封信里，艾伟德讲到在日本人入侵期间，她曾和教友一起去了陵川县三个月，进行传教，发现那里的女人还有孩子仍然在缠足。艾伟德在大部分外国人逃离山西的时候，赶到了晋城，她觉得自己留下来而没有随那些外国人一起离开，是上帝的意思。艾伟德还谈到空袭已经完全毁了她的家，此后她主要住在乡下，虽然常常遭到空袭、打击，但艾伟德仍视阳城为自己的家乡，并称这就是她爱阳城的原因。在敌人再次撤出阳城后，艾伟德从县长那里拿到一笔钱（100元，合5英镑），用于救治难民中流行的伤寒以及痢疾。艾伟德一直在救助难民，故而很受当地民众的欢迎。

我几乎不知该如何落笔来写这封信，我的内心里充满着喜悦，充满对上帝的赞美，他一直那样悉心地保护着我。（去年）6月3日，我收到一本品相奇好的书，却因没有墨水而未能及时给你写信表示感谢。戴维斯先生刚刚从海滨回到山西，随身带了两瓶墨水，送给我其中的一瓶。

我得到这本书已经超过一年时间，现在才相信它已经是我的了，我几乎无法表达自己的感恩之情。我可以用于阅读的材料很有限，只有三本书，一本青年语汇，一部《圣经》，幸好还有亲爱的亲友们寄来的《基督徒先驱报》以及《信心的生命》，否则就只能反反复复读那三本书，它们碰巧都与祷告相关，是我在空袭后所能拯救出来的全部资料。

近些天我一直在旅行，很抱歉之前没有告诉你，但是我很愉快，因为我现在收到你的来信，并且知道了你是谁。

我之前和杜麦（音）一直在陵川，待了三个月，那是一个距我们这里三四天旅程的地方，工作很艰苦，因为位于群山之中，没有路到那里。我们去探访了许多地方，那里的人从未见过一个

外国人，也从未听说过耶稣，对我们很恐惧，所有的女人和孩子都缠着脚。一定要为他们祈祷，希望她们能够听进我们的话，这样才会使她们不仅松开缠着的脚，而且也松开她们心灵上的捆绑。当听说所有的外国人都急匆匆地逃离时，我却正从陵川赶往晋城。全程步行需要两天时间，我们翻山越岭，每天步行60里（20英里）。由于耶稣向我启示过，所以我知道不能和他们一起走，我选择留在了晋城，一直等到戴维斯先生护送那些人离开后又返回来。然后我很高兴地认为，他回到晋城是因为我。

你一定很喜欢自己的家乡吧，这正是我喜欢阳城的原因，我们这里天天遭受空袭，已经持续了好几天。我们在乡下休整，很感谢你的朋友（书）带给了我勇气，它已经帮助到我。我的勇气并不总像我自己以为得那样大。我必须承认，当一些东西一直萦绕在我的脑海时，我会发抖；而当枪声密集时，我内心里觉得很有趣，虽然外表仍保持着镇静，我会将孩子们抱进土坯房。由于你对我的生活无疑了解很少，你会原谅我所犯的“跑进自己建的土坯房”这样的错误，但是我们相信上帝，而不是相信土坯房能保护我们。

我的家全被毁了，所以目前住在乡下，这里离我家残存的废墟并不远。昨天早晨我回去了一次，看看是否有东西留下来。我有些想哭，因为看起来很可怜，但是“勇气”这个词进入我的脑海，我知道上帝一定会托住我，带我安然度过这些困难。因为我能再次幸存下来，站在这里，而没有成为废墟的一部分，所以灵魂上还要再次寻求并赞美上帝，寻求救世主的庇护，感谢他给予我面对将要发生的一切的勇气，因为享有带领人们认识他的特权，对我来说，真是无上的快乐。

我在尘土、废墟中跪了下来，祈求上帝赐下他的能力。房子的屋顶在敌人轰炸中被掀掉了，我实实在在处于苍穹之下，但当听到上帝寻找我的脚步声时，他的爱就满满浇灌到我的身上。奇

妙的上帝属于我们：房子被击中的第一次，我、杜麦（音）以及三个中国弟兄正在里面进行祈祷；而这一次我们却都跑了出去，上帝知道这次房间里的人都将杀死，因为炸弹正好掉在房顶上，整个屋顶变成碎片。当我站起身，一片布满灰尘的纸进入我的眼帘，一定还有几页留了下来，只是满是尘土且被炸成了碎片。我把它们黏合起来，这些一定是从我的某本书或者文件中脱落出来的（上帝使其落在我的脚下）。你对我当时说的话可能有些惊讶，“是的，上帝，无论付出怎样的代价（我都可以接受），只要你需要我。”人们时常渴望舒适的椅子、美好舒适的床，甚至一顿好吃的饭菜，但是，“有了我，只是我自己，对你难道还不够么？”是的，上帝的恩典足够我们用。

今天我们已经不再害怕那些战机的到来，因为我们这里雷电交加，大雨将如注般浇在干旱的土地上，这是今年的第一场雨，我们处在雨季，我希望你知道，雨已经下起来，路上的积水汇成了小河，几乎无法出去做任何事，不过正好可以给你们写信以及祈祷。

当获悉伦敦如今正热浪翻滚，阴凉处也有华氏80度时，我不禁笑了出来，我们这里恰好也有那么一天。那天我正好在路上，当时阴凉处有华氏98度，你可以想象在超过华氏100度的骄阳下骑马是怎样一种景象，但我的心中却乐开了花，因为我知道背上包裹中有主赐下的阳城县县长夫人捐赠的100元钱（合5英镑），我怎能感到伤心、疲惫呢？这些钱可以解救许多苦难的人，所以炎热被抛到了脑后。我在祈祷，希望得到主的引领，让我有智慧并小心地来用这笔钱。

我所经过的每个村庄都在流行伤寒以及痢疾，我多么渴望能帮助并去除他们身体上的病痛。从晋城到那里要翻过三座大山，故而你可以想象整天的旅行都是在翻山越岭。当太阳落山时，人们需要找到栖息的地方，然而甚至在很小的客栈，旅客也多得难

以计数，但人们却是以在英国并不熟悉的欢呼声欢迎我这个白人客人。早上起来，你会发现身上已起了一层奇痒无比的红疙瘩，第二天你会度过完全相同的一天。然而，每到一地，人们总在喊“教士回来了”，然后会问候所有的老朋友。我在阳城已有7年时间，所以几乎没什么人不认识我，这种感觉真的很棒。

我还记得，相信是在来华之前，在达摩尔街的孩童聚会上说过一些话，但是我并不记得太多，也不记得哪些人在场，甚至自己说了些什么，但我很高兴认识你，而且感觉我们已成为朋友。请继续给我写信，虽然我不能保证定期与你联系，但是我答应尽我所能写信给你。我总是在换地方，由于各种原因，我甚至时常不能给妈妈写信。

你是在好地方工作，我喜欢书并且喜欢阅读，可是过去几年没有什么书可以读，所以你寄来的这本书对我意义重大。你可以想象我是多么喜欢这些书，有时甚至写着英文单词的纸片对我而言都是很大的祝福，我认识了许多《信心的生命》里所宣扬的人物，而且较之其他人更加清楚什么地方适合你度假。

我希望你拜访一下我的妈妈，让她给你瞧一瞧我之前寄给她的一些东西。我推测你信中谈到的“Koo lao”，指的是所有（中国）城市城墙上的塔楼。

请原谅我信中出现的那些错误，笔迹也潦草不堪。我很想写出一封语言表达良好的书信，但那是不可能的，因为我时常一个人，没机会改善自己的母语，偶尔会感觉找到正确的英文单词也存在困难，所以信中会有一些错误。

我收养了一个小男孩，名叫提摩太，14岁，我常带着他出行；还有一个小女孩，名叫罗斯，是在乡下买的，由于她太小，所以不能与我一起出去；另外还有一个女孩名叫邓秀，但是发现她有个好的家庭，很幸福。

6月22日，我必须停下来，因为一群女人闯了进来，所以我

不得不收拾一下，热情招待她们。她们的身体几乎都有些不适，精神上也一样，但是听我讲道时都很耐心，而且答应以后还会再来……

我们在敌机的轰炸中休整了几天，感觉自己很勇敢。大炮依旧轰鸣，我得知敌人已经进攻到距这里一天半旅程的南部某地，但是我们周围有许多军队，所以并不害怕。我们这里的人都有伪装，请务必为我们祈祷，我不敢请你祷告我们一定赢，但是我本人自然是那样认为的。现在，我在乡下，要去看一看真的地窖（土坯房），工人们已经过来找我谈工钱，我必须离开。好，明天一切会好起来，他们已经开始工作，每个人每天30分，加上一顿中午饭。关于工资，我想知道我们的工会如何看待这件事？

我的这封信现在必须要结束了，因为信纸已接近邮局允许的重量。这些天要处理各样的事情，我非常忙，但我想你们知道，我已经收到书，非常感谢，书背后有广告，可能是中文。霍伊特医生的女儿很可爱，送给我1块钱，我用它来给杜麦再抄了一份，接下来的每一天，我们都在一起玩得很开心。我离开了几天，在乡下居住。但我知道莱特一定给你写信了，我想给你起个中文名字“魏姑娘”，魏是从英文Whitby一词译出的，中文中姓在前面，“姑娘”是指好人家里没结婚的女士。我们会为你祈祷，我期望提摩太将来给你写封信，他很可爱，带给我很多快乐。我还有一个男孩名叫保罗，他叫我妈妈，现在跟随军队走了，但是给我写过充满爱意的信，令我很开心。我请求你为他祷告，求上帝保佑他，并使他为上帝作见证。保罗现在18岁，如果我有儿子的话，也差不多这样大了。上帝难道不好吗？他为我们预备了一切，远胜我们为他所做的。

从艾伟德的这些信中，我们了解到，面对战争甚至死亡，艾伟德从没有考虑过退缩，据《小妇人》里的记载，艾伟德曾这样答复家人敦促

Yangcheng  
S. Shansi  
N. China  
June 21<sup>st</sup> 1939.

Dear Miss Whitty

I hardly know how to begin this letter my heart is just full of joy and praise to Him who watches us with such loving care, I received the book on June 3<sup>rd</sup> in perfect condition, but lack of ink prevented me writing straight away to thank you, as David has just come back from the coast bringing 2 bottles with him so he has let me have one.

I have wanted this book for over 1 yr and to think it is now really mine, I cannot thank you enough, my reading matter is very limited consisting of 3 books, a Young's concordance and my Bible, I have sent me by dear friends The Christian Herald, Life of Faith, otherwise I read my 3 books over & over again, they all happen to be on prayer, these are all I saved from the air-raid.

I have been travelling for several days so am sorry I can't have let you know before, anyway am glad because I have now received your letter and know who you are.

I have with my friend Hu Mai been in Lingchuan a place 3 to 4 days journey from here for 3 months, the work is very hard as it lies in the mountains and there are no roads, many places we visited they had never seen a foreigner and much less heard of Jesus, and were much afraid of us

图3.3 1939年6月21日艾伟德写给友人惠特比的信，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图书馆藏

其回国的劝告：“人生非常的可怜，死亡既是那么平常，灾祸和苦难也不算稀奇。不过我不愿去到别处，别希望我离开这里，或者用任何办法要我离开。”

然而艾伟德一样想念自己的亲人，希望和他们保持联系，希望他们多了解中国正在发生的一切，希望他们珍惜和平的生活；同时她也爱所居住的阳城，将其视为自己的家乡；艾伟德还对战争中颠沛流离、饥寒交迫、受伤染病的人民抱以极大的同情，尽自己的力量去帮助救护他们。



## 2. 救助伤兵、难民

根据艾伟德的自述，抗日战争期间中国救助伤员的医疗设备非常原始、简陋，而华北地区却因战事激烈，不断有大量伤员需要医治，但那里既无红十字会，也没有战地医院。为此，许多教会人士，虽然他们最初并不想陷入与日本人敌对的境地，但是后来却还是起来组成救助伤员的组织。这里或指著名的天主教神父雷鸣远创立的华北战地督导民众服务团，1938年10月成立于武汉，当时主要在晋南、晋东南活动，救助伤员是这个组织的主要职责之一。艾伟德在其自述中称那是个很棒的组织，里面的人都甘愿冒着风险、忍受不适，为苦难中的人提供物质与精神上的帮助。事实上，在日本轰炸以及入侵阳城之时，艾伟德也积极投入救助伤员以及难民的工作当中。

当时艾伟德的住所离前线不远，她的院子自然而然成了一个急救站，时不时就会有三四十个伤员被抬进来。艾伟德的医疗知识有限，如前所述，她曾经协助霍伊特医生照顾过产妇；她的家里也没有什么粮食，而伤病员们需要吃饭，也需要护理与照顾。艾伟德希望找个比她自己更能干的人来负责救助伤员的工作，于是，她向上述那个组织（华北战地督导民众服务团）提出了申请，希望得到帮忙，但过了许久也没接到回音。于是，实际上能够帮上忙的就只有自己收养的那些孩子。艾伟德和孩子们用绷带给伤员包扎伤口，给他们吃饭喝水，安排他们休息，直到伤员们被送回各自的营地。

在战争当中，艾伟德与当地的信徒仍尽一切努力，继续自己的信仰生活。那时，艾伟德他们还正忙于筹办每年一次的基督教大会。在那个战乱的年代，外出旅行是极为危险的事情。邀请周围地区的人离开他们的家，穿过敌人占领区，翻山越岭来参加为期一周的聚会，听起来是有些怪，但人们还是愿意来，因为期间有教会为国家命运进行祈祷的重要活动。各地的基督徒蜂拥而至，最后人数达到近千人，有些人路上要走一个星期，还有些人则需要五天时间。他们都期待见到来自其他地方的伙伴们，而且希

望牧师给他们带来祝福。

第一晚，艾伟德与同伴们为各地信徒的到来专门组织了欢迎会，会后安排他们吃饭及找地方休息。但是主持祈祷会的牧师却久候不至，后来才听说是受到了沿途日本军队的阻挠。对此，艾伟德等人非常的焦虑不安。这时有位穿着国民党士兵服装的人走了进来，是奉命来与艾伟德商讨救助伤病员事宜的。这个人也是基督徒（这里应指的是天主教徒），他的名字是乔纳森·温（音）。他与艾伟德一样，也是因为信仰的关系而投身于救助伤病人员的活动。这个温姓的信徒居然代替未能赶到的那位牧师主持了祈祷会，很成功，五天内很多人皈依了基督教。有军方背景的这位信奉上帝的人士，或许正是之前艾伟德请求帮忙的组织——即雷鸣远的战地督导民众服务团的人。

据1994年出版的《阳城县志》以及《震惊世界的六福客栈》记载，抗战中日军的飞机曾多次轰炸阳城县：一次是1938年2月21日上午，当时敌机两架由东北盘旋至县城上空，连续向城内东北角和东关城后胡同一带投弹24枚，炸毁房屋数百间，炸死炸伤群众多人。4月22日，24架日本飞机再次在阳城县城投下了数十枚炸弹，炸毁房屋900余间，死伤群众数百人。6月16日，3架日机轰炸了董封、临涧、横河等村，投弹30枚，炸毁房屋数百间，群众死伤20余人。

就是在某次轰炸中，正在举行早晨祷告会的艾伟德以及其他一些信徒被埋到瓦砾里。后来艾伟德被从废墟中拖出来，幸运的是只受了一点轻伤。她迅速镇静下来，动手从瓦砾堆中挖出自己的小急救箱，虽然里头只有些绷带和碘酒。艾伟德将因轰炸而惊慌失措的人们迅速组织起来，清理现场、救助伤员、埋葬死者、照顾婴儿。不少孩子才出生几小时或者数天就死了，他们可怜、悲痛的母亲也需要艾伟德等人的安慰。

如前所述，在1938年9月写给侄女凯瑟琳的信中，艾伟德提到了日军的轰炸，虽然如今已不清楚她具体指的是哪一次，“我们这里超过一百户人家里的房子被焚毁，他们变得一无所有。冬天很快到来，我们正在迫切为之祈祷，希望得到一点点东西，保佑他们。人是一样的人，因为不少人

逃出来后，以前很舒适的家庭，如今却一下变得很贫穷，需要依靠他人解决吃饭、穿衣以及住所问题”。

因为轰炸，艾伟德原来的住处已经无法居住。于是，她带着收养的孩子、教友以及伤员去了城外的一个村子，与另一名传教士同住。据《震惊世界的六福客栈》称，该村是距阳城西北三十公里的北柴村，即今天的柴坡村。该村三面环山，位置偏僻，日军从没到过那里。而村外还有个很大的山洞，可以容纳许多人，抗战中许多人到北柴村避难。另据《八福客栈》记载，艾伟德到了北柴村以后，就把那里变为人道主义援助的地方，许多人在那里得到过她的救治。

艾伟德对伤员以及难民的救治以及救济举动，受到阳城县各界民众的赞赏，并受邀参加阳城县难民救济组织的会议，前述1938年9月的同一封信中亦有记载：

我参加了两次委员会会议，我已经忘记这个词在英文中如何



图3.4 戴维斯夫妇的儿子莫雷与国民党士兵以及难童们合影

表达，就是包括了当地的各种理事。你对这些事肯定想知道，当地较之以前更需要我们，我也愿意帮助所有值得同情的人，怎能不尽我所能帮助他们？

如前所述，抗战爆发后艾伟德还收容了至少60多名难童。（《祖籍英国女教士艾伟德昨抵台》，《联合报》，1957年9月3日）面对战争中中国人民所遭受的苦难，戴维斯夫妇也行动起来帮助他们，据《六福客栈：小妇人艾伟德传奇》记载，他们在泽州也收容了当地难民以及难童近200名。

### 3. 刺探日军情报

在好莱坞电影《六福客栈》以及阿兰·伯吉斯的《小妇人》中，都提到艾伟德为国民党部队提供情报的事，并且讲到一个名为“林楠”的国民党军官，电影中还甚为详细地刻画了林楠与艾伟德之间的爱情。《震惊世界的六福客栈》也因循了以上的说法。而事实上，林楠和艾伟德的爱情似乎更多出自小说家和电影剧作家的虚构，因为艾伟德的自述中完全没有提到林楠这个人。但无论如何，艾伟德为中国军队刺探过日本军队的情报应该是事实。

据艾伟德回忆，中日双方的部队以阳城为战场曾经拉锯过多次。一次，当中国军队到了阳城，在附近扎营，艾伟德去军营里探望了士兵，并应邀和将军夫妇一同喝茶。艾伟德很快就成了那对友善的将军夫妇家的常客。有一次当艾伟德在拜访他们时，正在认真研究地图的将军突然转过身来问艾伟德是否了解日军的位置。艾伟德告诉将军，在她去乡村传教的过程中，时常要从日本人的占领区穿过，而且甚至有时还有日本人来参加她在当地的一些聚会，所以她有注意到一些情况。将军于是向艾伟德提出了请求，希望她能借助外国传教士身份的掩护，利用熟悉当地地理环境的条件，为中国军队搜集日军动向的情报。

想到自己已经提出申请要成为真正的中国人，那么日本人是中国人的敌人，也就是她的敌人；而且日本人的侵略，不仅搅乱中国人的日常生活，还杀死了她身边的一些朋友，于是，艾伟德接受了这个使命。之后，在外出到各个村庄进行聚会时，艾伟德就会特别留意日军的位置、军队番号、大致数量等信息，然后向那个将军报告。在英国、日本开战之前，英国传教士在华的传教活动受到日本人的干扰相对比较少，故而艾伟德仍可以公开地在乡村里传道，有时即便经过敌人的占领区，也没有人阻拦她。

《小妇人》里的记载与艾伟德的回忆略有不同，该书中称艾伟德是在泽州遇到四名从事情报任务的国民党军官，其中那位名为“林楠”的高级军官请她协助中国部队刺探日军的情报。艾伟德最初是拒绝的，因为她也知道教会面对战争等突发事件时应该尽量保持中立。但林楠认为，上帝反对邪恶，日本人就是最大的邪恶，他们无恶不作，艾伟德即便想也无法保持所声称的中立。书中还提到艾伟德在泽州时曾经因为阻止日本军人对孤儿院的硬闯，而遭到他们的殴打，甚至险些被强奸，所有这些共同促使艾伟德接受为国民党军队提供情报的危险任务。

根据现有文献，艾伟德到底如何成为中国军队的情报人员，以及后来打听日军情报的具体细节，如今已无从得知。但艾伟德打破教会惯有的中立态度，为中国的抗日活动出力却是毋庸置疑的。当然，在抗战中为中国效力的外国传教士也并非艾伟德一个，著名的教会人士还有天主教神父雷鸣远与曾因帮助八路军购买医药而被新西兰圣公会开除的女传教士何明清（Kathleen Hall），后者与共和国国家领导人宋庆龄、聂荣臻、黄华等关系密切，其传记更是在中国出版。（Tom Newnham, *Dr. Bethune's Angel: The Life of Kathleen Hall*,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2004）

然而，据英国学者吉斯·斯蒂芬（Keith Stevens）的研究，当了解到艾伟德想要为国民党军队从事间谍工作时，其直属上司，同时也是极亲密的朋友的戴维斯夫妇，曾多次劝她改变主意。他们坚持主张基督教会应该在战争中严守中立，并认为艾伟德为国民党军方提供情报的决定是极为轻率而危险的。最终，艾伟德没有为之所动，因为她觉得自己是中国人，为自

己的国家效力是她的本分。

然而，戴维斯却因艾伟德而被捕。据《小妇人》的记载：随着日本军队的大举入侵，大批外籍传教士逃离山西。戴维斯因需要护送教内的传教士，去了烟台，故管理泽州地区教务的职责是由艾伟德暂时代理。在此期间，美国杂志《时代》周刊<sup>[1]</sup>的记者白修德（Theodore White）跨过黄河到了山西，收集山西战地新闻相关的资料，并因不通中文等缘故，最终找到了艾伟德帮忙。白修德想了解战事的进展以及日本人的真实暴行等情况，艾伟德将自己所知道的情况如实告诉了他。数月后，相关报道在《时代》周刊上发表，白修德还给艾伟德写了一封信表示感谢，并寄到了泽州。这封信最终落入日本人手中。当时日本人想逮捕的艾伟德已经带孤儿们离开了山西，于是自烟台刚刚返回泽州的戴维斯被日本人逮捕了。日本人逼迫他承认是国民党军队的间谍，并要求他供出相关组织的活动情况。日本人对戴维斯施以各种酷刑，殴打、受饿、长时间不让他入睡，后来还逮捕了追随他的两名中国信徒，并在其面前杀害了其中的一个，用以恐吓他。戴维斯对《时代》周刊的事原本就一无所知，做国民党军队的间谍也是无从谈起，自然无法招认。于是，他被关进太原的监狱直到战争结束。

2004年2月，英国广播公司（BBC）做了一档节目，名为《她是被信仰蒙蔽了么》，对艾伟德在抗日战争期间为中国军队获取情报的举动而给无辜的人造成伤害的事情进行了讨论。戴维斯的儿子莫雷，即前文中与艾伟德及其养子、养女在晋城城墙附近合影的白人小男孩，也接受了电视台的采访。在这个节目中，莫雷也提到艾伟德与戴维斯一家相识于1935年，他们成了最好的朋友和同事。抗日战争中，阳城为日本人所占领。艾伟德恨日本人，也恨他们对其第二祖国的侵略，于是同意为中国军队服务。戴维斯夫妇曾对艾伟德进行规劝，没有成功。后来，他们建议艾伟德带着孤

---

[1] 《时代》周刊是美国三大时事周刊之一，其创始人鲁斯（Henry Luce）是曾经在中国传教多年的美国传教士鲁思义（Henry W. Luce）的儿子，极为同情中国在对日战争中的遭遇，在抗日战争中，曾大量如实报道发生在中国的战争真相。这些报道揭露了日本法西斯的本来面目，引发西方社会对中国抗战的巨大关注。

儿们离开，造就了艾伟德生命中的奇迹。但在莫雷·戴维斯看来，那是一次低劣的（Infamous）逃亡。戴维斯最终因艾伟德而被捕，战争结束后回到英国在南威尔士度过余生。莫雷·戴维斯最后称其父亲“作为一个基督徒，除了这件事，他都支持艾伟德，一直支持她，也从未表示过不满”。

此外，在《小妇人》一书中，还提到一位将军“General Ley”，在《八福客栈》中，译者将其译为“李将军”。《小妇人》中还谈到这位将军有天主教神父的身份，来自荷兰等情况。事实上，这里应该译为“雷将军”，即前述的雷鸣远神父。根据曾在华北战地督导民众服务团工作过的河南人金良璧的回忆，雷鸣远创立的华北战地督导民众服务团内的各级领导是有军衔的，而雷鸣远曾被当局授予中将衔。（金良璧：《我的宗教生涯》，《开封文史资料》第10辑，1990年）中将衔其实只是个荣誉，雷将军在《小妇人》中也是那样回答艾伟德对其称谓的疑问的。1938年下半年，雷鸣远率领华北战地督导民众服务团到了晋东南、晋南地区，除了救助伤员、难民，宣传抗日之外，也承担刺探日军情报的工作，于是和艾伟德出现了交集。

#### 4. 教化土匪

1930年，蒋、冯、阎、桂之间爆发中原大战，战火波及晋东南地区，那里的晋城、阳城等地都驻守过大量的军队，其中一些后来哗变成为土匪。而在抗日战争中，国民党溃军和土匪也曾在这一带肆意横行。

据艾伟德自述，1938年日军第二次撤出阳城后，一群中国女人涌入她那所破旧的院子。遭逢战乱的这些女人显得非常恐慌、疲惫，也非常难过。艾伟德抓住机会，站在院子里给她们讲解《圣经》里的教理，称耶稣爱她们，而且无论景况多么可怕，都会赐她们平安。艾伟德称所有人都是罪人，因为是罪人，所以需要耶稣的拯救，这是《圣经·新约》里最为基本的教义。艾伟德的这些话不承想会冒犯到路经大门口的另外一群人。

那是一群土匪。他们先是带走了艾伟德的中国助手，接着土匪头目直

接闯进了艾伟德的家，欲逮捕她。那位土匪头子认定艾伟德知道他的真实身份，对他的人身造成了威胁。艾伟德完全不晓得土匪的情况，故而虽然遭到多次恐吓，仍无法承认了解匪徒的身份，为此被这群土匪监禁在一个房间里饿了三天。后来艾伟德明白，是之前向逃进院子的女人讲的那句话“人都是罪人”，以及无意中指向门外的那根手指，冒犯到土匪头子。于是，艾伟德尽力向土匪头子作了解释，并拿出《圣经》给他看。随着时间一分钟一分钟地过去，土匪头子的情绪终于平静下来，不再咆哮与咒骂，而且他的声音中多了一种对永恒世界的盼望，最终皈依成了基督徒。后来，土匪头子还在艾伟德的面前，向部下们宣布自己已经是基督徒，他拿着艾伟德的《圣经》，宣布不再做土匪了，并发誓不再烧杀劫掠，要做堂堂正正的中国人。

艾伟德自述中此后还有更为离奇的故事，此处不再赘述。而《震惊世界的六福客栈》，甚至称土匪头子在艾伟德的劝告之下加入了抗日的队伍。虽然，如今已无法确知艾伟德碰到的土匪头目是谁，也不知是否真的改邪归正，但不管怎样，在抗战的大背景下，书中所体现出的信仰感化以及民族大义促使人弃恶从善乃至参与抗日的愿景却是美好的。



## 四、大迁徙及在中国内地最后的岁月 |

电影《六福客栈》公映之后，艾伟德开设客栈、传扬福音、收养难童、救助伤员的事迹迅即广为人知，但更为世人所津津乐道者却是以不足1.5米的孱弱身躯完成将百余名孩子从阳城带到陕西的壮举。

## 1. 转移难童的原因

据艾伟德自述，在战争期间，她一直在收留那些失去亲人以及遭到遗弃的儿童。每周都有几个孩子来到艾伟德家，有时是村民、士兵送来的，有时是自己走来的，因为人们听说艾伟德会照顾他们。战争延续了一年又一年，艾伟德所照顾的孩子逐渐超过100个。艾伟德试着给他们上课，教他们唱赞美诗以及《圣经》上的东西。像所有正常的孩子一样，他们很顽皮，需要不断被关注，需要吃东西。

艾伟德之所以考虑要把孩子送走，首要考虑的是孩子们的安全以及吃饭问题。一直从艾伟德那里得到日军情报的那位将军，以及其他很多人，对艾伟德的工作都很感兴趣。当他听说艾伟德收养的难童已达上百名，就问如果日本占领了这个地区，她该怎样解决孩子们的吃饭问题。艾伟德的回答是依靠上帝，为了孩子，她可以向中国军队甚至日本人讨要食物。然而，战争的残酷尤其是中日两国军队在该地区的拉锯，每次都会造成大量的伤亡，而且日军的残暴，对女性尤甚，令艾伟德也不得不忧心起来。

将军建议艾伟德直接与蒋夫人联系，请她帮忙。蒋夫人在陕西开设了孤儿院，专门用于救助华北地区因战争产生的难童。于是，艾伟德给蒋夫人写信，不久得到了回复，孩子可以带到日本人还没占据的陕西省去，那里会有专人照顾他们，同时也可以让人去将钱取回来，用以支持山西的难童救助工作。

艾伟德与传教站里的长老商量了一下，决定由路先生带晋城的一批孩子先去陕西，并从那里取回一些钱来。路上肯定非常艰苦，因为要走好多天，要翻过大山，还要渡过黄河，然后继续西行。路先生带着百余名孩子上路，他们是从晋城出发的，身上只带了一两天的粮食，其他只能靠在路上乞讨。

艾伟德等人预计整个旅程耗时两周时间，所以月内路先生大约就能回来。

路先生等人离开后，与以前一样，孩子的数量仍在增加，月底时再次达到100多个。艾伟德和她的助手继续给孩子们上课，讲《圣经》故事，并尽量使他们保持干净，有东西可吃。他们一直盼望着路先生回来，但一个、两个月过去了，仍没有任何消息，而战争的形势却在持续恶化。

1940年，日军要血洗晋城的消息再次传来，城内的百姓纷纷逃离。驻守当地的中国军队也在准备转移，有指挥官建议艾伟德和他们一起撤离。艾伟德拒绝了他们的好意，决定要留下来，因为她觉得基督徒不该后退，而且战争时期她有很多事情要做，更何况她已经见识过日本人的占领。不久，指挥官再次派人来通知她撤离，而且给她看日本人四处散发的通缉令，上面有她的名字，并且标明了赏金。至此，艾伟德自身的安危也成了问题。

艾伟德在征求了戴维斯等人的意见之后，迅速决定要走，而且要亲自把孩子们带到安全的地方。艾伟德回到自己的住处，烧掉所有的文件、照片。第二天一大早就从晋城逃出来，路上遭遇日军的射击，她迅速伏在地上，裹着脱下的棉袄滚到一边的灌木丛里。子弹在艾伟德的棉袄上打了许多弹孔，她受了伤，但很快爬起来，继续拼命向阳城方向跑去。经过一整天，晚上时，艾伟德到了一个待人很友善的村子，在那里找到一些吃的，并休息了一夜。转天早上，艾伟德继续赶路，傍晚到了阳城的程村（Cheng Tsuen），她在阳城地区收留的孩子多在那里。

## 2. 大迁徙

在去阳城的路上，艾伟德已经决定要亲自带孩子们到陕西去，再不能将他们留在中日交战地带。艾伟德估计路先生一定出了事，后来证实确实如此，路先生在完成任务返程途中遭到逮捕，并被带到军事法庭，因为他讲的是处于沦陷区的晋城话，中国军方怀疑他是日本的间谍而把

他关了起来。

听到艾伟德的决定后，朋友们都劝阻她，因为从阳城去西安的路程有数百英里，并且很难短期内筹措到百余名孩子长途跋涉所需要的食物和钱。此外，路上如何照料那些孩子，从哪条路走，都是问题，因为日本人早已封锁了大部分的道路，只能翻山越岭，所以注定是异常艰辛的旅程。有人甚至建议她一个人走，那样更容易脱身。艾伟德拒绝了，她依然要带领所有孩子一起走，至于路上照料孩子的人手方面，艾伟德认为，除了几个成年人外，年龄大的孩子也可以去照顾年龄小的。决定之后，艾伟德马上去见县长，尽量讨要了一些路上所需的食物。县长还派给她两个人送他们一程，但县长仍认为艾伟德的做法并不明智。

1940年3月的一天，艾伟德带着孩子出发了。秦秋蓉是亲历这次大迁徙活动的难童中的一个，那年她13岁。据《六福客栈：小妇人艾伟德传奇》中称，她祖籍河南新乡区旗县，两岁没了母亲，哥哥被卖，姐姐给人家做了童养媳。1932年，不到5岁的秦秋蓉和父亲一路要饭到了山西，投奔在泽州教会做事的伯父。教会收留了他们父女俩。秦秋蓉还上了难童学校，主要学习语文和数学。据秦秋蓉回忆，当时一起去西安的孩子有100多个，随行还有几个成年人，挑着粮食和锅子。队伍被分成若干组，每组30来个人，组长由成年人担任，管理很严。孩子们有男有女，最大者13岁，最小者3岁，有背的，有抱的，还有挑在筐里的。他们中有的穿着烂棉袄、棉裤，有的只穿着一件及膝的破上衣。大些的孩子背着铺盖卷和吃饭用的碗筷。队伍行走得很慢，首尾拉得很长。艾伟德一会儿在前，一会儿在后，指挥着大家。秦秋蓉记得是刚过春节后，大部分孩子没有棉衣，也没有被子。少数大的孩子带了被子，到了晚上大家合着睡。哪里有庙，他们就住在哪，走到哪吃到哪。吃的嘛，就是些老玉米、小米饭、窝窝头。在大山里实在走不动了，每个人都拄上了小棍子。但实际情形或比秦秋蓉的回忆艰难许多。起初，有些孩子在前面兴奋地奔跑，有些则沿路慢

悠悠地闲晃。但随着日子一天天地过去，孩子们逐渐变得安静下来，一个跟一个赶路。年龄大的孩子需要帮助小的，甚至有时要背着他们赶路。

《震惊世界的六福客栈》的作者，经过实际调查，并结合文献记载，给出艾伟德他们可能的行走路线。第一天晚上，他们到了河北匠礼村，他们吃了一点稀饭，当晚就宿在村东头的玉皇庙。第二天天一亮再次启程，走到吊猪崖，稍事休息，继续赶路，经过封头、刘庄和驾岭村，晚上没有找到可以落脚的村庄，就在山岭上露宿。第四天，他们到了阳城与垣曲交界的横河镇。此后，随身带的粮食吃完，县里派来护送的人也回去了，日子变得很是难过。艾伟德和孩子们又累又饿，只得在山谷中慢慢前行。后来，他们又路过了中寺村、日耀村，来到黑尾山，花了好几个小时才翻了过去，西行到了云蒙山。在山脚的斩鬼村，他们要了些水，休息了一下，继续赶路。

据艾伟德回忆，那时所经过的地方，常没有真正的路，只有骡道，他们不停地走，翻过一座又一座山。到了晚上，除了一次在兵营外，通常都是睡在路边或破庙里，而且通常是躺在毫无遮蔽的天空下。他们没有毡子，所以大家挤在一起互相取暖。艾伟德他们一路走，一路乞讨，但晚上也至多能喝上一点稀粥。日子一天天过去，孩子们因为极度疲惫，逐渐焦躁不安起来，而且有人也时常在哭。不少孩子在喊脚很痛，大的孩子也已经几乎累到背不动小的，导致队伍每天走的路程越来越短。艾伟德只得尝试用各种方法去分散孩子们的注意力，尽力使他们暂时忘掉疼痛，继续前行。一路上，他们唱完了所有知道的赞美诗。经过12个漫长而疲惫的白天以及12个令人战栗的夜晚之后，到黄河还有多远，还需要再走多少天，还要再翻过几座山？每到一个村子，孩子们都会问艾伟德这个问题。

队伍继续挣扎着前行，根据《震惊世界的六福客栈》的研究，艾伟德他们后来又渡过了马家河，路经了垣曲的五里阴，上、下十里坡，鱼儿爬，三里河，三里腰及百里老灌沟，经过同善村，终于走到了黄河边。在

他们的面前，阳光下那条宛如向他们招手的金色缎带即是黄河。

艾伟德他们来到垣曲镇，本来以为在那里就能找到很多食物，甚至可以戏水、游泳。但是到了之后，才发现这个黄河边的小镇已被人弃置，根本没有什么人，也找不到任何吃的东西，孩子们很是绝望。后来，艾伟德找到了几个士兵，恳求他们施舍点吃的，结果也只是给孩子们喝了一点稀粥。孩子们当晚勉强睡下，但因为饥饿第二天清晨很早就醒了过来。所有人都寄希望于早些找到渡船过黄河，到了对岸就会有吃的了。

他们等啊等啊，一直竭力盯着对岸，可许久不见有船来。艾伟德再次去军队驻扎的地方，询问指挥官何时会有渡船，方才了解到船早就已经停驶了，因为日本人随时要来。为了孩子，她再次到军队讨要食物，甚至给他们下跪，最终却没有收获，因为军营里也没有什么粮食。艾伟德陷入了绝望，整晚异常忧虑，只得不停向她自己的上帝祈祷。

第二天，遇到了一名军官，在其帮助下，艾伟德他们终于找到船并渡过了黄河。到了对岸，孩子们在镇上终于吃了一顿饱饭。休息了两天，大家再度赶路，大家都知道若能在澠池搭上火车，几天之内就能到西安。到了澠池之后，在即将登上列车时，许多孩子被蒸汽机启动的轰鸣声以及刺耳的汽笛声吓跑，毕竟他们当中大部分从未见过火车。艾伟德费了很大力气才把他们从货车下、站台里、墙角后拉了出来，上了车。

火车在陕县停下来，列车员大声宣布所有人都在这里都要下车。看到前面还有铁路，于是艾伟德据理力争，毕竟孩子们跋涉多日，都已经疲惫不堪。列车员的解释是，车再前行就到了黄河边，日军就在对岸，随时会开枪，故而旅客只得在此下车；若要继续前行，就得翻过眼前一座大山，山那边就是潼关，在那里才能再搭去西安的火车。列车员口中的大山其实是崤山，绵延四百余里，最高峰海拔1903米，是河南通往陕西的天然屏障。可是孩子们太累了，他们如何能够翻过崤山呢？于是，艾伟德去找了火车站站长，恳请他为孩子们想些办法。站长也没有什么好办法，只是派了两名士兵给他们帮忙。艾伟德无路可退，因为他们既没办法回到山西去，又

不能留在当地。

翻越崤山着实非常艰难，因为路况远比他们经过的那些地方更为艰难，若没有士兵的帮忙，很多孩子绝对没有办法走完。晚上他们就睡在光秃秃的山上，早晨起来接着再挣扎前行。第二天傍晚他们到达潼关，火车站就在前方，大家的精神为之一振。但到了潼关，没想到面临的仍然是失望。那里的官员称，潼关站已经不再有火车发出，理由是附近正在打仗。面对此情此景，艾伟德非常焦虑，孩子们已经到了疲劳的极限，甚至有些人已经在生病，他们必须要赶到西安去，这样孩子们才会真正安全。这时有人走过来，悄悄告诉艾伟德，可以搭黎明前开出的一列运煤车，但需要孩子们俯下身，而且要保持绝对的安静，不然就会有生命危险。艾伟德把几个年龄较大的孩子召集起来，嘱咐他们分工负责小的孩子们，避免发出声响。第二天黎明，艾伟德叫醒年龄大的孩子，静静地把仍在睡眠中的小孩抱起来，一个一个轻轻地放在煤上扶好不动。火车开动了，艾伟德非常紧张，但好在没有任何事情发生。

又一次得下火车了，艾伟德向临近的士兵们以及村民要了吃的，晚上就睡在路旁，第二天他们穿着破旧肮脏的衣服，踏上最后的征程——据说再有三天就能抵达西安！孩子们一边走一边继续唱着歌，前方的西安对于艾伟德他们这群人而言几乎就是天堂。

在经历了整整27天后，艾伟德终于将孩子们一个不少地带到了西安。可是到了之后，却发现城门紧闭。艾伟德苦苦请求守兵放行，最终仍被拒绝了。当时西安已接纳了来自各地的难童近3000人，已经没有能力承受更多。在所有人几乎欲哭无泪时，有人告诉他们，扶风那里有孤儿院以及寺院，可以继续接纳孩子，而且火车一天就可以到那里。

艾伟德他们上了火车，终于到达了扶风的孤儿院，那里已经为他们准备好吃的以及睡觉的地方。孩子们终于安全了！艾伟德给自己定的任务终于完成。孩子们都得到妥善的安置，有床有干净松软的被褥，而且一律换上了新衣服和新鞋子。大家按年龄和文化程度分了班级，开始了正规的学习生活。

表2 艾偉德千里大遷徙中陽城籍亲历者情况表

序号	姓名	曾用名	生卒年	性别	籍贯
1	白成瑞	白成恩	1922—2001	男	演礼栅村
2	白蒙恩		1918—1991	女	演礼栅村
3	白恩桃		不详	女	演礼栅村
4	白基法		1932—1996	男	演礼栅村
5	白小顺		1935—1997	男	演礼栅村
6	白恩丽		不详	女	演礼栅村
7	白美丽		1925—1992	女	演礼栅村
8	白小家	白小规	1931—1997	女	栅村嫁演礼
9	白真瑞		1928—1987	男	演礼栅村
10	白忍耐		不详	女	演礼栅村
11	白花秀		1937—	女	栅村嫁王曲
12	张永生		1922—1992	男	演礼栅村
13	张小顺		不详	男	演礼栅村
14	张老有	张银保	1933—2010	男	栅村、上芹
15	张宗仁		1932—2004	男	演礼栅村
16	马主贵		1927—1994	男	演礼北任
17	马恩秀		1929—1988	女	演礼北任
18	马成瑞		1926—1981	男	演礼北任
19	马福瑞		1933—1995	男	演礼北任
20	秦春蓉		不详	女	演礼北任
21	秦秋蓉		1927—	女	演礼北任
22	李恩生		1924—	男	演礼献义
23	李小凤		不详	女	演礼献义
24	李枝娇		1927—	女	演礼献义
25	张瑞兰		不详	女	演礼献义
26	张瑞连		1928—2010	女	演礼梁庄
27	成毓贤	成长虎	1935—1997	男	演礼台底
28	高晓川		不详	男	演礼台底

《震惊世界的六福客栈》的作者林云及其他一些社会人士，曾对亲历千里大迁徙的难童情况进行了大量的调查，查明其中28名阳城籍难童的情况，如上表所示。然而，至2014年，在上述28名亲历者中，尚在世的只有两人，一为秦秋蓉老人，一为其堂姐秦春蓉，且后者已成植物人多年。不过通过家谱以及亲历者的亲人仍可大致了解来自阳城的亲历者的情况。

据阳城县演礼乡献义村李德光的家谱记载，1940年3月，确实有难童从阳城去了陕西扶风，到了8月，有35名难童回到了山西，“民国29年三月，恩生，小凤、枝娇去西安扶风县教养院上学，六月二十六日预备赴



西安接学童，七月同王友德、秦酉山起程，二十二日到扶风，二十七日返西安交涉事务，八月初一日同秦酉山返扶风，初三日同赴郿县见艾教士借路费，蒙夏牧师等共措洋七百余元，至八月十二日至绛帐搭火车领男女35名，十四到渑池住一礼拜，至八月二十九日到西岭后。”（转自《震惊世界的六福客栈》）这里的西岭后即今天的献义村。而据林云等人的调查，赴陕西阳城籍难童多为亲戚关系，如演礼乡栅村的15人，以白姓为主且多是近亲；北任村6人以马姓为主，也有亲戚关系；而献义村4人中3人为亲姐弟。此外，这些儿童也不全是孤儿，其中有少数是教会人员的子弟，前述白家人的名字“白蒙恩”“白忍耐”“白基法”，字面上似乎与基督教的教义相关。

不过，既然艾伟德自述中称带走的多是其收养的孤儿，而且据前述家谱记载，返回阳城者只是其中一小部分，那么，其他孩子后来情况如何？因为相关文献阙如，我们无法确切了解全貌。但根据香港《华侨日报》1967年11月20日的报道《艾伟德教士抵港，在信义中学讲道》，可知其中部分人后来的去向，“艾氏在居留中国期间，近百儿童蒙其抚养，现均长大成才，且分布于美国、加拿大、澳洲、新加坡、马尼拉、锡兰、日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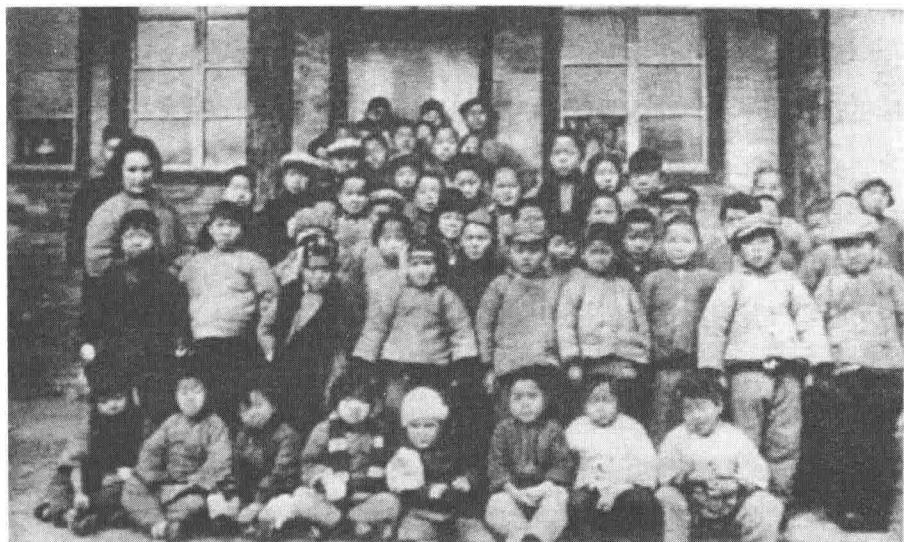


图4.2 长途跋涉之后艾伟德与部分孩子的合影

南非等地。”

不管怎样，艾伟德以弱小女子的体魄，凭借坚强的个人意志，率领百余名难童完成的这次从山西阳城到陕西扶风大迁移的壮举，久已成为后世许多传记作者笔下最为生动、丰富与感人的题材。

### 3. 病倒

其实在抵达扶风之前，艾伟德就病了。而当孩子们都安顿好之后，艾伟德就将孩子们召集起来，与他们道别。孤儿院的人们希望她留下来，好好休息，直到身体彻底康复。艾伟德没有同意，因为她觉得自己不能休息，有太多的事要做，她首先从孤儿院附近的村庄开始传教的工作。

不过，很快艾伟德就病倒了，醒来才发现自己躺在西安一间医院里。据艾伟德后来的回忆，她是在村里旅行布道的时候病倒的。当时没有人知道她是谁，有个男孩跑去告诉了当地的一个美国传教士，是这个美国传教士用牛车把她送到当地的一个传教站。两天后，西安浸会医院的一个医生来到了那个传教站。医生对艾伟德的病情很是挠头，因为她得的是肺炎还有斑疹伤寒，而且很严重。医生建议把艾伟德送到西安医院，到了那里艾伟德也许还有救。由于路途遥远，搬运危重病人是极为危险的，所以那个医生找人将牛车设法搬到夜间的火车上，这样才能保证艾伟德平安地抵达西安。

艾伟德被搬到火车上，然后在一群善良却并不相识的朋友看护下，终于抵达了西安。令他们很吃惊的是，路上一直昏迷的艾伟德突然唱起了赞美诗，还曾低声向上帝祈祷。据董艳云（Phyllis Thompson）在《伦敦小麻雀》（*A London Sparrow*）一书中的记载，到了西安，经过英国浸信会两位医疗传教士史医师（Dr. Handley Stockley）及葛医师（Dr. Gustafsen）的诊断，确定艾伟德是患上了回归热、斑疹伤寒、肺炎，此外还有严重的营养不良以及其他一些较轻的疾病，导致她的精力早已消耗殆尽。在医生的全力抢救之下，并且服用了当时从美国带来治疗肺炎的新药——硫化吡锭

(Sulphapyridine)的艾伟德，才逐渐好起来。

在艾伟德自述里，她声称自己在医院里躺了一个多月，身体才有所恢复，但变得对周遭的事不太有意识，记忆也有些模糊。不过，就像遇到了奇迹一样，之前负责带领孩子从晋城到西安的路先生也来到西安。在获得释放后，他立即去寻找艾伟德和孩子们。经过一位中国牧师的指引，路先生终于见到了艾伟德。路先生告诉医生护士，艾伟德来自山西南部的阳城，曾历经千辛万苦将百余名孩子从日本的占领区带了出来，一直带到扶风的孤儿院，她的中文名字是艾伟德。

后来，据董艳云《伦敦小麻雀》里的记载，为了使得艾伟德得到最好的照顾，英国浸信会的传教士们决定把她送到郟县 (Mei Shein) 进行静养。艾伟德住在费海柏夫妇 (Mr and Mrs. Hubert Fisher) 家长达半年之久，经过一段时间的休养以及足够的营养补充，她的身体终于日渐好了起来。艾伟德在自己的中文《圣经》里写道：“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不要乱听闲言闲语……你的神是不是和你同在呢？”旁边用中文注有“1940年6月，读于郟县”的字样。而恰在此时，如前阳城李氏家谱记载，1940年8月，献义村的李恩生、李小凤兄妹等在艾伟德等人的资助下，带领35个孩子，又回到了阳城。

#### 4. 在中国内地最后的岁月

随着身体的好转，艾伟德继续在当地的农村进行传教，后来还回过扶风几个月，探望那里孤儿院中的难童们。就在此时，艾伟德再次提出申请，要加入中国国籍。据1957年9月3日台湾《联合报》的报道《祖籍英国女教士艾伟德昨抵台》记载，早在阳城时期，艾伟德已视中国为其家乡，并愿意为之放弃英国国籍而申请入籍中华民国。但当内政部批准艾伟德的申请时，她已与难童们从山西逃到了陕西。来到扶风后，艾伟德重新补办了相关手续。1941年7月15日，内政部批准了她的请求。艾伟德终于正式成为中国人。当时内政部所颁发的国籍证明书内容如下：

内政部国籍许可证明书

计开

许可归化人 艾伟德

性别 女

籍贯 英国伦敦

住所 陕西省扶风县福音堂

职业 传教士

随同归化人取得国籍者

此后，据艾伟德自述，她到过宝鸡（Boa Chi），凤翔（Feng Hsien），还到了甘肃清水县（Tsin Tsui）。艾伟德一路向西进行旅行传道，甚至还在一位黄姓医生的陪同下进到喇嘛庙与喇嘛们进行信仰上的交流；此后在霍伊特医生（Hoyte）夫妇的邀请下还到了兰州。艾伟德与霍伊特医生夫妇早已认识，其在阳城时期的家信中提到过他们。艾伟德的西北之行时间虽然不长，但对于认识中国各地不同的族群如藏族、回族，以及不同的信仰，如藏传佛教信仰以及穆斯林信仰，很有帮助。

此后，艾伟德再次回到凤翔。在那里，经当地官员批准，艾伟德进入一所监狱，在里面向犯人们进行传教，此外，她还去了附近的一所麻风病院，为那里的病人服务，并带领他们皈依基督教。1944年，当得知四川成都卫理公会正在招聘一位擅长说中文的传道人，以服务当地的难民的消息时，艾伟德申请了那个岗位。此后的四年间，艾伟德主要在成都活动，负责当地教会的行政事务。

1945年，抗战结束了，1946年内战再次打响，国民党节节败退。此时的艾伟德已离开家乡十数年，很久以来她就感到自己可能永远无法再回英国去，因为她无论是名字、语言还是衣着服饰都已经彻底中国化，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连思想也中国化了；并且，艾伟德在中国所做的一切，如收养孤儿、救助难民等，让她感觉自己是个被需要的、受尊重的人。但是，艾伟德的病时好时坏，友人卓伟医生（Dr. F. Olin Stockwell）建议她回英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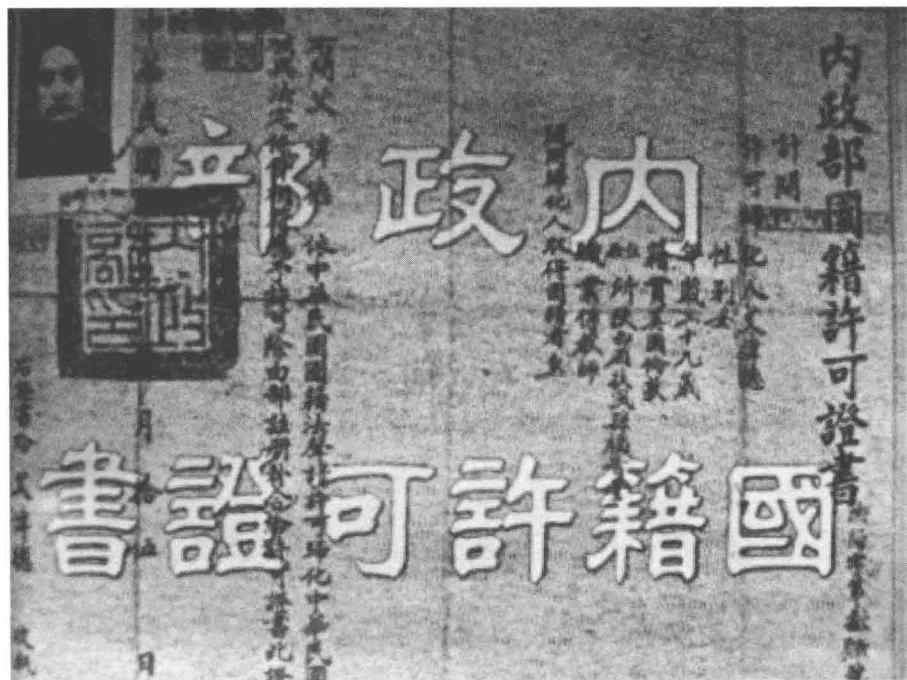


图4.3 内政部批准艾伟德加入中国国籍的许可证书

好好疗养。在不得已的情况下，1948年，艾伟德向中华民国政府提出去英国的申请，因限额已满，她只得又等了一段时间。事实上，当时的艾伟德虽然来华已经好多年，但她仍然是一贫如洗，仅凭自己的那点积蓄，要想回国基本是不可能的。据董艳云的《伦敦小麻雀》里的记载，艾伟德最终能够成行，离不开卓伟医生的帮助。卓医生不仅给救济失去联络的传教士委员会<sup>[1]</sup>写信，请求该委员会为艾伟德支付从上海到英国伦敦的船票；还致函上海的中华内地会总部，请他们为艾伟德安排在上海期间的住宿；最后，卓医生还为艾伟德准备了从成都飞往上海的飞机票。

1949年3月，艾伟德在上海登上了一艘希腊籍的轮船，离开中国，终

[1] 据艾伟德的回忆，基金会是由德国人捐资设立，用于帮助那些在华的德国传教士和孤儿返乡。而据伯吉斯的《小妇人》记载，基金会则是美国人设立，而当时负责管理剩余基金的是中国人。



图4.4 艾伟德在成都布道

于回到了阔别长达17年的英国。



## 五、晚年的艾伟德 |

## 1. 享誉故乡

1949年春，47岁的艾伟德终于回到阔别已久的英国。经过多年战乱，她的父母、弟弟、妹妹都还健在，久别重逢，令她感受到久违的、来自家的温暖，这对于其身体的康复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随着身体的复原，艾伟德再次忙碌起来。

据《小妇人》中的描述，回到英国后的艾伟德仍然特别在意人的信仰问题。她发现英国有不少中国人，很同情他们在异乡饱受孤独，于是将他们组织起来，形成以华人为主的教会。除了引领他们的宗教信仰之外，艾伟德尽其所能帮助来英国求学的中国学生，像母亲那样事无巨细地关心他们；挺身而出救助陷入困境的英国华人雇员；此外，还四处奔走，为来自香港以及新加坡的海员在利物浦建立起一所医院。

艾伟德如此关心英国华人的信仰以及生活，不仅是因为从国籍上讲她也是中国人，而且从生活习惯、衣着甚至思维方式上讲，她和那些人也没什么差别。而据其回忆，作为中国旅英的侨民之一，艾伟德和其他华人一样，要按时向警察局报到，而且在一次去北爱尔兰的途中，她曾因穿着中式的服装、讲中国话，而遭到警察盘问，甚至差点遭到拘留。

回到英国后，艾伟德在中国的事迹，起初并不为人所知，因为她为人谦逊，从不主动谈及往事。据英国《国家传记辞典》记载，直到《伦敦时事新闻报》（*London Daily News*）的一位宗教类新闻记者莱德伍德（Hugh Redwood）从艾伟德的母亲那里了解到一些事情以后，艾伟德才被英国媒体所关注。此后，旅行布道便成为艾伟德生活中最为频繁的工作之一。

1949年8月11日，艾伟德给某人写了一封信，是笔者迄今所见最早的艾伟德受邀进行旅行演讲的记录，地点在英国伯明翰东北部的汉兹沃思市（Handworth）。不过基于现有的文献，尚无法确定此次旅行讲演与前述莱德伍德的报道之间是否存在一定的关系。

非常感谢你的来信，这个月我有个礼拜天没有事，那天是8月



28日。你能帮我找个地方住么？我将在周六晚上到你们那里，准备周日的演讲，我将于周二返程……

我愿意拿出整个星期天进行演讲，你们也可以在周一晚上安排一场公开的聚会，周一下午安排一场女生的聚会，或者举办两场也可以。

对此，你放心，我会准备好一切。现在我要说的另一件事是（演讲）无须付费。

值得注意的是，信的末尾有“艾伟德”三个中文字的签名。

接下来一个人的出现，可以肯定对艾伟德的人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这个人名叫阿兰·伯吉斯（Alan Burgess, 1915—1998），是个美国人，当时是英国广播公司（BBC）的制片人，也是一名畅销书作家，好莱坞电影

GRACE and peace be multiplied  
unto you, through the knowledge  
of God, and of Jesus our Lord.  
2 Peter 1:2

Aug.  
Thurs. 11<sup>th</sup>, 1949.

Dear Mrs

I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your letter, I have just one Sum. free  
and that is Aug. 25<sup>th</sup>.

Would it be possible for you to find  
me somewhere to sleep, then I would com  
on Sat night ready for Sun, & Mon, and  
return on Tues.

I have a brother living in  
Handsworth and I honestly believe  
you inviting me like this is an  
answer to my prayer for him.

He lives in Terrace Rd, I know  
he has no room to put me up as  
he is living with his Mother-in-law  
and I know his wife is not  
interested, but now I shall pray on  
and expect.

I will give you all day Sun.  
and you could have a public  
meeting on Mon. night, or women's

rally on Mon afternoon  
or both.

By this you will know I  
will be ready for anything.  
Now the next thing is this.  
there are no expenses.

My Lord sees to that, so do  
not think you have to take up  
collections, I suggest you put  
boxes at the door for free-will  
offerings and put it to some  
definite cause in your own  
Church. I will be praying and  
will work in with whatever  
arrangements you like to make  
for the 2 days.

Yours in Him.

awaiting your reply. but praying  
gladly Aylward.

艾  
偉  
德

图5.1 1949年8月11日艾伟德写给某人的信

《拂晓攻击》《六福客栈》等影片都是根据他的小说改编而成的。艾伟德去世后，在彼得·吉尔曼（Peter Gillman）的纪念文章《艾伟德的最后岁月，我们时代的故事》（*Gladys Aylward: The last chapter, Radio Times, May 14, 1970*）中，伯吉斯回忆到他们初见时的情景。

当时，伯吉斯正在为英国广播公司制作一档名为“不可战胜的人”（*One of the Undefeated*）战后英雄返乡系列的广播纪录片。当他看到莱德伍德对艾伟德的报道之后，马上打电话给那家报社，问到艾伟德家的地址，然后驱车直接去了埃德蒙顿区的查尔顿街，在路边的一所小房子前敲了门。据伯吉斯回忆，开门的艾伟德身高还不到他的肩膀，戴着一副角质架的眼镜，身穿高领中式旗袍。在听了伯吉斯的自我介绍之后，艾伟德看起来似乎很吃惊，因为她并没觉得自己做过令英国广播公司感兴趣的事。但是出于礼貌，艾伟德还是请伯吉斯进到屋内喝茶。在两人喝茶期间，伯吉斯听艾伟德讲起历时一月带领百余孤儿跨越山西、河南交界的重重大山，逃离日军占领区的传奇往事。不久，艾伟德的故事就变成英国广播公司的广播纪录片“不可战胜的人——战后英雄返乡广播系列”中的第一部，长达一小时。剧中的艾伟德由希尔雅·约翰逊（Celia Johnson）饰演。该剧1949年10月在英国首次播出，1950年1月，重播了一次；1954年，该纪录片又推出了第二部。

英国广播公司关于艾伟德事迹的广播纪录片的播出，迅即在英国各地产生广泛的影响。其结果就是艾伟德又多了一项工作，即在英国各地的教堂、学校乃至市政厅里演讲为公众进行布道。

1949年10月13日《纽卡斯尔太阳报》（*The Newcastle Sun*）刊出题为《曾经做过传教士的女士》（*Girl worked to be missionary*）的文章，向纽卡斯尔地区的人们介绍了艾伟德的生平事迹，特别强调其传教士身份，在没有任何教会的支持下，努力攒钱解决从英国到中国的旅费，历经艰辛，最终成为英国有史以来最富传奇色彩的传教士之一：

英国经历最多姿多彩的传教士之一——艾伟德不可思议的故

事又书写出新的一章。

她曾以女仆工作谋生，但是自幼就想成为一名传教士。她的教育经历可以忽略，以至于向中国内地会提出到中国工作的申请遭到拒绝。但她并未被吓住，而是先在斯旺西贫民窟开始从事社会工作，在那里她成为自由教会俱乐部里的姊妹。后来她得到山西一位女传教士助手的职位，那人一直是在山西独立工作，给艾伟德的回复是她必须自己负担旅费，靠信心生活，没有差会会支持她。艾伟德通过女仆的工作为其旅行攒钱，然后带着足够一个月换洗的衣服、一个铁壶，离开了英格兰。到了中国以后，艾伟德又走了数百英里，才遇到那位在其到达后不久就去世的传教士。艾伟德很快着手学习中文，两年后已经可以用中文进行演讲。虽然经常非常疲劳、饥渴，常常面临强盗的威胁，有一次甚至因伤寒濒临死亡，但她还是带领很多中国人改变了信仰，成为这个时代的传奇人物。

11月4日，布里斯托市（Bristol）的《西部每日报道》（*Western Daily Press*）刊出艾伟德在当地演讲的消息（*Gladys Aylward in Bristol*），内中称：“艾伟德（Ai-Wei-the是其中文名字，意为‘有德行的人’）的勇气与建议已激励到成千上万的人，上个月英国广播公司系列广播纪录片——《不可战胜的人》，第一个推出的就是她，讲述一个几乎不识字的伦敦女仆，经过努力，成为中国北部偏远山区省份的传教士，并在战争中历经诸多考验的故事。今晚六点，艾伟德将在教堂里亲自讲述她自己的故事。”在这则新闻中，记者还将艾伟德途经西伯利亚到中国的旅程称为“自杀之旅”，并讲到她在中国停留了17年，已成为中国的国民。最后，指出艾伟德是处于战争、瘟疫、恐惧中的中国人的老师、医生、顾问以及朋友。在布里斯托期间（周六、周日），艾伟德的日程非常紧张，每天要去几家教堂做多场演讲。

1950年2月24日，欧洲发行量曾经达到800万份的《调查镜报》（*Surrey*



图5.2 艾伟德在讲演中

*Mirror*) 也刊文《走在十字架的道路上》(*At the Cross*)，介绍到艾伟德的事迹，“本地听众可能记得，在去年10月或者今年1月的‘不可战胜者’广播纪录片第一次节目中，英国广播公司推出艾伟德的故事。一个期望成为传教士的女仆在传教士选拔考试中失利，然后以自己的方式，1932年跨过苏联西伯利亚，绕过中国东北地区，最终到达中国北部的山西。她在那里度过17年艰辛的岁月，遇到过日本敌机的轰炸，受到日本兵的鞭打（甚至以为她死了而丢弃）以及其他很多的危险。”

此后，根据*Western Morning News*、*Whitstable times and Herne Bay Herald*、*Gloucestershire Echo* 等英国各地报纸的报道，1950年，艾伟德还去了德文郡（Devon）及下属的普利茅斯市（Plymouth）、肯特郡（Kent）以及切尔滕纳姆市（Cheltenham）等地。虽然上述城市多属于英格兰及威尔士地区，但艾伟德的影响并不仅限于英国，部分其他西方国家的媒体也开始注意到艾伟德的事迹。

1949年11月21日，美国的《时代》周刊（*Time Weekly*）以《宗教：一个具有美德的人》为题，报道了艾伟德在英国城市斯旺西（Swansea）进行演讲的情况：“上周，个子小巧有着棕褐色眼睛曾做过女仆的这个女人，使得全体英国人坐了下来，屏气凝神地聆听英国广播公司播放其在中国传教的传奇经历。在威尔士的斯旺西，每天下午和晚上很多人驻足教堂倾听她的免费演讲。她就是艾伟德，穿着中国式的衣服（旗袍），一直在尽其可能地为人们讲演她的经历。”1950年1月9日，澳大利亚的报纸《西北导报》（*The North Western Courier*）刊登出一篇题为《艾伟德的英雄主义》（*The Heroism of Gladys Aylward*）的文章，显然是根据英国广播公司的纪录片，也较为详细地介绍了艾伟德到中国山西阳城传教的过程，以及在中国遭遇的种种险境（包括抗战中的经历），并特别提到艾伟德当时给家人的一封信：

现在我必须重述一遍我之前说过的话，不要指望我会离开这里，或希望通过某种方式将我弄走，因为经历考验时我不会离开。这里有很多人，上帝把他们交给我，为了他的荣耀，无论生死，我都和他们在一起。

1950年，莱瑟姆（R. O. Latham）将艾伟德的口述整理出版，题为《艾伟德：一个不可战胜的人——艾伟德本人所讲的故事》（*Gladys Alward: One of the Undefeated, the Story of Gladys Aylward as Told by her to R. O. Latham*），共48页。至1952年已经印刷了8次。

随着英国广播公司相关纪录片的两次播出，以及其个人传记的问世，艾伟德迅速从一个普通的女传教士成长为具有相当知名度的宗教与社会演说家。观众对艾伟德的演讲印象很深刻，历久难忘。听众希拉·布鲁克（Sheila Brook）在其著作《秘诀在哪里》（*Where is the Key*）里这样评价艾伟德的演讲：“她的故事讲得很简单，但很生动，以至于我如今仍记得其中大部分细节。那些故事非常引人入胜，以至于我觉得自己必须

充分去体会。她确实是个女超人，虽然个子很小，但是身体、精神乃至信仰上都非常强大。”艾伟德在英国社会所产生的影响逐渐超乎人们的想象。她的事迹甚至被改编为戏剧在教堂中演出。据1953年4月24日英国报纸《白金汉先驱报》（*Bucks Herald*）报道，白金汉郡（Buckinghamshire）的教堂内上演了由霍奇（A. Hodges）及其太太主创而由莫雷（P. Morey）饰演艾伟德的戏剧，许多人到场观看了该剧的演出。



图5.3 1957年出版的《小妇人》书影

限于个人的精力、时间，以及经济原因，笔者无法穷尽当时英国报刊媒体对艾伟德事迹的报道，故而亦无法绘出其在英国旅行演讲的区域分布图，同样仍无法给出其演讲的具体次数。但一般而言，在艾伟德演讲之前，当地媒体会登出相关启事，而且时常提到前述英国广播公司的广播纪录片，接着会出现（艾伟德）“讲述自己的传奇经历”的语句；而演讲之后，媒体会再次进行相关的报道。

但是，英国社会对艾伟德事迹的关注远未达到顶峰。1957年初，曾为艾伟德制作纪录片的伯吉斯，推出更为详尽的艾伟德传记——《小妇人》（*The Small Woman*），在西方世界迅速成为畅销书，初在英国的伊文思兄弟出版公司（Evans Brothers）发行，同年又在美国的达顿出版社（E. P. Dutton & Co.Inc）出版，并于当年的4月、11月有过两次重印。至1971年，《小妇人》在美国达顿出版社已印行了12次。

《小妇人》一书的出版，尤其是在美国的同步发行，直接促成了好莱坞电影《六福客栈》的诞生，同时也给艾伟德带来了一定的经济收入。然而，在常人看来名利双收的事情，艾伟德却似乎并不在意。她在乎的是中国，迫切希望要回到那里去。

实际上，艾伟德久有回到中国的想法。早在回到英国的当年，即1949

年，她就曾多次流露出要回到中国的愿望，因为那里才是她的国家。如前所述，1949年10月13日英国的《纽卡斯尔太阳报》即称：“艾伟德的心与中国人在一起，因而拿出了她的中国国籍证明。如今她正在英国拜访她的父母，47岁的艾伟德将尽快返回她深爱的中国。”当年11月4日布里斯托的《西部每日报道》也刊出了艾伟德要回中国的计划，即结束英国的假期之后，她就回到中国继续基督教内的工作。1950年2月24日《调查镜报》的文章《走在十字架的道路上》中也有类似的提法：“艾伟德小姐已经成为中国国民，她希望返回中国，继续那里的工作。”

实际上，艾伟德曾多次试图回到中国，并付诸行动，惜每每皆因事未能成行。据1957年9月3日《联合报》的新闻《祖籍英国女教士艾伟德昨抵台》的报道：“第一次艾伟德准备来华时，不慎跌倒导致行动不便，被迫将行程取消；翌年病愈再度起行，又因染病而未能成行；第三次方欲来华，却因义子亟须经济资助，不得已将船费全数汇给他，以至于再次无法成行。纵然如此多磨，艾伟德还是在返英8年后，在其母逝世之后，于1957年4月搭船重返远东。她本来想重回中国内地，因时代所限，未能如愿，于是留在香港从事难民救助的工作，后因所持中国护照在香港的居留签证期限已到，而于当年9月转到了台湾。”

## 2. 对电影《六福客栈》的态度

1957年9月2日，艾伟德抵达台湾，面对欢迎的人群，她说过这样的一些话，“我这次以一个中国人的身份回到自己的国家，希望大家不要把我当作外国人看待”，“我愿意做一个中国人，她是那么一个令人愿意献身的国家”（查仞千：《中国籍的英国小妇人——艾伟德热爱中国》，《正气中华报》，1958年7月3日）。抵达当天，媒体竞相报道，艾伟德受到很好的接待，她的两位义子亲自在基隆港迎接，一位是在嘉义空军服役的田庄，另一位是医学院毕业的精神科医师朱复礼。这两个人过去都曾受到过艾伟德的照顾。最初一些日子，艾伟德四处走走，接受各地朋友的招待，

同时也在考虑自己在台传教工作的定位。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台湾社会动荡，经济凋零，人民生活困苦，加上由大陆退到台湾的军民数量庞大，安置还是问题，许多家庭破碎，妻离子散，儿童流离失所，无依无靠。当时物资缺乏，道德标准亦遭破坏，成年人自顾不暇，哪有余力照顾这些不幸的儿童，有些儿童竟成家庭之累，被抛弃路旁、流落街头，少有人假以援手，一般救济机构仅给予紧急救助，使之免于饥饿、疾病与死亡而已，根本无法顾及儿童身心的需要，以及提供正常发展的机会。有鉴于此，艾伟德决定援用过去在山西收养难童的模式，在台湾成立孤儿院，时间约在1958年前后，并展开收养安置孤儿的工作。（陈中陵：《孤儿之母：女传教士艾伟德的生平与形象》，台北教育大学2008年硕士论文）最初，她生活很清苦，在和平东路二段分租到一间小木屋，和临时搭成的一个小厨房，下雨就不能做饭，但她安贫乐道，毫无怨言，她的衣饰、用品和生活方式，都是中国化的，在她的小书架上，还放了一枚咸丰通宝的铜钱，她真比许多年轻中国人更是中国人。（《〈六福客栈〉片中女主人翁艾伟德女士赴美布道》，香港《工商日报》，1959年2月23日）

1957年初，伯吉斯的传记小说《小妇人》在英、美两国出版。20世纪福克斯电影公司立刻敏锐地感到主人公艾伟德的事迹是极佳的电影题材。于是，专程赶到台湾与艾伟德签订了《小妇人》的改编合同。然后，又选定加拿大著名导演马克·罗伯逊（Mark Robson）作为该剧的导演，其代表作品为《大逃亡》。继而又选定美国人艾索比尔·伦纳特（Isobel Lennart, 1915—1971）作为该剧的编剧，伦纳特的代表剧本除《六福客栈》外，还有《琵琶怨》（*Love Me or Leave Me*）以及《妙女郎》（*The Funny Girl*）等。经过伦纳特的改编，《小妇人》中的“阳城”变成了“王镇”，艾伟德的名字变成了“珍爱”，此外，还增添了大量描述女主人公珍爱与人恋爱的情节。

导演马克·罗伯逊还亲自飞到巴黎请瑞典女星英格丽·褒曼（Ingrid Bergman, 1915—1982）来饰演艾伟德在电影中的角色“珍爱”。虽然在





图5.4 电影《六福客栈》剧照，褒曼饰演的珍爱县长大人的小妾在一起

出演《六福客栈》前，褒曼已是两届奥斯卡最佳女主角，主演过《圣女贞德》（后被评为世界十大不朽名片），以及《圣玛丽的钟声》（获美国金球奖），已经有圣女的光环；但在主演《六福客栈》之前，据《我的故事：英格丽·褒曼自述》，褒曼正面临结束第二次婚姻的问题，她迫切需

要在事业上再次崛起。于是褒曼并未迟疑便接受了邀请，虽然其外形气质与艾伟德相去甚远，从身高上讲，褒曼身高有1.75米，而艾伟德才不过1.50米；至于容貌气质上，褒曼是极为靓丽的金发美女，后来有“好莱坞第一夫人”之称，而艾伟德到中国传教的原因中就有自己外貌不像西方女人的方面。

选定了导演，改编完剧本，又确定了主演之后，20世纪福克斯公司开始着手准备电影的拍摄工作。1958年1月12日，20世纪福克斯公司制片助理麦克纳在台北召开记者招待会，宣布将拍摄《六福客栈》，艾伟德亦有出席。记者会上还宣布英格丽·褒曼3月将来台湾，在电影中饰演艾伟德。此前导演马克·罗伯逊和剧组人员已抵达台湾，并主动联系到艾伟德，请她帮忙。一位热心的助理导演还请艾伟德找些朋友制作演出用的帽子和服装，以备在影片中应用，而这些人将来也会成为电影里的临时演员。〔（瑞）英格丽·褒曼、艾伦·伯格著，刘安义、吴忠民译：《我的故事：英格丽·褒曼自述》，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3年〕

但《六福客栈》的拍摄进展并不顺利，由于电影剧本里出现民国时期



图5.5 1958年1月16日制片助理与艾伟德等人交流意见

的政府官员穿清朝官服，乘坐轿子，妇女缠足，孔庙中有和尚，以及砍头等情节，引起台湾当局以及社会各界的强烈不满。台湾“新闻局”直指《六福客栈》的剧情有悖史实，并指出，“该公司是否有意侮辱我们因而出此，尚不得而知，但其欲借此有若非洲‘蛮荒’世界的猎奇镜头以吸引洋观众，增加卖座力，其意图则是显而易见的。”（黄铭：《小脚妇人与〈六福客栈〉》，香港《工商日报》1958年2月3日）由此拉开台湾当局与20世纪福克斯公司交涉的序幕，而卷入其中更深的却是艾伟德。

《六福客栈》制片助理麦克纳发表声明，对台当局以及舆论的指控进行了辩解，称：“剧本中的小脚镜头是旨在说明中国政府当局通过艾伟德女士的努力，把旧中国的许多不良习惯加以改变，而不是以小脚增加该片的戏剧化。”并且指出剧本中有些情节是伯吉斯《小妇人》中原来就有的。（黄铭：《小脚妇人与〈六福客栈〉》，香港《工商日报》1958年2月3日）1月16日，麦克纳与艾伟德一同宴请了山西籍民意代表及中国国民党台湾竹党部主任委员郭澄等人，听取各方对于《六福客栈》的拍摄意见。1月18日，台湾“新闻局”等有关单位经过会商研究，向福克斯电影公司提出“必须修正”与“建议修正”的45点意见。（董飞飞：《西方大众文化视野中的来华传教士形象》，陶飞亚主编：《宗教与历史2：中国基督教青年学者论坛》，上海大学出版社，2014年）“新闻局”的要求导致台湾官方与福克斯公司的分歧进一步拉大，以至于制片助理麦克纳扬言要放弃在台湾拍摄《六福客栈》。但是，福克斯公司当时并未放弃最终的努力，1月27日又派了制片室主任麦嘉德到台湾进行斡旋，当时台湾舆论称：“福士对于《六福》一片，迄未放弃在台拍摄的计划。此来即在于就拍片这个问题与有关各方团体进行磋商，以作最后决定。福士改最高级人员来台，显在求得问题的解决。”（黄铭：《小脚妇人与〈六福客栈〉》，香港《工商日报》1958年2月3日）2月初，台湾当局各相关部门与20世纪福克斯公司高层再次进行了讨论，结果双方并未透露。但是，福克斯很快即正式致电有关单位，取消来台拍摄《六福客栈》的计划。

以上可视为艾伟德与电影《六福客栈》发生冲突的第一个阶段，包括以下三个事实：其一，20世纪福克斯公司在台拍摄《六福客栈》受阻，阻力主要来自台湾当局的审查以及各界舆论的压力。其二，20世纪福克斯公司在与台湾当局进行“谈判”时，有邀请艾伟德参与。这时的艾伟德即便没有站在制片方的一边，但对制片方也未表示明确的反对意见。事实上，福克斯公司的技术人员初到台湾时，就已经联系了艾伟德，并得到她的帮忙。其三，从后来抱怨剧本修改未经艾伟德同意的情况来看，此一时期的艾伟德对电影《六福客栈》的情节了解很有限，尚未对剧本中关于其情感的部分提出异议。

离开台湾的《六福客栈》剧组，曾设想到香港进行取景。这时艾伟德的态度已经出现变化，但也只是站在台湾当局之前所称的“辱华”立场而已：“归化中华民国之英传教士艾伟德女士今日称，如果描述伊在中国传教生活之影片《六福客栈》之脚本不予更改，拟设法阻止该片开拍。由于中华民国人士极力反对片中拍出缠足镜头，美国福士公司决定不在台湾开拍此片，改移香港拍摄。艾女士接见记者称，伊已将此事委托伊在英国之律师处理。”（《对拍摄缠足镜头 艾伟德女士反对》，《香港工商时报》，1958年2月28日）

然而，《六福客栈》在香港的拍摄计划进展依然不顺利。3月3日，香港《工商日报》刊出了《英格丽·褒曼已取消来港，〈六福客栈〉在英拍外景》的消息，“英格丽·褒曼原定来港，俾便为福士公司拍摄一套以中国籍英国传教士艾伟德女士生平为题材的影片《六福客栈》。此套影片原定在台开拍，但因公司当局坚持要在片上采用某些有辱我国民族尊严的镜头，为舆论反对，该公司乃该在香港拍摄，但今又变卦”。3月6日，德国影星却佐真斯（今译为“尤尔根斯”）抵达香港，才知道剧组已经转赴英拍摄《六福客栈》。（《德籍电影红星却佐真斯昨抵港，转英拍六福客栈》，香港《工商日报》，1958年3月7日）由此可知，3月初《六福客栈》剧组已经转赴英国，20世纪福克斯公司欲在远东地区拍摄的计划最终落空。

《六福客栈》后来在英国威尔士的斯诺登山区拍摄完成，那里的地质地貌与中国山西省比较近似。在斯诺登山区，20世纪福克斯公司建起了艾伟德居住过的环绕着城墙的阳城县城，还搭起她之前开设的那家客栈，并从伦敦、利物浦甚至加拿大的中国洗衣店和饭馆找来华裔孩子扮演中国儿童，他们的父母还有其他华人也一起参加影片的拍摄。拍摄场地的变动、道具布景以及华人的大量聘请，导致20世纪福克斯公司在电影《六福客栈》上的投资最终达到500万美元，在那个时代无疑是名副其实的大片。〔（瑞）英格丽·褒曼、艾伦·伯格著，刘安义、吴忠民译：《我的故事：英格丽·褒曼自述》，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3年〕

以上可视为艾伟德与电影《六福客栈》关系演变的第二个阶段，艾伟德开始公开表达对电影拍摄的反对意见，但反对的理由仍是之前台湾当局提出的“辱华”指控，并没有涉及电影情节伤害到艾伟德个人名誉以及信仰等方面。艾伟德从最初支持《六福客栈》的拍摄，到公开反对，除了可能是受到台湾当局以及社会舆论的影响之外，20世纪福克斯公司对其缺乏应有的尊重也可能是重要的诱因。这里指的是《六福客栈》剧组在台拍摄受阻后离开台湾时发生的一些事，“导演马克·罗伯逊很快做出决定，20世纪福克斯公司拍摄小组在当天夜里就离开了台湾，可是大家都忘了通知艾伟德。作为主演的褒曼甚至都没有来到台湾。10多个台湾人生气地要求艾伟德支付他们的劳务费和服装半成品费用。有一次，她几乎被人从一辆三轮车上拽下来。”〔（瑞）英格丽·褒曼、艾伦·伯格著，刘安义、吴忠民译：《我的故事：英格丽·褒曼自述》，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3年〕可见，20世纪福克斯公司断然离开时，缺乏对艾伟德的尊重，甚至还给她带来了一定的麻烦。

6月19日，《六福客栈》中饰演县长的英国演员罗伯特·多纳特（Robert Donat）去世，好在当时电影的拍摄已经接近尾声。8月14日，艾伟德提出《六福客栈》的拍摄未争取她的意见，剧组未将电影剧本给她过目，而且对用身材高大的褒曼饰演她表示反对。（《美拍〈六福逆旅〉艾伟德再度抗议》，《工商晚报》，1958年8月14日）两日后，20世纪福

克斯公司发言人对艾伟德的指控予以否认，艾伟德再次否认剧本曾经过目。（《〈六福逆旅〉争论，艾伟德再否认剧本曾经过目》，《工商晚报》，1958年8月16日）8月19日，艾伟德已经在考虑筹钱去美国抗议20世纪福克斯公司的不合理做法。（“I wish someone would help me ,says Gladys Aylward”，*The China Mail*, Aug. 19, 1958；另见《艾伟德计划赴美，继续抗议〈六福逆旅〉失实》，《工商晚报》，1958年8月20日）

《六福客栈》拍摄完成后，11月23日首先在艾伟德的家乡英国上映，社会舆论反应强烈：“影片《六福客栈》势将在英国打破票房纪录……英国报纸都不惜篇幅来刊载《六福客栈》的一切，有些更用半版的地位来评论这个片子，许多影评几乎一致称赞这部片子是长久以来的最佳片子。许多影评家甚至于说：假使《六福客栈》得到奥斯卡金像奖，他们也不会感到惊异。”（《〈六福客栈〉震动英伦，预料可能获本届金像奖，在英映期将延长数个月》，香港《工商日报》，1958年12月2日）此后，《六福客栈》陆续在多国公映，如美国是在12月11日，联邦德国是12月19日，瑞典是1959年1月19日，日本是在1959年2月27日，等等。但影片的故事原型艾伟德，却表现出极为强烈的不满，主要抨击电影公司拍摄影片时未争取她的意见，也未将剧本拿给她看，并考虑通过法律的途径维护其个人的权益。

1958年11月26日，即《六福客栈》在英国刚刚上映后的第四天，艾伟德并没有观看这部影片，但对采访她的美国记者表达了强烈的不满，而且不满的重心已不再是之前的“辱华”问题，而是片中的不实情节对其个人名誉乃至信仰方面的伤害：“福克斯公司拍摄的这部由褒曼主演的片子未得她的同意，且未把剧本让她过目，特别是有关爱情的镜头……电影令她觉得很难堪，因为有太多不属实的地方。好莱坞随意地虚构了她和林南上尉的浪漫故事，对于这些爱情场景，艾伟德充满恐惧，她认为其名声被破坏，而这令她长期被困扰折磨。”艾伟德甚至还质疑到褒曼饰演她的资格，因为后者曾经离过两次婚，而作为传教士的她本人却从未结过婚，“褒曼与其丈夫离婚，报端已刊出我的名字，因为她是描摹我的人，从前我从未牵涉过这样的事，世界各地的教会来信数百封指责我以她来描绘我

的一生，我从未感觉过如此的难过。”艾伟德对褒曼的不满，显然是出自基督教信仰的立场。最后，艾伟德还特别强调，对福克斯公司的控诉是“为真理与正义而奋斗，并不是为了金钱”。（《拍摄六片未获她的许可，艾伟德女士控福克斯公司指褒曼为坏女人不能描摹她的一生》，《联合报》，1958年11月27日）

12月1日，艾伟德再次接受记者采访时，电影里不实的情节似已经对其荣誉及信仰（不可离婚）造成伤害，导致其在诉说时甚至哭了几次，“我一直把我的生命奉献给上帝、正义及传扬上帝的教训。现在由一个坏女人来演我的一生经历。那部电影对我的一生有何影响？他们把我弄成个什么样子？”艾伟德对当初与20世纪福克斯公司签订的合同也有异议：“那时我曾签了一个文件，但我诚实地相信那只不过是一项有关开始写剧本的普通协议，而并非最后的认可。有一天我听到他们谈论有关爱情的镜头，我便提出反对，我对此点感到忧虑……我还有什么话可说，但是我是为真理与正义而奋斗，并不是为了金钱，金钱仅是其次的考虑，钱的问题是其他人向我提到的。我想要知道这部影片究竟把我的一生描述成个什么样子，我一生献身于上帝，福士公司在拍摄影片时，让我过目一下剧本，原是他们可做的唯一正常的事。”她也确实因该电影遭到一些信徒的攻击：“接到世界各地教会的来信数百封，无不指摘她以英格丽·褒曼来描绘她的一生……他们如此谴责我，我无法答复他们，我一生从未感觉过如许的难过。”（《多事的〈六福客栈〉》，香港《工商日报》，1958年12月12日）

艾伟德对电影《六福客栈》的抨击令20世纪福克斯公司非常紧张，因为当时电影在英国刚刚公映，而作为故事原型的艾伟德如果继续批评的话，势必对《六福客栈》的推广以及票房产生不利的影响。

于是，福克斯公司迅速对艾伟德的控诉进行了全面的回应。首先是希望艾伟德重新考虑自己的态度，“对于艾伟德女士所发有关《六福客栈》的谈话……这家美国重要制片公司说，他们希望艾伟德女士能重新考虑她在台北发表的谈话。”接着，福克斯公司的工作人员向媒体展示了艾伟德

与他们在台湾签署的法律文件，将其中艾伟德应得的权利公布于众，比如她从中可以拿到剧本版权的50%，即2.5万美元，还有各项连续性的权利等。此外，20世纪福克斯公司还用卫理公会美国西岸会督西姆里奇签名的推荐书证明该影片“从教会的观点”而论，是绝对可推荐的。最后，福克斯方面指出电影中出现的恋爱情节在法律上没有问题，因为艾伟德在之前合约中已经授予制片方使用该书以及改编的权利。（《〈六福客栈〉影片无损艾伟德女士，故事无不道德或性感之处，她可得剧本版税百分之五十》，《民声日报》，1958年12月25日）

作为电影公司进行危机公关的一部分，主演英格丽·褒曼也给艾伟德写了一封信，对1958年1月底《六福客栈》剧组的不辞而别，电影情节的改动，以及此前没有联系她（艾伟德的原话是“当我是个死人”）等情况作了解释。《我的故事：英格丽·褒曼自述》中完整收入了这封信：

亲爱的埃尔华小姐：当我了解到你是个确实存在的人物时，使我感到大出意外。我扮演你，说你的话，表达体会你的情感，而你却不是个幻想人物。可我也没有看见过你，所以扮演你就成为一件困难的事情了。我们没能到台湾去，因而我就不能得到你的帮助，对此我深表遗憾。（你知道最初他们是想在台湾拍摄这部影片的）。但是我希望你知道，虽然在很多场面中你会感到诧异，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做或那样做，但我们一直努力做到忠实于你，以爱慕和尊敬的心情来摄制这部影片的。但是它毕竟是一部影片，为了取得娱乐的效果不得不有一定程度的自由发挥。对于你的工作我是极为敬佩的，我唯一的希望是这部影片能够配得上你本人，致以最衷心的问候。

艾伟德没有回复褒曼的来信。面对冰冷的法律，未受过多少教育且年届高龄、精力有限的艾伟德，最终选择放弃对《六福客栈》的公开声讨。此后的她，对20世纪福克斯公司依然抱有怨恨，但对褒曼的态度却已经发



生了改变。由此，艾伟德与电影《六福客栈》的关系进入第四个阶段。

1959年4月，艾伟德应邀赴美进行旅行演讲。在出发之前，有记者问到她与福克斯的冲突，当时艾伟德这样表示，“还很生气。她说，她不愿再谈它，她气也气到够了；难过的不是钱，而是太没真理……”但是，或因上述褒曼的那封信，艾伟德对她的看法发生了改变，只是觉得有些没有礼貌，“不久前她看了一场《圣女贞德》，还觉得褒曼的演技实在不错。不过她觉得这位明星对她不太礼貌。她说：‘以前有位洋记者来访问我之后，说我讲褒曼是个坏女人，实在是假话。其实当他问我时，我回答他说，因为我不认得她，我无法下评语，只说我心里有平安而她没有。我所不服气的是英格烈·褒曼既然代表我演这个戏，如果她是有礼貌的好人，就应该通知我，认识我，不应该当我是个死人一样。’”（《〈六福客栈〉片中女主人翁艾伟德女士赴美布道》，香港《工商日报》，1959年2月23日）而后，又有记者问到艾伟德去美国，是否是为了要和福克斯公司的影片《六福客栈》打官司，此时的艾伟德已然平静了一点，不想再为此浪费自己的精力，“那件事，让它去吧。我的心里有平安，我不会再为这种鬼事，浪费上帝的时间……我不想再提这个问题。”（《艾伟德赴美传道，不愿提及影片事》，《联合报》，1959年3月26日）

事实上，艾伟德对《六福客栈》中的不实情节（尤指感情方面）的不满，在当时的西方观众中也存在共鸣。比如《六福客栈》公映后，《澳大利亚妇女周刊》（*The Australian women's weekly*）于1959年1月14日发表评论，赞赏褒曼以其特有的女性温柔与诚挚撑起了这部漫长而唠叨的电影，但对电影中的恋爱故事基本持否定态度。《澳大利亚妇女周刊》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基督教信仰在当时西方社会生活还占有较为重要的地位。1961年2月，艾伟德应邀赴澳大利亚旅行布道，《堪培拉时报》（*The Canberra Times*）有介绍到艾伟德对电影《六福客栈》的看法：“电影里所描述的并非她在中国的真实生活，也不是她的自传的真实呈现。”（*Across Siberia on 9d. The Canberra Times, February 7, 1961*）3月15日，《澳大利亚妇女周刊》还发表一篇长文，介绍艾伟德的生平事迹，并再次强调她对电

影《六福客栈》的决绝态度，“从没看过，而且一无所知。我并不觉得与我有什么关系。”

艾伟德对电影《六福客栈》的排斥态度，一直到其生命的终结都没有改变。1970年5月，在英国为艾伟德去世组织的纪念活动中，《小妇人》的作者阿伦·伯吉斯称艾伟德“从未看那部电影，她对褒曼所饰演的角色很困扰、顾虑……事实上，将电影当作事实的各地电影观众，并未给她以安慰”。艾伟德的友人何小姐也曾指出：“人们从英格丽·褒曼主演的《六福客栈》电影中了解到艾伟德的一些故事，但我却清楚她对那部电影从未感到快乐。艾伟德认为电影过于戏剧化，没有足够重视真正掌管她生命的那些要素，比如对上帝绝对的信任，以及从未令上帝蒙羞的事实。”

（Peter Gillman , Gladys Aylward: *The last chapter*, *Radio Times*, May 14, 1970）

但是，《六福客栈》仍不失是一部成功的电影，对主演褒曼而言更是如此。《六福客栈》是褒曼重回好莱坞后主演的第二部电影。电影上映后，此前因其个人婚姻问题而陷入低谷的演艺生涯再次获得了新生。1958年10月22日《澳大利亚妇女周刊》称《六福客栈》是英格丽·褒曼所主演的自《真假公主》之后最新且最为重要的一部电影。

事实上，《六福客栈》在《荧幕之星系列纪录片·褒曼》（*Stars of the Silver Screen TV Series*）中也留下了几笔。影评家诺曼（Neil Norman）在该片中如是评价褒曼与《六福客栈》，“她还拍了《六福客栈》，这部电影再次赢得了美国人的心。她拍了很多乍一看很俗气的电影，但是她给这些电影增添了许多质感，比如说《六福客栈》，如果我事先知道剧情，我压根不会去看，但是因为褒曼，片子就变得很好看。她让片子脱离低级趣味，却并不矫情。她成功扮演了那种来者不拒的好人，令人信服。”影评家的思维有些过于现代，根本不了解《六福客栈》的原型艾伟德的事迹在当时西方是多么的受欢迎，也不理解制片方20世纪福克斯公司在1958年即愿意为该片投资近500万美元的原因。当然，他似乎也不明白20世纪50年代的好莱坞以及美国人为何会为褒曼的出轨那样愤怒。

英国媒体对《六福客栈》的评价也相当不错，《我的故事：英格丽·褒曼自述》中收入了两则评论：一则出自迪利斯·鲍威尔，在《星期日报》上发表，“褒曼小姐，以其率真的神情与自然娴雅的风度，使人领略到她那不可战胜的品德……这是她所演过的最动人最优秀的作品。”另一则刊登在伦敦的《每日简报》上，称赞《六福客栈》“自始至终善尽美。褒曼小姐的表演是她一生中最优秀的艺术天才的体现，是女明星嘉宝达到顶峰以来的又一最完美的表演。”

至于美国方面，《纽约时报》在1958年12月14日的影评中称，“编剧也无法充分地表现她的成就，唯有通过女演员褒曼成熟的美丽、友好的礼貌和动人的魅力，但是她的表现仅仅停留在表面，最大的遗憾是虚构的爱情故事，应该更多和更深地发掘艾伟德对于信仰的委身。（Bosley Crowther: *The Inn of Sixth Happiness* (1958), *The New York Times*, Dec 14, 1958）12月22日，《时代》周刊（*Time Weekly*）综合了各大报纸的评论意见，称“电影《六福客栈》首先有一个很好的故事原型，就其本身而言已具有惊人的感染力，包含了所有吸引人的元素：爱、战争、宗教、暴乱、谋杀、奇观、恐怖、喜剧、音乐、舞蹈、种族混合、官兵和土匪、妻妾、孩子、马、威尔士最美丽的风光、中国的艺术风格，以及一个成功的不屈不挠的女性主义意识。其次电影在述说信仰和精神价值方面，即使这个女人火一样简单的热诚，坚毅的精神品格在电影中毫无疑问地保留了下来，然而太多时候她的虔诚的感染力被消解在荧幕中，而用一种商业性的内容和戏剧性的冲突取而代之”。

《六福客栈》最终荣获第十六届美国电影金球奖最佳影片奖，而褒曼也获得最佳女主角提名。此外，褒曼还被美国国家评论协会评为最佳女主角。而据张英进在《影像中国：当代中国电影的批评重构及跨国想象》一书中的研究，《六福客栈》可称20世纪西方关于中国题材的重要电影之一。

在中国香港，《六福客栈》要到1965年才上映，当时媒体盛赞其是“动乱时代最伟大故事，有史以来最伟大电影”（《六福客栈：动乱时

代最伟大故事，有史以来最伟大电影》，《工商晚报》，1965年6月10日）。在中国台湾，则即便经历删减审查，也最终未能与公众见面。1960年3月22日《参考消息》转载了台湾《新生报》的一条消息《美影片〈六福客栈〉将在台上映》，“台湾《新生报》2月22日报道：辱华影片《六福客栈》可能在台放映。《六福客栈》原则上即将获准在我国放映，该片经我有关单位试映十余次，一般人认为有辱国体的镜头，已予剪去，电检处对该片尚在作最后阶段之审查。该片的广告，已间或在报纸上出现。片中原有的砍头及小脚镜头，已完全删去，艾伟德解开一老妇小脚裹脚布时，被臭气熏得晕过去的镜头亦剪去了，此外，片中唯一的接吻镜头，也仅余下可以令观众意会的画面。全片经删剪后，现在仍可映足二小时。此一叙述传教士艾伟德在中国的故事的影片，全片在苏格兰拍摄，山景颇有中国大陆之情调。”

至于内地，《参考消息》的转载，从标题到文末，完全没有任何评论性的文字，或说明当时中国内地（包括山西）对艾伟德已经极为陌生，即便有个别人还记得她，可能也只认为她是一名普通的传教士而已。

### 3. 艾伟德的心结

如前所述，艾伟德终其一生无法接受这部以自己的真实经历改编的电影《六福客栈》。艾伟德给出的理由是自己从未与男人接过吻，甚至没有与人牵过手，而《六福客栈》中出现的这些不实情节，对其个人情感乃至宗教信仰造成侮辱与伤害。一个人至死都不能原谅的事情，必然是已经形成极为严重的心结。所以，实际的情况可能更为复杂。接下来，本文将从造成艾伟德终身未嫁的原因入手，一层层揭开电影《六福客栈》在她身上造成的那个心结。

如前所述，英国学者Nicholson 的研究曾指出，艾伟德那一代成年女性在英国属于“多余的女人”，虽然结婚是她们与生俱来的权利，但长达四年的一次世界大战夺走她们中许多人的这种权利；而到20世纪30年代后，

这些人想觅到人生伴侣就变得尤为困难。事实上，在来中国之前，艾伟德最初是想支持弟弟到中国传教，换来的却是弟弟的嘲讽，“那是老处女做的事，你怎么不自己去做”。弟弟的嘲讽并非空穴来风，当时艾伟德已经二十八九岁，对她来说，成家可能已经有些不容易。

除时代因素外，基督教信仰在导致艾伟德终身未嫁的过程中也发挥了更为重要的作用。1936年，艾伟德来华已经四年，其朋友或者家人可能一直在为她结婚的事而忧虑。当年7月21日，在参加完一次中国信徒的婚礼后，艾伟德给家人写了一封信，信中明确了自己不再结婚的态度，“我再次声明，永远不结婚，但会和所有的朋友在一起，也会因他们而幸福。”而在晚年自述中，艾伟德称自己终身未嫁，“是出于上帝的选择，我曾向上帝祈祷过，希望有人分担我的工作，但结果没有人来。于是许久之希望有丈夫、自己的孩子的梦想渐渐消退。在我看来，上帝倾向于让我独自走完自己的一生。”而在其家信中，艾伟德也承认，随着收养难童工作的展开，照顾难童已然成为其情感的重要寄托。

但是，艾伟德与天主教修女又不一样，她不是从起初就发愿为上帝保持独身。信仰在艾伟德的生命与生活中占有重要的位置，她一直在等待上帝的启示，而且似乎希望伴侣具有同样的基督信仰，并且来自英国。美国作家伊丽莎白（Elisabeth Elliot）见过艾伟德，并听她谈论起自己的情感与信仰的关系，“作为一位习惯向上帝祈祷的女人，艾伟德祈求上帝从英国为她召唤一个男人，并差遣他到中国，并向她求婚……她说，‘我相信上帝会听我们的祈祷，他肯定也召唤了那个人。’然后，艾伟德小声强调道，‘但是他没有出现。’”（Elisabeth Elliot, *Let Me Be a Woman*, Carol Stream in Illinois: Tyndale House Publishers, 2013）事实上，《圣经》上对基督徒的婚姻有所约束，最为出名的经文出自《哥林多后书》第6章第14节，“你们和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要同负一轭。”这段经文对于今天基督教人士的伴侣选择仍然具有相当的影响力，相信艾伟德也不会例外。

而若想弄清楚信仰与艾伟德因电影《六福客栈》而造成的心结之间的关系，就需要清楚电影对艾伟德个人事迹的改动情况，而其中最核心的问

题是要确定电影女主人公“珍爱”（即艾伟德）与男主人公“林楠”（一个没有基督信仰的人）之间关系的真实性。上述的核心问题还可以一分为二，即林楠的原型是谁，以及是否可能与艾伟德发生过《六福客栈》里那样的故事。解决的路径则是比较分析艾伟德的相关传记（这里主要利用的是出版最早的两种）与电影《六福客栈》里的相关情节。

虽然本书第一部分对艾伟德的相关传记已有所介绍，但重述仍是十分必要的。首先是1950年由莱瑟姆（Latham）完成的这本《艾伟德：一个不可战胜的人》，容量很小，仅48页，是关于艾伟德的第一本小册子。其次是1957年伯吉斯撰写的《小妇人》，篇幅增至256页，包含了大量的细节，是后世为艾伟德做传时最重要的参考书，同时也是电影《六福客栈》剧本所依据的底本。需要再次强调的是，作者伯吉斯是一名畅销书作家，构思故事以打动读者是其极为擅长的。事实上，该书对艾伟德事迹的记述即存在虚构的地方，对此艾伟德本人做过说明，“另一部分记忆不起者，则由作者自己找人求证，或由作者自己的臆断加以补充”，故利用时需要谨慎。

在《艾伟德：一个不可战胜的人》中，提到了一个将军以及艾伟德为中国军队提供日本军队情报的事，并未提及林楠。而在《小妇人》中，提到了林楠，可是并未交代其国别与种族特征，故而可以将他视为普通的中国军官；而在电影《六福客栈》中，林楠成了荷兰、中国混血儿，而且声称自己是半个白人，在白人世界是二等公民，他之所以选择中国为祖国是因为在这里受到尊重，而且他也没有拯救灵魂的困扰。

需要注意的是，在《小妇人》一书中，还以不少笔墨讲到一位姓雷的将军（General Ley），然而在电影《六福客栈》里却不曾出现。艾伟德与这位雷将军见面的次数不多，但两人每次见面的谈话都记载得非常详细，而与林楠的谈话内容却很少记载。《小妇人》第一章就提到了雷将军，而且是来自大病初愈中的艾伟德的回忆，清楚交代了他的身份与国别特征，“他是个天主教神父，欧洲人，但是（艾伟德）从不知道他的真实姓名，只是猜测他是荷兰人”，所以雷将军的正式身份应该是雷神父才对。而在

与艾伟德首次见面时，雷神父就指出他们的一些共同点，如都有基督教信仰，面对共同的敌人——日本人，以及在做共同的事。雷神父告诉艾伟德，面对日本的残酷入侵，唯有放弃基督教常奉行的中立立场与他们进行战斗。谈话中，艾伟德还问到人们称呼他“将军”的原因，神父答复“只是荣誉而已”。而后来艾伟德还交代了雷神父的命运，“后来听说他死了，据说是中国人杀死了他”。

显然，相对于林楠，身为神父的雷将军是更为重要的人物，但在电影《六福客栈》中却没有出现。那么，他的原型又是谁？诸多证据表明，这里的雷神父就是1928年加入中国国籍的比利时人雷鸣远。

我们先来看雷鸣远的履历。据李宽淑的《中国基督教史略》记载，雷鸣远，1877年生于比利时，1901年来华，1928年加入中国籍。自九一八事变以后，雷鸣远一直是站在中国人的立场上极力主张抗日，并身体力行。1933年，率600余人组成救护队在喜峰口抗日前线战地服务半年之久；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雷鸣远一边发表文章呼吁抗战，一边应十二师师长唐淮源之请，担任卫生连连长，组织教友救护队，随军转战于涞源、易县、涞水、高碑店、满城等前线，并参加了娘子关战役，从未遗弃过一名伤员。根据《抗战老人雷鸣远司铎》里的记载，雷鸣远后与中国军队一同退入山西，在武乡县时其手下的游击队曾与日军激战。1938年7月，雷鸣远接受国民政府授予的陆海空军甲等二级勋章；9月8日，在汉口获蒋介石接见，得到授命组织华北战地督导民众服务团，启发战地民众民族意识，督导战地民众协力抗战（发动山西、河北、山东、河南、山西五省的天主教徒抗日），并任团长。该团为军事化编制，在团人员分为将、校、尉三级官制，并造名册报军事委员会。雷鸣远为中将衔，副主任及各大队长均为中国人。（金良璧：《我的宗教生涯》，《开封文史资料》第10辑，1990年）华北战地督导民众服务团的活动区域西自中条山之夏县，经平陆、闻喜、垣曲、阳城、晋城，东至陵川、武安、涉县以及邢台、沙河等地。1939年10月，雷鸣远率团经阳城、晋城、壶关、陵川等地入河北。1940年6月24日，雷鸣远在重庆

去世。國民政府明令予以褒獎，並派遣孔祥熙、何應欽、鹿鍾麟、張繼、王世杰等政府要員出席他的葬禮。

雷鳴遠即是《小婦人》里的雷將軍，且有諸多證據證明他與艾偉德相識並相遇過。其一，雷鳴遠具有天主教信仰，歐洲人種特征，擁有中將銜，且曾組織武裝在山西南部進行抗戰，這些與《小婦人》中記載的“雷將軍”的特征完全吻合。其二，雷鳴遠也確實到過陽城、晉城，時間在1939年年末，而當時艾偉德也還在那裡，她要到1940年3月才離開山西去了陝西。其三，雷鳴遠所建立的華北戰地督導民眾服務團

的主要工作內容，包括救助傷員、宣傳抗日、刺探日軍的情報，等等。艾偉德在抗戰時的活動也基本一致。其四，根據現有資料，1940年以前雷鳴遠所率的華北戰地督導民眾服務團中似再無其他有西方背景的團員。

至此，需要重新梳理、歸納一下《小婦人》以及電影《六福客棧》中的林楠以及雷將軍的一些情況：一、在《小婦人》中，林楠並沒有清晰的國別、種族以及信仰的特征，電影《六福客棧》里的林楠身上則有這些特征，而現實中的天主教神父雷鳴遠也具有同樣的特征。二、《小婦人》中分量較重的雷將軍在電影《六福客棧》中並沒有出現。三、《小婦人》中的雷將軍即雷鳴遠是基本可以確定的，而且和艾偉德有在晉城或者陽城相遇的時空條件以及見面的動機。此外，1940年之前的華北戰地督導民眾服務團，除了雷鳴遠之外，再沒有同樣具有西方背景的團員。

## 國民政府褒揚令

雷鳴遠原籍比國年歲呈准歸化歷在平津等處創辦慈善事業並設立報社久為社會所推重此次抗日軍興組織救護團隊在各地竭力救護收效頗宏為國宣勞始終不懈連聞淪逝悼惜良深應予明令褒揚以彰勞勩此令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七月十八日

圖5.6 國民政府關於雷鳴遠之褒揚令，自《抗戰老人雷鳴遠司鋒》（1947）截圖



那么，林楠的原型究竟是谁？限于文献，暂时仍无法完全确定。笔者大胆推测，《六福客栈》的编剧艾索比尔·伦纳特极有可能将《小妇人》里的中国军官林楠与雷将军两个角色融合在一起，形成一个新的林楠。而雷将军的原型雷鸣远，伦纳特肯定并不了解，但艾伟德必然清楚。如此一来，电影《六福客栈》中的“珍爱”与林楠之间的恋爱，在真实的世界里，似乎就发生在新教传教士艾伟德与天主教神父雷鸣远之间。而且需要指出的，雷鸣远当时已经年过六十岁，是在抗战中为中国而死的。假如编剧确实做了如是的情节改动，那么，无论是对艾伟德还是雷鸣远，都毫无疑问是极大的冒犯。而这或许才是艾伟德终生耿耿于怀、无法接受《六福客栈》的真正原因。

#### 4. 《六福客栈》公映之后的艾伟德

《六福客栈》带给艾伟德的并非只有痛苦，也有“正面”的影响，例如她受到宋美龄接见的时间为1958年1月4日，就在《六福客栈》剧组抵台之前，两者之间应存在一定的关联。随着电影的开拍与上映，艾伟德从20世纪福克斯公司那里拿到影片剧本版权费用的一半，即2.5万美元，（《〈六福客栈〉影片无损艾伟德女士，故事无不道德或性感之处，她可得剧本版税百分之五十》，《民声日报》，1958年12月15日）这笔钱成为艾伟德创办孤儿院最早的经费来源。此外，据《我的故事：英格丽·褒曼的自述》，艾伟德去世以后，褒曼努力使得艾伟德的孤儿院可以按时得到捐款和资助，并为孤儿院拉到最为慷慨的捐助人——美国联合演出俱乐部。《六福客栈》带给艾伟德的最大影响是，受到西方各国尤其是宗教界人士的更多关注，收到众多旅行演讲或布道的邀约。在旅行中，艾伟德不仅向各界人士介绍其个人的生平事迹，还促使人们关注了解东方的中国，从而支持远东的慈幼事业，同时也为自己的孤儿院募集到大量资金。

艾伟德赴西方世界旅行的第一站是美国，而且是与电影《六福客栈》的上映有着直接的联系。1959年2月23日，香港《工商日报》有报道称，



图5.7 艾伟德与自己所创立的“儿童之家”的孩子们合影

《六福客栈》在美上映后，许多观众深受感动，纷纷写信给艾伟德；而美国观众对当时中国极为陌生的事实促使艾伟德做出了访美决定。（《〈六福客栈〉片中女主人翁艾伟德女士赴美布道》，香港《工商日报》，1959年2月23日）4月，在世界展望会（World Vision）的邀请及资助下，艾伟德赴美之旅终于成行。（《小妇人艾伟德赴美国布道，明正返台湾》，《民声日报》，1959年3月26日）艾伟德的这次美国旅行，为期10个月，共筹得3000美元。于是，在台北木栅保仪路购地二千余坪，建平房三栋，每栋十床，门房、厨房、洗衣房各一栋，成立“艾伟德儿童之家”。（刘星辉：《台北之旅》，《笃志传道会50周年纪念刊》，香港笃志传道会伯利恒堂出版，2013年）艾伟德的儿童之家，收容对象以全孤、半孤、贫苦失依儿童为限。经费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全部来自美国教友捐助。〔江亮演：《重修台湾省通志》卷7政治志社会篇（第一、二册），台北：台湾省文献委员会，1992年〕1960年1月，艾伟德回到台湾。一个月后，她再次起程赴加拿大以及美国旅行，又是11个月。其中在美国7个月，讲道300余次，宣传中国工业的进步与发展，并为加拿大、美国人士介绍台湾水灾、难民、孤儿以及寡妇生活的艰苦状况，请求给予慷慨的援助。（《艾伟德

任务圆满 美教会派员东来助其工作》，《华侨日报》，1960年12月2日）此外，据台湾《民声日报》1962年5月28日的报道，5月下旬起艾伟德第三次赴美旅行。

除了去美国、加拿大之外，晚年的艾伟德在澳大利亚、新西兰也进行过较长时间的旅行。据1961年2月7日《堪培拉时报》（*Canberra Times*）的报道，艾伟德仍是在世界展望会的资助下，于1961年3月，赴澳大利亚、新西兰各地进行旅行演讲。澳大利亚首都的报纸《堪培拉时报》提前一个月通知读者艾伟德将在澳大利亚旅行以及布道的消息：“一个曾为英国女仆的传教士，其在中国的英雄事迹，因为英格丽·褒曼主演的《六福客栈》已为世界所瞩目，下月将访问堪培拉。她就是艾伟德小姐，已成为这个时代的传奇人物……艾伟德小姐现为台湾一孤儿院的主办人，将在访问澳大利亚期间发表一系列的演讲。”3月9日，艾伟德在堪培拉进行演讲，当天共举行了两次演讲，中午午餐会有300人到场听其演讲，晚上则有600人听她的演说。第二天《堪培拉时报》的报纸里特别提到艾伟德与《六福客栈》的关系，“通过基于其个人传记拍摄而成的电影《六福客栈》，艾伟德获得了世界性的名声。”（*Record crowd for talk by missionary, The Canberra Times, March 10, 1961*）3月15日，澳大利亚一家女性周刊刊出长文，盛赞艾伟德是“其所处时代里最著名的女传教士，伯吉斯畅销书里的“小妇人”，以及电影《六福客栈》中的女英雄……艾伟德一点不像在电影中饰演她的英格丽·褒曼，但是她看起来更具从惊心动魄的险境中挣脱出来的能力，因为电影中的历险艾伟德曾经多次亲历过”，并提到艾伟德的旅行地点包括堪培拉、悉尼、伍伦贡、阿德莱德、墨尔本、格拉夫顿、布里斯潘、珀斯等城市。文中还特别谈到艾伟德对传记《小妇人》，以及电影《六福客栈》的看法，“书里面的每件事都是真实的。至于那部好莱坞电影，她声音清晰、严肃地称，‘从没看过，而且一无所知。我并不觉得与我有关系。’”（*Ainslie Baker, Troublemakers got a flea in the ear, The Australian Women's Weekly, March 15, 1961*）4月16日，艾伟德抵达悉尼，然后去了新南威尔士州的阿米代尔以及格拉夫顿。4月27日，艾伟德

到了珀斯市，当晚珀斯市主干道交通为之拥堵，超过1000人涌来听她的演讲。（*Missionary's visit James Traffic, Nepean Times, May 4, 1961*）

离开澳大利亚后，艾伟德又去了新西兰。新西兰华文报纸《乔农》（英文名称为*The N. Z. Chinese Growers*）有过详细的报道，称艾伟德是“《小妇人》一书及《六福客栈》电影片所描述的主角，驰名世界的女传教士……‘小妇人’个子虽然小，但是她的精神伟大，感化人的力量大”，并记载艾伟德是在1961年5月6日抵达的新西兰首都惠灵顿。在惠灵顿停留期间，艾伟德去了圣约翰教堂、维多利亚大学等地进行讲演、布道，每次演讲听众人数都达到千余人，此后又去其他地方公开演讲。（《世界著名小妇人——艾伟德女士由台湾来纽布道》，《乔农》，第7卷第67号，1961年5月31日）艾伟德在新西兰旅行期间，还遇到了曾在华服务多年的医学女传教士凯瑟琳·霍尔（*Kathleen Hall, 1897—1981*，中文名为“何明清”）。1923年，霍尔受新西兰圣公会派遣来到中国；1927



图5.8 1963年艾伟德参加英国广播公司的节目，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图书馆剪报

年，在安国圣公会医院任护士长，负责行政和管理方面工作，抗战中多次冒生命危险赴北平为八路军购医药及器械物品，因违反中立原则而被新西兰圣公会开除。由此可知，与艾伟德一样，霍尔也是为中国抗战做出贡献的西方传教士。（Tom Newnham, *Dr. Bethune's Angel: The Life of Kathleen Hall*,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2004）艾伟德在澳大利亚、新西兰的这次旅行，总计持续了近半年的时间。（《小妇人往澳洲》，《民声日报》，1961年2月24日）

1963年3月28日，应英国广播公司之邀，艾伟德飞往伦敦，与她同行的还有1962年收养的孤儿艾启光以及秘书波德小姐。此行最为重要的目的是参加当年6月英国广播公司“这就是你的生活”（This is your life）广播节目的录制。不久，艾伟德得到英国圣公会坎特伯雷大主教的接见。同年7月，又获得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接见，并一同午餐。艾伟德因在台湾从事救济难民、收养孤儿的事迹受到女王的称许。旅英期间，艾伟德除了接受电台采访外，还先后去了88间教堂，3所大学，将其在台湾



图5.9 1963年12月27日，艾伟德自英返台与接机人员合影

救助孤儿的情况及需要告诉英国关心慈幼事业的人们。据友人何女士后来的回忆（*The Angel of Yangcheng*），在英国旅行演讲及布道过程中，艾伟德并未对外要求捐款，但仍有很多人因被她朴素、动人的故事所打动，主动捐钱给她在台湾的慈善事业，共计12 000镑，还成立了以艾伟德名字命名的基金会。除了捐款之外，艾伟德还成功吸引到一名英国的女士——原是邮政局长的史可梅（Kathleen Langton-Smith），帮助她管理台湾抚育孤儿的工作。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1959—1963年的四年间，艾伟德几乎是马不停蹄地在英美各国进行旅行演讲及布道。自1959年4月起，她首次去了美国，行程近9个月；1960年1月回到台湾，仅停留1个月，即赴加拿大、美国旅行，直到当年年底；1961年3月，艾伟德赴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旅行近半年时间；1962年5月她再度去美国；1963年3月则去了英国，行程又达9个月。虽然通过这一次次的旅行，艾伟德访问了许多教堂、学校，见到许多关注难民、孤儿事业的社会各界人士，为其在台湾的慈善事业募集到相当可观的善款。但是，如此密集而冗长的旅行，对于一个已经近60岁的老人的身体而言，显然是吃不消的。据友人何女士回忆（*The Angel of Yangcheng*），艾伟德曾向她提起要退休的事，且已选好退休的地点，就在英国的伯克郡（Berkshire），是栋小木屋，有花有草，但她却没有那样的福分。

1964年，因自己所创立的儿童之家管理不善，用人失察，钱财被人强占，艾伟德不得不赶回到台湾，这年她已经62岁。为了儿童之家的财产被自己最信赖的义女及女婿侵占一事，艾伟德只得诉诸法律，被最亲近的人背叛，令艾伟德很受伤。虽然坏人最终得到惩戒，但钱财损失终究无法弥补。儿童之家孩子们的生活再次成了问题，这令艾伟德极为烦恼，她只得再次以瘦弱之躯，为孩子们有个较为稳定的居所、过上稳定的生活而拼搏。（谢雄玄：《小妇人艾伟德的烦恼》，香港《工商日报》，1964年8月19日）

但是，晚年的艾伟德内心是极为孤寂的。1969年2月17日正值中国的

春节，艾伟德给英国亲友们写了一封信：

亲爱的，真希望你住在附近，我就可以跑过去和你聊一聊，我是那样的孤独，并且遇到很多的问题。我们仍未找到不用走太远即能抵达的房子，我之所以这样写，是因为我的脚近来饱受伤病困扰，只能卧床休息。艾启光（Gordon）和海丰（音）等人去了嘉义县，我觉得这样很好，因为当他不去学校时，我不知如何与他相处，史可梅女士现在负责他。我写这封信的真正目的是希望有机会找到人收养他，假如有喜欢这个年纪的男孩且人品非常好的人，艾启光便能获得一切，去学校读书，得到宠爱以及管教，肯定比我所能给予的（只是一个家）要多得多。我们现在的生活并不正常，而且他更多时候是由保姆照顾，这样下去，我会感到很惭愧。为了他的将来，我愿意让他走，而且我老了，当我70岁时他才10岁，我能看到他从学校毕业的那天么？我非常爱他，很难想象没有他的情况，那超出我的个人承受范围。自他5岁时，我们就在一起，从未分开。但是，亲爱的请帮助我，为我祈祷，并且告诉我你的想法。我知道他需要一个爸爸，这是我所不能给的，只得将其送走。我也不知他将如何得到一个完整的家，但确信他很快就可以安定下来，因为我一直在祈祷以及筹划，原来希望他成为一个中国人并与自己的人民一起工作的梦想已经成为过去。我一直认为有两个孩子比较好，一个可培养成为律师，一个可以做医生，这样的想法听起来很棒。我问了许多想要收养孩子的人，但是他们想要的是7—14岁的男孩，而且他们要求（孩子）尽可能多的懂英文，那样才可以直接去上学。艾启光花了我许多钱……他的学费以及他穿的制服太贵，我为他那样做，是因我爱他、保护他、给他许多的机会。上帝把他交给我照顾，或许只是这短短的七年，但我抱有许多希望，因为我确实相信上帝让我这样

做。但近来我和艾启光相处得不好，我每天都能看到他的叛逆行为。请为我祷告，我感到非常的孤独，毕竟他是我的一切。

在这封信里，艾伟德似乎很多事都不如意，而且极为孤独苦闷，很想找人倾诉。而且她还非常担心进入叛逆期的年仅10岁的义子艾启光。艾伟德意识到自己老了，开始为这个孩子的未来担心，她甚至考虑，为了孩子的健康成长要为他寻找一个完整的家，而将其送走。在诸多不如意的情況下，艾伟德甚至称自己又老又笨，状况很不好。

转眼到了1969年圣诞节，距其离世的日子不过一周时间，艾伟德给友人Ethel Barker写了一封信，这或许是艾伟德一生中所写的最后一封信。在这封信里，艾伟德谈到自己的健康状况，“他们（医生）说我的健康不允许留在台湾，但是现在我不能离开中国，我在中国已经近四十年，不能回到英国退休。”这时的艾伟德已经感到力不从心，也意识到需要有人来接替并帮助她。（*Ethel M. Barker, The small woman, The Australian Women's Weekly*, p.9, 18 February, 1970）

## 5. 去世

1970年1月3日，因流行性感冒引发的肺炎并发症，艾伟德在台北寓所去世，享年67岁。噩耗传出，各方莫不表示叹息。（叶云文：《悼念挚爱中国的艾伟德女士》，香港《工商日报》，1970年1月10日）艾伟德生前念念不忘大陆，但在当时的条件下，只能安葬于台湾。（《小妇人艾伟德墓地：希望能朝向大陆纪念其生前服务》，香港《工商日报》，1970年1月6日）当时许多人愿意捐献土地给艾伟德做墓地，最后由其生前好友——基督书院（Christ's College）院长贾嘉美牧师（James R. Graham III, 1898—1982）提供该校校园内的一块土地作为墓园。该墓园面对淡水河出海口，朝向中国大陆。1970年1月24日下午2时，艾伟德追思礼拜在台北市立殡仪馆景行厅举办。蒋介石题匾“弘道遗爱”（此四字亦刻在



墓碑上)，宋美龄送了十字架花圈，严家淦送了挽幛“博爱遗徽”。约有一千余人参加了艾伟德的追思仪式，会场挤得水泄不通。人们遵艾伟德的遗嘱，下葬时将其头部朝向中国大陆，以示她对那片土地的眷恋。（《小妇人艾伟德遗体昨在台举行安葬礼》，香港《工商日报》，1970年1月25日）

艾伟德的去世，引起台湾、香港媒体的很大关注，相关新闻报道甚



图5.10 蒋介石为艾伟德所书挽联

多，但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却是好莱坞巨星英格丽·褒曼的抵台，以及参与纪念艾伟德活动的报道。褒曼在电影《六福客栈》中扮演了以艾伟德为原型的“珍爱”，而且与艾德伟曾经发生过纠葛。如前所述，艾伟德曾经抨击过褒曼，认为她不适合演绎自己，不过艾伟德后来收回了这种看法，并称是记者的误会，自己对褒曼没有偏见；而褒曼曾经给艾伟德写过一封信，对拍摄《六福客栈》时无机会与艾伟德交流表示过遗憾。但在艾伟德的生前，她们两人并没有见过面。

1月13日，即艾伟德去世后的第10日，英格丽·褒曼到了台湾，本意只是观光和访友，事先并不知道艾伟德过世。（叶云文：《影后英格丽·褒曼访台》，《华侨日报》，1970年1月23日）褒曼对艾伟德的去世很是遗憾，在台期间，其大部分活动与艾伟德有关。

1月14日，褒曼到艾伟德的住处，在那里盘桓了1小时50分钟，“在艾伟德的家中，她仿佛到了一位相交多年的故友家中，她曾拿着一帧艾伟德穿着中国服装的遗照，端详良久……在一个小时五十分钟的逗留中，她一件件地看，抚摸、讨论、探问艾伟德生前的事物，她对艾伟德一生从事抚育孤儿的事，深表敬佩。”（《英格丽·褒曼在台北凭吊小妇人遗物》，《华侨日报》，1970年1月15日）1月16日，褒曼到艾伟德所创立的儿童之家（孤儿院）度过在台湾最愉快的一天，和孤儿们一同唱歌、游戏，一同吃午饭，还欣赏了孩子们为她表演的节目。下午，褒曼还听到艾伟德关于个人经历的演讲录音，那段劝人求真、求善、求美的录音给她以无限的感慨。（《影后英格丽·褒曼推崇蒋夫人伟大 聆听小妇人遗音无限感慨》，《华侨日报》，1970年1月17日）褒曼对艾伟德儿童之家十分关怀，不仅为孤儿院捐了款，还去了百货公司，为儿童之家购买了大批的碗、匙、电锅和许多电器用品，以表示对小妇人的敬意。（叶云文：《影后英格丽·褒曼访台》，《华侨日报》，1970年1月23日）1月21日，美国报纸《星条旗报》（*Stars and Stripes*）也报道了褒曼在台湾怀念艾伟德的活动，称其当时正在日本以及泰国等地旅行，很敬佩自己在电影《六福客栈》中饰演的那位充满活力的英国女传教士艾伟德。

艾伟德辞世的消息也迅速传到世界各地，英国以及澳大利亚等地区为她举行了追思仪式或者其他纪念的活动。

首先是艾伟德的故乡英国。3月1日，英国民众凭吊去世不久的艾伟德，“将近一千名的英国人，今天聚集在伦敦美以美教会的中央会堂，向已逝的艾伟德女士致最后的凭吊。这位后来归化中国的英国传奇女性艾伟德女士，在将她的一生全部献身于中国孤儿福利事业之后，于今年一月初去世。参加这次长达两小时之追悼仪式的人士中，有许多与艾女士并无私交，但他们都知道她的故事，一个感人至深，而且将在中、英的宗教史中流传下去的故事。她的故事成为畅销小说《六福客栈》的主要情节，这部小说后来拍成电影，更使她成为世界知名的人物。仪式在中午开始时，曾播放一段艾伟德女士的录音。她自己在这段录音中，解释她四十年前到



图5.11 1970年3月英格丽·褒曼、伯吉斯等人缅怀艾伟德的报道，载于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图书馆所藏剪报

中国的动机，所有参加者都在敬肃的气氛中聆听着。这些录音是数年前录制的。然后，在合唱团领导下，数百名学童穿着制服，高唱《主是我牧人》，这首歌是中日战争期间，在逃难中，艾女士教授她照顾下的中国孤儿的一首歌。艾伟德是一位没有派别的传教士，她不属于任何教会。因之，今天追悼的仪式是由英国各教会联合举行。”（《千名英国人参加追悼艾伟德女士：毕生致力中国传教福利工作》，《华侨日报》，1970年3月1日）

5月，回到英国后的褒曼，与伯吉斯以及台北艾伟德儿童之家院长史可梅（Kathleen Langton Smith）等一同制作了一档节目“艾伟德的最后时光”，通过利用认识艾伟德的那些人的记录，推出艾伟德最新的故事，以志纪念。其中伯吉斯追溯了自己与艾伟德接触的过程；在1949年广播纪

录片《不可战胜的人》里饰演艾伟德的希尔雅·约翰逊也谈到自己对艾伟德的印象，“她举止非常得体，很机智……她个子虽然很小，但能量很大，精力充沛，有决断力。”褒曼则谈到自己在台湾时参观艾伟德故居的往事，“去了她工作的地方，被介绍给孤儿以及所有艾伟德的朋友，是我一生中最为感动的经历之一。”（Peter Gillman, *Gladys Aylward: The last chapter*, *Radio Times*, p.14, 14 May, 1970）

澳大利亚也有人发表文章纪念艾伟德。1970年2月18日，澳大利亚《妇女周刊》用了整版篇幅刊载了其友人巴克（Ethel M. Barker）的纪念文章，同时附有艾伟德寄给她的信的照片，写于1969年圣诞，或许是艾伟德人生的最后一封信。文中巴克先是介绍了艾伟德的生平，谈到她对电影《六福客栈》的态度，以及与艾伟德认识的过程，最后称永远不会忘记艾伟德人格的魅力。文中还提到艾伟德未竟的计划，即1971年赴澳大利亚、美国旅行。（Ethel M. Barker, *The small woman*, *The Australian Women's Weekly*, p.9, 18 February, 1970）

此后的艾伟德一直为世人所缅怀，其生平事迹不断为人重新书写。迄今为止，相关传记出版已达数十种，其中大部分是在基督教相关的机构出版。



图5.12 英文世界艾伟德相关传记书影



## 余论



1932年，年届30岁的艾伟德，孤身一人，历经艰险，来到中国北部的山西省。在晋东南地区的阳城，艾伟德设立了一家客栈，以讲故事的方式向赶车贩货的骡夫们传讲上帝的福音；后应阳城县长之请，以监督的身份推动当地女人们放足；在个人生活极为不易的情况下，收养抚育大量因灾荒、战争等因素而产生的难童和孤儿。抗日战争爆发后，艾伟德积极救助伤兵、难民，为中国军队搜集日军情报并继续收留难童孤儿。而最为后人所称道的是，她以瘦小孱弱的女性之躯，凭借坚定的信念，将百余孩子一个不落地从敌占区转移到大后方陕西的扶风县。此后，艾伟德继续在陕西、甘肃、四川从事各种社会服务以及传教的工作。

到1949年春为止，艾伟德在中国已经生活了17个年头。而在此期间，她不但没有回过自己的家乡英国，还加入了中国国籍。艾伟德做了许多的事情，但在当时几乎完全不为人知，尤其是不为中国人民所熟知。她出身于英国社会的底层，没有接受过太多教育，来中国前只是名女仆；到了中国以后，成为一名独立的传教士，没有任何教会组织在经济上或者其他方面给予她支持。

艾伟德从一个籍籍无名的女传教士，到成为20世纪最伟大的女传教士、著名的社会慈善人士，甚至被某些人视为近代以来最伟大的女性之一，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演变过程，有着极为特殊的时代背景。

经历二战的欧洲，百废待兴。而就在1949年春，艾伟德回到了英国。这一年BBC制片人伯吉斯正在策划名为“不可战胜的人——战后英雄返乡”（*The undefeated about war heroes return home*）的系列广播纪录片。这一名称极好地说明了战后的英国社会对“英雄”的心理渴望。因着偶然的机，艾伟德的事迹引起了伯吉斯的注意，成为“不可战胜的人”系列广播纪录片中第一个向公众宣传的人物。广播纪录片播出后，迅即受到英国各地媒体的追捧，艾伟德由是迅速成为公众人物。需要指出的是，20世纪50—60年代，基督教信仰在西方尤其是在英美社会中仍具有较为重要的地位。艾伟德当时接到大量的邀请到各地演讲布道，而主要场所就是教堂，即为证明。这一时期，艾伟德在民众心目中是其所在时代最伟大的女传教



士、经历战争的女英雄。

1957年，伯吉斯的《小妇人》出版，迅速成为畅销书。<sup>[1]</sup>第二年，由著名女星英格丽·褒曼主演，根据《小妇人》改编的电影《六福客栈》上映。因为对电影中的情节设计极为不满，艾伟德有生之年从未看过《六福客栈》。事实上，电影的上映带给艾伟德的并非只有伤害。随着电影在各国的公映，除了给艾伟德的儿童之家带来所需的经费以外，还令她获得了在英、美、加、澳、新等地旅行的机会。在一次次旅行演讲中，艾伟德不仅向西方世界宣传自己的生平事迹，还向西方介绍当时中国的情况，尤其是港台地区难民、孤儿们的需要，从而使其作为宗教人士毕生致力于社会慈善事业的“孤儿之母”形象为西方各国人民所熟知。蒋介石后来为艾伟德的题词“弘道遗爱”，大约就是就她在宗教与社会慈善事业两方面的成就而言的。

1970年艾伟德去世，此后她留给世界的形象已经不限于宗教以及社会慈善的领域，甚至被誉为近代以来世界上最为杰出的女性。

1974年，英国学者理查德·加特勒推出一部名为《女英雄列传》（*Piccolo Book of Heroines*）的书，为近代以来各行各业中涌现出的杰出女性撰写了简明扼要的小传，收入的女性包括18世纪帮助过英王查理二世的苏格兰女英雄弗洛拉·麦克唐纳（Flora Macdonald）；开启现代护理事业、创立现代护理教育的英国人南丁格尔（Florence Nightingale，1820—1910）；一战中因掩护盟军逃离而被德国处死的英国护士艾迪斯·卡维尔（Edith Cavell，1865—1915），其事迹多次被拍成电影、戏剧以及电视节目；英国女权运动的代表人物埃米琳·潘克赫斯特（Emmeline Pankhurst，1858—1928）；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极为著名的《安妮日记》的作者安妮·弗兰克（Anne Frank，1919—1945）；以及世界上首位女宇航员苏联人瓦莲京娜·捷列什科娃（Valentina Tershkova，

---

[1] 该书不仅在英国发行，而且也在美国同期发行。至1971年，《小妇人》在美国的一家出版社已重印12次。

1937—)等,艾伟德也是其中的一个。

1975年,正值国际妇女年,联合国要求各成员国切实促进男女间的平等,发挥女性在经济、社会和文化上的作用。于是,为了纪念这一事件,许多国家发行了特别邮票。非洲国家塞舌尔也发行了一组系列邮票,纪念的人物包括英国女皇伊丽莎白一世、现代护理教育的奠基人南丁格尔以及罗斯福夫人等,艾伟德也在其中。<sup>[1]</sup>

艾伟德还逐渐成为学术界重视的对象,曾被学者视为宗教界从事社会服务的杰出代表,与特蕾莎修女并驾齐驱。学者大卫·纳什特别指出艾伟德、特蕾莎的楷模作用,“许多宗教上的信仰与动机,引导世俗行为的变化,涌现出好的作品,像特蕾莎修女和艾伟德那样独特的人所表现出强烈地服务社会的叙事,被时不时地讲给新读者听,她们的经历与模范化的生命,常被重新书写,用于教育孩子。”(David Nash, *Christian Ideals in British Culture: Stories of Belief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Palgrave Macmillan, 2013)

近来,更是有学者特别强调艾伟德作为女性所表现出的领导力方面。

C.A. 布罗代尔在《追寻女性主义神学》(*In Search of a Feminist Theology of Work*, 1988)一书中指出,“有些女性可能并没有被视为女性主义者,但是像艾伟德等人的开拓精神,应该是与基督教的女性主义有关”。而黛安·钱德勒将艾伟德与世界著名公司易贝(Ebay)的总经理梅格·怀特曼(Meg Whitman)以及2004年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马塔伊(Wangari Matthai)等并列,探讨她们所展现的个人热情、能量、创新能力,以及在革除陋俗、塑造和平、社会变革以及商业等突出贡献上所展现的领导力。

最后用伯吉斯在给艾伟德所写的传记后记里的一段话作为本书的结尾,他是这样盛赞艾伟德的:“她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不平凡的女子之

---

[1] [http://www.europeana.eu/portal/record/2021624/atria\\_zoek\\_ext\\_zoek\\_jsp\\_res1\\_prief\\_1889\\_res2\\_localhost\\_8080\\_solr\\_core22.html?start=10&query=%3A\\*&startPage=1&qf=DATA\\_PROVIDER%3A%22Atria%2C+Institute+on+Gender+Equality+and+Women%27s+History%22&qf=TYPE%3AIMAGE&qf=YEAR%3A1975&qt=false&rows=24](http://www.europeana.eu/portal/record/2021624/atria_zoek_ext_zoek_jsp_res1_prief_1889_res2_localhost_8080_solr_core22.html?start=10&query=%3A*&startPage=1&qf=DATA_PROVIDER%3A%22Atria%2C+Institute+on+Gender+Equality+and+Women%27s+History%22&qf=TYPE%3AIMAGE&qf=YEAR%3A1975&qt=false&rows=24), 2015.10.20

一，尽管我们不可能完全走进一个人的内心和心灵深处，但很显然，我们在她的身上能够清晰地看到那种无与伦比的可贵品质。艾伟德内心深处蕴藏着巨大的激情，坚定的信心，为理想死而后已的信念，这些人类的宝贵品质，无论任何逆境和折磨都无法从我们的灵魂中彻底剔除。不过很遗憾，这些纯粹忠贞的优秀品质，也正是我们这个时代所缺乏的。”（张继新、虞佳一、余玲玲编译：《八福客栈》，兰州：甘肃人民美术出版社，2006年）

## 主要参考文献

### 一、艾伟德个人档案

Letters and relics of Gladys Aylward, missionary to China (1936—2000), MS 291571, School of African and Oriental Studies, University of London.

1. Letter from Gladys Aylward expressing excitement at news of the birth of Kitty Whiskin's son, Jul 24, 1936, MS 291571/01/01/01.

2. Letter from Gladys Aylward detailing clothes sent for Bernard Whiskin, 1936, MS 291571/01/01/02.

3. Letter from Gladys Aylward discussing general news and details of a photograph enclosed, Aug 5, 1936, MS 291571/01/01/03.

4. Letter from Gladys Aylward telling of travel arrangements within China, Nov 5, 1936, MS 291571/01/01/04.

5. Letter from Gladys Aylward discussing the War, threat of advancing Japanese and her adopted children, Sep, 1938, MS 291571/01/01/05.

6. Personal letter from Gladys Aylward to Miss Whitby, Jun 21, 1939, MS 291571/01/03/01.

7. Letter from Gladys Aylward (to the Whiskin Children) discussing the war with the Japanese and a Chinese wedding, Sep 9, 1938, MS 291571/01/01/06.

8. Correspondence from Gladys Aylward, to her sister Violet, Feb 17, 1969, MS 291571/01/02.

9. Edmonton Lady Missionary In China, Cutting from the Weekly Herald, Apr 10, 1936, MS 291571/02/02.

10. The Angel of Yangch'eng, Cutting from an unknown source detailing the life of Gladys Aylward as told by one of her adopted Chinese children: Rose Ho, 1970, MS 291571/02/07.

## 二、关于艾伟德的传记资料

### (一) 中文

1. 陈中陵. 孤儿之母: 女传教士艾伟德的生平与形象. 台北教育大学 2008年硕士论文.

2. 董飞飞. 西方大众文化视野中的来华传教士形象. 陶飞亚主编. 宗教与历史2: 中国基督教青年学者论坛. 上海: 上海大学出版社, 2014.

3. 董艳云 (Phyllis Thompson) 著, 范约翰译. 弘道遗爱. 香港: 香港文艺出版社, 1974.

4. 林云编. 震撼世界的六福客栈. 太原: 山西人民出版社, 2014.

5. 张继新, 虞佳一, 余玲玲编译. 八福客栈. 兰州: 甘肃人民美术出版社, 2006.

6. 张石山, 谭曙方. 六福客栈: 小妇人艾伟德传奇. 太原: 山西人民出版社, 2015.

### (二) 外文

1. Allen Burgess, *The Small Woman*. Pan Books, 1957.

2. Christine Hunter, Gladys Aylward. *Gladys Aylward: Little Woman*. Coverdale House Publishers. 1970.

3. R. O. Latham, Gladys Aylward. *One of the Undefeated: The Story of Gladys Aylward*. Edinburgh House Press. 1952.

4. Sam Wellman. *Gladys Aylward: Missionary in China*. Barbour. 1998.

5. Keith Stevens. *Gladys Aylward (1902—1970) with the Multeers of Shanxi and Spying for the Chinese*.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Hongkong Branch*. vol.44, 2004.

### 三、报刊资料

#### (一) 中文报刊

1. 台湾地区：《民声日报》《正气中华报》《联合报》。
2. 香港地区：香港《工商日报》《工商晚报》《华侨日报》。

#### (二) 外文报刊：

1. 英国：*Bucks herald. Gloucestershire Echo . The Newcastle Sun. Radio Times. Surrey Mirror. Time Weekly. Western Daily Press. Western Morning News.*
2. 澳大利亚：*The Australian Women's Weekly. The Cumberland Argus. The Canberra Times. Nepean Times. The North Western Courier.*
3. 香港：*The China Mail.*

### 四、影像及资料

1. *The Inn of the Sixth Happiness*, 21 Century Fox, Inc, 1958.
2. BBC电视节目*Blinded by her faith?*的文字版 [http://www.bbc.co.uk/pressoffice/pressreleases/stories/2004/02\\_february/23/adar\\_drycin.shtml](http://www.bbc.co.uk/pressoffice/pressreleases/stories/2004/02_february/23/adar_drycin.shtml)
3. 电视系列纪录片*Ingrid Bergman, Stars of the Silver Screen*, 3DD Production 2013.

### 五、其他著述

#### (一) 中文著述（包括译著）

1. (英)阿美德著,陈海涛、刘惠琴译.图说烟台.济南:齐鲁书社,2007.
2. (英)莫理循著,张皓译.中国风情.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8.

3. (美) 简·亨特著, 李娟译. 优雅的福音: 20世纪初的在华美国传教士. 北京: 三联书店, 2014.
4. (美) 赛珍珠著, 尚营林等译. 我的中国世界——美国著名女作家赛珍珠自传. 长沙: 湖南文艺出版社, 1991.
5. (瑞) 英格丽·褒曼、艾伦·伯格著, 刘安义、吴忠民译. 我的故事: 英格丽·褒曼自述. 北京: 文化艺术出版社, 1983.
6. (美) 张英进著, 胡静译. 影像中国: 当代中国电影的批评重构及跨国想象. 上海: 上海三联出版社, 2008.
7. 笃志传道会50周年纪念刊. 香港笃志传道会伯利恒堂, 2008.
8. 同治阳城县志. 中国方志丛书. 台北: 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 1976.
9. 阳城县志. 北京: 海潮出版社, 1994.
10. 金良璧. 我的宗教生涯. 开封文史资料(第10辑). 1990.
11. 李宽淑. 中国基督教史略.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8.
12. 梁家麟. 福临中华: 中国近代教会史十讲. 香港: 天道书楼, 1988.
13. 吕晓玲. 近代中国避暑度假旅游研究(1895—1937). 合肥: 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2013.
14. 山西省查禁毒品委员会编辑处编. 山西省禁毒汇编(上册). 太原: 撷华石印馆, 1934.
15. 山西村政处编印. 山西村政汇编. 载近代中国史料丛刊. 台北: 文海出版社.
16. 史法根, 许来明, 董维民编. 民国时期山西省各种组织机构简编. 太原: 山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 1983.
17. 王奇生. 教会大学与中国女子高等教育. 近代中国妇女史研究(总第4期), 1996.
18. 阎锡山颁发. 人民须知. 山西六政考核处, 1919.
19. 杨兴梅. 身体之争: 近代中国反缠足的历程.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2.
20. 耀汉小兄弟会编. 抗战老人雷鸣远司铎. 耀汉小兄弟会印, 1947.

21. 中华续行委员会调查特委会编，蔡咏春、文庸、段琦、杨周怀译. 中国基督教调查资料（1901—1920）.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

22. 张惠民. 从绣花鞋漫谈吴知事解放天足. 阳城文史资料第1辑. 1987.

23. 郑裕孚编，郭允叔文钞. 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2辑.

（二）外文著述：

1. A.W. Johnson. *Created for Commitment*. Carol Stream in Illinois: Tyndale House Publishers, 1989.

2. C. A. Borrowdale. *In Search of a Feminist Theology of work*. Durham University, 1988.

3. Callum G. Brown. *The Death of Christian Britain*.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Taylor & Francis Group, 2009.

4. Cathy Hartley. *A Historical Dictionary of British Women*. Unwin Brothers Limited. The Gresham Press, 2003.

5. David Nash. *Christian Ideals in British Culture: Stories of Belief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Palgrave Macmillan, 2013.

6. Elisabeth Elliot. *Let Me Be a Woman*. Carol Stream in Illinois: Tyndale House Publishers, 2013.

7. E.T. Williams, C. S. Nicholls. *The Dictionary of National Biography 1961—1970*,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1.

8. Frederick Tatford. *David Davies: Missionary Hero*. Scotland: Wester Press, 2000.

9. Jeffrey Cox. *The British Missionary Enterprise since 1700*. New York: Routledge Taylor & Francis Group, 2008.

10. Phyllis Thompson. *D.E. Hoste: A Prince with God*. London: China Inland Mission, 1947.

11. *Records of the General Conference of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of China Held at Shanghai*, 1877.

12. Richard Garrett. *Piccolo Book of heroines*. London: Pan Books, 1974.



13. Sheila Brook. *Where is the Key*. Chipmunk publishing ltd, 2011.
14. Tom Newnham. *Dr. Bethune's Angel: the Life of Kathleen Hall*.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2004.

## 六、照片来源

1. 1957年之前艾伟德的照片部分来自伯吉斯的《小妇人》一书。
2. 艾伟德个人物品照片，书信影像来自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图书馆。
3. 1957年以后的艾伟德照片部分来自台湾“行政院文化建设委员会国家文化资料库”。

## 附录一 艾伟德年谱简编

### 1902年

2月24日

生于英国伦敦北部的埃德蒙顿地区一个普通家庭，其父是个邮差，母亲是家庭主妇。艾伟德是家中长女，还有一弟一妹。

### 1916年

14岁，辍学，故而未能接受足够的教育。艾伟德喜欢舞台表演，并上过一些相关课程，惜最终未能如愿。

### 1918年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英国大量适婚男性在战争中死去。1895—1905年间出生的英国女性，许多后来成为社会上“多余的人”，无法结婚。

### 1920年

开始从事女仆的工作。

## 1928年

在一次聚会中，艾伟德发愿信奉上帝，她有一颗赤诚感恩的心，要为上帝工作，并决心到中国去传道。据其晚年的回忆，最初，艾伟德试图支持弟弟到中国从事传教的工作，得到的却是嘲讽，“那是老处女的工作，你为什么不自己去做？”

## 1929年

英国人戴德生（Hudson Taylor）创办的中华内地会，在西方各国发起“前进运动”（Forward Movement），希望在四年间征召200名新的传教士加入中国，尤其是边疆偏远地区的传教工作。

12月12日

艾伟德向中华内地会传教士甄选委员会提出申请，要求到中国进行传教。当日会议记录有如下记载：“艾伟德女士，现年27岁，在伦敦市埃德蒙顿区住有十年，已由本会接见。艾女士系在有基督信仰的家庭长大，18岁进入社会工作时，由于认识本身的需要而悔改信主，在服务之处有良好之见证，也曾做露天布道及青年聚会工作。由于艾女士本身所表现之能力，所以妇女会建议给予一学期之试验，视其能否适应学习。甄试委员会经特别慎重考虑以后，接纳妇女会推荐。”

当时，中华内地会的传教士培训机构，不仅对候选者进行神学方面的训练，强调个人以及公开祈祷的作用；还要训练候选者对不同性格、秉性人群的适应能力，以及应付突发事件比如战争等环境的能力；此外，还要学习中文以及中国史。整个训练为期三个月，最后进行学科能力的测验。最终录取比例为六分之一。

艾伟德未能通过考试，更为重要的是，考官认为她年纪太大（近30岁），掌握中文存在困难，故而最终拒绝了她的申请。

无法获得传教组织的支持令艾伟德很是失望，但她依然想到中国去。后来，她联系上在中国山西从事传教工作近五十年的苏格兰传教士劳森夫人，得到传教助手的职位。不过，劳森夫人明确告诉艾伟德，到中国的旅费需由她自己负担，而且到中国以后没有薪水。

于是，她开始通过从事社会服务的工作累积了一些护理伤病的经验，然后以女仆及其他兼职工作赚取从英国到中国的旅费。

## 1932年

9月29日（星期四）

父母在埃德蒙顿市政厅为艾伟德举办了一场离别的晚会，邀请亲友们参加。邀请函中称：“上帝拣选了他们的女儿艾伟德，在她出发去中国作传教士之前，邀请您来参加，晚会上提供茶还有音乐。”艾伟德随身只带了两个箱子，一个箱子里放有一本圣经和她的衣物，另一个里面装些简单的食物，一只烧水煮饭的酒精炉；口袋里全部旅费仅有两英镑九便士。

10月15日

艾伟德与亲人告别，从伦敦利物浦街的火车站出发，坐廉价火车，跨过英吉利海峡，经过荷兰、德国、波兰以及苏联的西伯利亚地区，历尽艰辛，再经海路辗转到了日本。

11月5日

艾伟德离开日本的神户港。

11月10日

艾伟德抵达天津。

11月12日

艾伟德与之前已在天津等候的山西信徒一起，乘火车先到北平，继而南下，经平汉线抵达正定，再转正太线到太原。然后，改乘汽车，一天抵达沁州，再一日抵达泽州。在一个名为神召会的教会组织里，艾伟德见到一位七十来岁的英国老太太，是已故英国传教士司米德（Stanley Smith，1861—1931）的遗孀。

司米德牧师出身医生家庭，毕业于剑桥大学三一学院，曾任剑桥大学划艇队队长，与何斯德（D. E. Hoste, 1861—1946）等七人一起加入中华内地会，并于1885年来到中国从事传教的活动。与司米德一同来华的七个人，多毕业于剑桥大学，在英美产生极大的影响，被誉为“剑桥七杰”。司米德来华之初，就是在山西传教，先是在洪洞，后至潞安府（即今山西长治市），1896年左右到了泽州。1902年司米德在泽州创立神召会；1906年，在晋城小东关设立泽州总堂；1913年，神召会发展到高平、陵川、沁水以及阳城。

在泽州，艾伟德得到司米德夫人的盛情款待，并在其建议下，换上中国女性的衣服，这是艾伟德融入中国本地文化的第一步。

11月22日

抵达阳城，这是艾伟德第一次骑骡子旅行，很是难忘。在阳城县城东城墙脚下（今东关村邢后巷）毗邻小后河的一所宅院，艾伟德见到苏格兰女传教士劳森夫人（Jennie Lawson, 1857—1933）。劳森夫人本名詹妮，中文名不详。劳森先生1887年来到中国，詹妮大约也在同期来华。两人结婚后曾育有一子，惜不幸夭折。他们最初在山西的平遥进行传教，1896年转到潞安府的余吾镇（今属长治市屯留县），义和团运动时期返回欧洲，1902年回到潞安府，在那里至少停留到1918年。劳森先生大约在20世纪30年代初过世。劳森夫人转到阳城的时间并不长，只比艾伟德早五六个月。

当年年底或者第二年，劳森夫人与艾伟德将住处进行了彻底的整修，

改为客栈，名为“八福客栈”。这里所谓的“八福”，出自《新约·马太福音》第5章第1—12节里耶稣对其门徒的教导。劳森夫人开设客栈最主要的目的，是希望通过给过往的骡队提供住宿，得到一些经济收益；同时，也希望在骡夫们吃饭休憩时给他们讲些《圣经》故事，以传播上帝的福音。当时客栈里分工是这样的：老杨负责在客栈厨房为旅客提供较为可口的小米粥、面条等食物，并给牲畜预备好草料；劳森夫人负责给客人们讲《圣经》里的故事，作为客人们吃饭时的乐趣，这是她个人摸索出的传扬上帝福音的新方式；艾伟德的责任最大，要到街上把经过的骡队想办法弄进客栈，此外，还要刮掉骡子身上的泥巴。

## 1933年

年底，即在艾伟德来华一年之后，劳森夫人失足从二楼阳台跌下来摔伤。艾伟德尽其所能地精心照顾劳森夫人，还用马车将她送到潞安府的西式医院（名为鸿恩医院）进行治疗。然而，劳森夫人最终仍因伤势过重而过世。老杨操持了劳森夫人的葬礼，并从城里找来一位摄影师，拍下劳森夫人下葬前的情景。就在院子里，住店的骡夫、邻里、皈依基督教的信徒，还有几个孩子，围坐在棺材四周，皆被摄入照片里。这张照片后来被艾伟德寄给了远在英国妈妈，否则可能也不会保存下来。

劳森夫人去世后，英国差会之前定期寄给劳森夫人的薪金中断，这给艾伟德等人造成很大的生存压力，八福客栈的运营也成了问题。艾伟德先是在客栈附近居住了一段时间，后来去给霍伊特医生帮忙，他的妻子将要临产。她感到有些孤单，没有属于自己的地方，也没有什么钱，而且也不懂多少中文，这些都令她有些不快。

生活还得继续，老杨建议艾伟德去见县长。当艾伟德仍在不知所措时，县长却以慰问劳森夫人去世的名义来见她，并提出要她担任该县放足监督的职务。原来，南京国民政府已经下令中国各地必须终止缠足习俗，

而山西省政府推行放足已经许多年，并制定了严厉的处罚措施，但成效仍不显著。于是，山西省政府将监督放足的成绩定为县长政绩考核的重要内容，这极大困扰到阳城县长本人。阳城县设立过放足监督员，之前多是男人，且为本地人，容易受到各种因素的干扰，以至于工作效果大打折扣。为了完成任务，必须要找到合适的放足监督员，于是，县长注意到居住在县城东关的艾伟德。

县长向艾伟德交代了作为放足监督的职责与待遇。职责方面包括：要经常到全县各地进行巡视，向村民们宣示政府的命令，还要检查女人们的脚，禁止小孩们缠足，并对相关数据进行统计。如果有人阻挠工作的推动，可以直接向县长汇报。至于待遇方面，县里给艾伟德提供了一匹骡子和两名警察；巡视期间，每天还会给她提供一斗小米，以及用于买蔬菜的钱。（价值约等于一个便士的四分之一）

当时请艾伟德做放足监督的县长，名叫张书榜。1933年，因禁毒不力，以及被举报在县政府吸毒，被山西省禁毒委员会建议撤职。

艾伟德被越来越多的人尊为有德行的人，她也因此获得了一个中文名字，即“艾伟德”，但人们还是习惯称其为“艾教士”。

作为放足监督，艾伟德走遍了阳城的大小村庄，和当地的人们逐渐熟悉了起来，她的中文说得越来越好，很受人们的欢迎，不少人成了她的朋友，也有人成了基督徒。事实上，艾伟德为阳城女性恢复天足所付出的努力，也留在一些人的记忆里，“民国二十二年（1933）当时曾严令放足，县政府特别成立查足委员会，看见谁裹脚，就强令放足，一般不愿意放足的便穿大鞋，里面衬垫棉花，查足队都是男人，不便动手脱鞋查看，于是当时县长张书榜先生请艾伟德出面协助检查，女人们究竟方便得多，把每个妇女请到房里由艾伟德亲自脱鞋脱袜解开脚布查看，如果确是小脚，她便乘机予以劝说，这样一来，阳城妇女大多都成了天足，艾伟德之功实不可没。”

## 1935年

南京国民政府实施了“全国普救流浪儿童运动方案”，将该年定为“儿童年”，以示重视儿童的福利，可见当时遭遗弃的流浪儿童问题是多么得严重。

或在此前，艾伟德已经开始收养孤儿难童的活动。她收养的第一个孩子是花了九便士买来的女孩，其小名即“九便士”。“九便士”的到来，对一直保持独身的艾伟德而言，是莫大的安慰。而在1935年黄河水灾之后，她已经收容了40个孩子。

本年，英国传教士戴维斯夫妇来到泽州，接替不久去世的司米德夫人掌管当地教会事务。艾伟德前去泽州迎接他们，双方迅速成为很好的朋友。

## 1936年

4月10日

英国《每周先驱报》（*The Weekly Herald*）刊载名为《埃德蒙顿女传教士在中国》（*Edmonton Lady Missionary in China*）的文章，谈到艾伟德当时患了重病，并被送到潞安（长治）教会医院进行治疗。身体稍有恢复，她就返回了晋城传教站。而当时红军已经进入晋南、晋东南地区，国共之间的摩擦，威胁到艾伟德的生命安全，导致其父母以及朋友非常担心。事实上，艾伟德也曾打包行李，随时准备翻过大山进入河南，然后从那里再转到上海。

5月

艾伟德的病似乎并未痊愈，由是有了到山东烟台内地会疗养院的疗养及旅行。作为独立的传教士，艾伟德不隶属于任何传教组织，也没有组织给予她经济上的资助，故而她的这次疗养以及旅行，极有可能是在友



人戴维斯夫妇的帮助下实现的。艾伟德从山西到烟台，整个行程历时两个星期。

7月21日

艾伟德给亲友写了一封信。信中，她对获悉亲友家（属于其母亲的家族）增添新生儿一事非常开心，同时也与亲友们分享自己的日常生活以及情感世界。艾伟德重申自己不再想结婚，但并不讳言自己很孤独，希望英国的亲人们常给她写信，多些交流。此外，她还声称暂时没有回英国的打算。

8月5日

艾伟德又给家人写了一封信，信中附有给他们的一张照片，是艾伟德在晋城时与戴维斯夫妇的小儿子莫雷·戴维斯以及自己的养子、养女的合影，拍摄时间为当年5月。

11月5日

结束疗养回到阳城的艾伟德，再次给家人写信。信中提到这一年她的中文已经变得非常好，足以独立在农村进行传教了。艾伟德称自己在阳城的生活很幸福，不打算回国，反而期望自己的侄女或者外甥女（大约十多岁）以后能到中国与她一起工作；最后，艾伟德还谈到当时自己住处的格局，有她个人的卧室，教堂，还有男女幼童的宿舍等。

本年，艾伟德向中国政府提出变更国籍的申请，后因战争关系，未能完成相关程序，所以并未成功。

## 1937年

7月7日

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开始全面侵华。

8月3日

首次向家人提及中日间发生的战事。

8月底

日本开始进攻山西。

9月

英国杂志《基督再临的见证》（*The Christian Advent Witness*）上刊出一篇题为《艾伟德》（*Gladys Aylward*）的文章，讲到艾伟德在监狱传教的经历。艾伟德对犯人没有丝毫的歧视，在其看来，即便是罪犯，也不应被当成猪来对待，更不应将他们排除于上帝的怜悯、赦免以及恩典之外。根据艾伟德晚年的回忆，在监狱里向犯人们传播福音，是经过县长批准的，并得到他的赞赏。

10月15日

英国杂志《每周先驱报》（*The Weekly Herald*）以《在中国处于危险中的传教士：自八月以来没有艾伟德小姐的消息》为题，报道了父母因消息阻隔对在山西传教的艾伟德安危的忧虑。此外，文中也提到艾伟德临危不惧的意志品格，“纵然生活中面临较之以前更为严重的危险，在信中，她从不讲一句丧气的话。相反，她总是说能够帮助淳朴的村民是令她最为快乐的事……她没有考虑个人的安危，也没有想过要撤离，而是选择坚守自己的岗位，安慰受到惊吓的民众，救助涌到那里的难民。”

11月8日

太原失守。日军继续南下。

## 1938年

2月

日军的铁蹄已经践踏到晋东南地区，战火波及阳城。

2月21日

日军飞机两架由东北盘旋至阳城县城上空，连续向城内东北角和东关城后胡同一带投弹24枚，炸毁房屋数百间，炸死炸伤群众多人。

4月22日

24架日本飞机再次在阳城县城投下了数十枚炸弹，炸毁房屋900余间，死伤群众数百人。

6月16日

3架日机轰炸了董封、临涧、横河等村，投弹30枚，炸毁房屋数百间，群众死伤20余人。

9月

日军第一次从阳城县城撤离后，艾伟德给亲友伯特（Bert）写了一封信。信中艾伟德谈到日本人的连续轰炸，几乎毁掉了她的家。在艰难、危险以及令人焦虑的环境中，艾伟德向英国的亲友控诉日军的暴行，但也明确告诉他们，身处战争环境中的她以及身边的中国人并不悲惨，仍在微笑地面对发生的一切。艾伟德向往和平的生活，但希望英国人了解中国所发生的一切。在战乱中，艾伟德又收养了两个因战争而失去家人的孩子，另外两个十五六岁的养子已经参了军。艾伟德还谈到她对中国军队的观感，新兵多是些没有到过城市的农村少年，他们没有足够的弹药，也缺乏必要的训练。艾伟德还谈到，她以及当地的基督徒并没有因战争而停止宗教活动。最后，艾伟德还谈到，当地政府更加需要教会进行救济难民的活动，

她已经参加过两次县里组织的相关活动。在写这封信的时候，日军再次逼近，在枪炮声中，艾伟德又踏上逃亡的旅程。

9月9日

艾伟德给外甥女凯瑟琳也写了一封信，谈到因为战争，她收养的孩子们已经失学近九个月，以前学过的东西可能全部忘记。艾伟德还特别讲到自己参加的一次婚礼，包括因为战争导致的糟糕路况，以及基督教式婚礼举行的整个过程。面对残酷的战争，艾伟德很坚强，她说：“昨天我们受到些打击，但是今天我们已经完全没有忧伤，我们要准备战斗”；她还希望亲友们多为她本人以及阳城的难民祈祷，因为难民缺少食物、衣服，也没有可以住的地方。

抗战爆发后，艾伟德又收容了至少60多名难童。

10月

经蒋介石亲自授权，由天主教神父雷鸣远创立的华北战地督导民众服务团在武汉成立。这个组织后来主要在晋南、晋东南以及河北南部、河南西北部活动，其主要职责是救助伤员，同时也负责收集日军的情报。艾伟德当时所做的工作与之很相似。

## 1939年

6月21—22日

艾伟德给友人惠特比（Whitby）写信，感谢她的赠书，丰富了自己的阅读范围。同时，艾伟德也提到自己的一些情况。在日军入侵期间，她曾和教友一起到陵川县传教三个月，发现那里的女人、女孩缠足仍很普遍。日军入侵山西以后，大部分外国传教士都选择了逃离，戴维斯夫妇也护送一些老的传教士去了沿海地区，艾伟德却赶到晋城，代理起当地的教务，她认为自己选择留下来，是因为那是上帝的意思。艾伟德还

谈到日军的空袭已经完全毁了她的家，此后她主要住在乡下。虽然常常遭到敌机的轰炸，艾伟德仍视阳城为自己的家乡，并称那就是她爱阳城的原因。在敌人再次撤出阳城时，艾伟德从县长那里拿到一笔钱（100元，合5英镑），用于救治难民中流行的伤寒以及痢疾。艾伟德对战争中遭受颠沛流离、饥寒交迫、受伤染病的人民报以极大的同情，尽自己的力量去帮助救护他们。面对战争甚至死亡，艾伟德从没有考虑过退缩，她曾如此回应家人敦促其回国的劝告：“人生非常的可怜，死亡是那么平常，灾祸和苦难也不算稀奇。不过我不愿去到别处，别希望我离开这里，或者用任何办法要我离开。”

或在本年，艾伟德见到雷鸣远神父，答应他借助自己身为外国传教士的便利条件，为中国军队搜集日军活动的情报。

同样在本年，美国杂志《时代》周刊的记者白修德（Theodore White）到山西收集战争相关新闻资料，并因不通中文等缘故，最终找到艾伟德帮忙。白修德想了解战事的进展以及日本人的暴行等情况，艾伟德将自己所知道的情况全部告诉了他。数月后，相关报道在《时代》周刊上发表。

## 1940年

3月

鉴于孤儿们以及其个人安全受到严重威胁，艾伟德决定带领百余名孤儿逃离阳城。她将孩子们分成若干组，每组30来个人，组长由成年人担任，管理很严。孩子们有男有女，最大者13岁，最小者3岁，有背的，有抱的，还有挑在筐里的。他们中有的穿着烂棉袄、棉裤，有的只穿着一件及膝的破上衣。大些的孩子背着铺盖卷和吃饭用的碗筷。队伍行走得很慢，首尾拉得很长。艾伟德一会儿在前，一会儿在后，随时处理行进中孩子们遇到的问题。经过27天的长途跋涉，风餐露宿，忍饥挨饿，最终将孩子们一个不落地交给位于陕西扶风县隶属于宋美龄名下的孤儿院照顾。艾伟德完成的这一伟大壮举，虽然当时鲜为人知，中外媒体没

有任何报道，但有当时照片以及后来亲历者的回忆可以作证，是确实发生过的真事。

艾伟德离开山西后，白修德寄给她的感谢信到了泽州，并最终落入日本人手中，从而导致自烟台刚刚返回当地的戴维斯被捕。日本人对戴维斯施以各种酷刑，逼其承认是国民党军队的间谍。后来，还逮捕了追随戴维斯的两名中国信徒，并在他面前杀害了其中一个。直到抗战结束，戴维斯一直被日本人关在太原的监狱里。

抵达陕西后的艾伟德，很快病倒。经过西安教会医院医生的治疗，她的身体略微恢复，就开始在扶风等地区的农村进行传教。艾伟德再次向中国政府提出加入中国国籍的请求。

## 1941年

7月15日

中华民国内政部批准了艾伟德的请求，她终于正式成为中国人。在内政部开具的国籍许可证明书中，艾伟德当时的住所是陕西省扶风县福音堂，职业是传教士。

此后的两三年，据艾伟德自述，她到过宝鸡（Boa Chi）、凤翔（Feng Hsien），还到过甘肃清水县（Tsin Tsui）。艾伟德一路向西，进行旅行传道。她进过喇嘛庙，与喇嘛们进行过信仰上的交流；后在霍伊特医生（Hoyte）夫妇的邀请下，还到过兰州。艾伟德的西北之行时间虽然不长，但对于认识中国各地不同的族群，如藏族、回族；不同的信仰，如藏传佛教以及穆斯林信仰，很有帮助。后来，艾伟德再次回到扶风，在当地的麻风病院服侍病人，并再次进入监狱进行传教。

## 1944年

当得知四川成都卫理公会正在招聘一位擅长说中文的传道人时，艾伟

德申请了那个职位。在此后的四年里，她主要在成都活动，负责当地教会的行政事务。

## 1949年

3月

在友人的帮助下，艾伟德在上海登上一艘希腊籍的轮船，终于回到了阔别长达17年的英国，与家人团聚。经过多年战乱，她的父母、弟弟、妹妹都还健在，久别重逢，令她感受到久违的来自家的温暖，对于她身体的康复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回到英国的艾伟德，发现那里也有不少中国人，她同情他们在异乡饱受孤独，于是将他们组织起来，形成以华人为主的教会。除了引领他们的宗教信仰之外，艾伟德尽其所能帮助在英国求学的中国学生，像母亲那样事无巨细地关怀他们；艾伟德还挺身而出，救助陷入困境的英国华人雇员；此外，她还四处奔走，为来自香港以及新加坡的海员在利物浦建立起一所医院。

在英国，艾伟德此前在中国的事迹，起初并不为人所知，因为她为人谦逊，从不主动谈及往事。直到《伦敦时事新闻报》（*London Daily News*）的一位宗教类新闻记者莱德伍德（Hugh Redwood）从艾伟德的母亲那里了解到一些事情以后，艾伟德才被英国媒体所关注。此后，旅行布道成为艾伟德生活中最为频繁的工作之一。

8月11日

艾伟德给某人写了一封信，是笔者迄今所见艾伟德受邀旅行演讲的最早记录，地点在英国伯明翰东北部的汉兹沃思市（Handworth）。

接下来一个名叫阿兰·伯吉斯（Alan Burgess, 1915—1998）的BBC制片人的出现，对艾伟德的人生产生重大影响。当时，伯吉斯正在为英国广播公司制作一档名为《不可战胜的人——战后英雄返乡系列》的广播纪录片。当他

看到关于艾伟德报道后，马上去了艾伟德家，对其进行访问。不久，艾伟德的故事就变成《不可战胜的人——战后英雄返乡系列》中的第一部，长达一小时，剧中的艾伟德由希尔雅·约翰逊（Celia Johnson）饰演。

10月13日

在《纽卡斯尔太阳报》对艾伟德的报道中，已经提到艾伟德要回到中国的想法，“艾伟德的心与中国人在一起，因而拿出了她的中国国籍证明。如今她正在英国拜访她的父母，47岁的艾伟德将尽快返回她深爱的中国。”

本月，艾伟德的相关广播纪录片在英国首次播出，1950年1月又重播了一次；1954年，该纪录片又推出了第二部。

英国广播公司关于艾伟德事迹的广播纪录片的播出，迅即在英国各地产生广泛的影响。其结果就是给艾伟德带来一项新的工作，即在英国各地的教堂、学校乃至市政厅里为公众进行演讲或者布道。

## 1950年

1月9日

澳大利亚的报纸《西北导报》（*The North Western Courier*）刊登出一篇题为《艾伟德的英雄主义》（*The Heroism of Gladys Aylward*）的文章，显然是受到英国广播公司的相关纪录片的影响。文中也较为详细地介绍到艾伟德在中国山西阳城传教的情况，以及在中国遭遇的种种险境（包括抗战中的经历）。

本年，莱瑟姆（R. O. Latham）将艾伟德的口述整理出版，题为《艾伟德：一个不可战胜的人——艾伟德本人所讲的故事》（*Gladys Alward: One of the Undefeated, the Story of Gladys Aylward as Told by her to R. O. Latham*），共48页，至1952年，已经印刷了8次。



随着英国广播公司相关纪录片的两次播出，以及个人传记的问世，艾伟德迅速从一个普通的女传教士，转变为具有相当知名度的宗教与社会演说家。当时的人们对艾伟德的演讲印象很深刻，听众希拉·布鲁克（Sheila Brook）在其著作《秘诀在哪里》（*Where is the Key*）中这样评价艾伟德当时的演讲：“她的故事讲得很简单，但很生动，以至于我如今仍记得其中大部分细节。那些故事非常引人入胜，以至于我觉得自己必须充分去体会。她确实是个女超人，虽然个子很小，但是身体、精神乃至信仰上都非常强大。”

## 1957年

年初，曾为艾伟德制作纪录片的伯吉斯，出版了更为详尽的艾伟德传记——《小妇人》（*The Small Woman*），这部书里对艾伟德的记载并不都是真实的，有些出自作者的想象，但很快在西方世界迅速成为畅销书。该书最初是在英国的伊文思兄弟出版公司（Evans Brothers）出版，同年也在美国的达顿出版社（E. P. Dutton & Co）发行，而且当年就重印了两次。至1971年，《小妇人》一书单单在美国达顿出版社，就印行了12次。

9月2日

艾伟德抵达台湾。面对欢迎的人群，她说过这样一些话，“我这次以一个中国人的身份回到自己的国家，希望大家不要把我当作外国人看待”，“我愿意做一个中国人，她是那么一个令人愿意献身的国家。”抵达当天，媒体竞相报道，艾伟德得到很好的接待。她的两位义子亲自在基隆港迎接，一位是在嘉义空军服役的田庄，另一位是国防医学院毕业的精神科医师朱复礼，两人过去都受到过艾伟德的照顾。

在艾伟德离开英国回到中国之前，美国20世纪福克斯公司的工作人员专程赶到伦敦，和艾伟德以及阿兰·伯吉斯签订了将《小妇人》改编拍

摄电影的合约。20世纪福克斯公司还选定加拿大人马克·罗伯逊（Mark Robson）作为该剧的导演（其代表作品为《大逃亡》）；继而又选定美国人艾索比尔·伦纳特（Isobel Lennart, 1915—1971）作为该剧的编剧，其代表剧本除《六福客栈》外，还有《琵琶怨》（*Love Me or Leave Me*）以及《妙女郎》（*The Funny Girl*）等，经过伦纳特的改编，由《小妇人》改编的电影名称定为《六福客栈》，书中的“阳城”变成“王镇”，而艾伟德则变成“珍爱”，此外，电影中还加入大量珍爱与他人恋爱的情节。

此外，导演马克·罗伯逊亲自到了巴黎，请瑞典女星英格丽·褒曼（Ingrid Bergman, 1915—1982）来饰演电影中“珍爱”一角。在出演《六福客栈》前，褒曼已是两届奥斯卡最佳女主角，主演过《圣女贞德》（后被评为世界十大不朽名片）、《圣玛丽的钟声》（获美国金球奖），但当时褒曼正因个人婚姻问题被好莱坞封杀了多年。褒曼毫不迟疑地接受了导演的邀请，但她形象气质实际上与艾伟德迥然不同。从身高上讲，前者身高1.75米，而后者不过1.50米；容貌气质上，褒曼是极为靓丽的金发美女，有“好莱坞第一夫人”之称；而艾伟德则做过女仆，身材矮小，眼睛是黑色的，并曾自认不像西方女人。

## 1958年

1月4日

或因《六福客栈》即将开拍的影响，艾伟德得到宋美龄的接见。

1月12日

20世纪福克斯公司制片助理麦克纳在台北召开记者招待会，艾伟德亦有出席。麦克纳宣布将拍摄《六福客栈》，同时宣布褒曼3月将来台湾，在电影中饰演珍爱（亦即艾伟德）的角色。

此前，《六福客栈》剧组人员抵达台湾，主动联系到艾伟德，请她帮

忙。助理导演还请艾伟德找些朋友制作演出用的帽子和服装，以备在影片中应用，并答应那些人将来可以成为电影里的临时演员。

《六福客栈》的拍摄进行得很不顺利，因为剧本里出现民国时期政府官员身着清代官服，乘坐轿子，妇女缠足，砍头以及孔庙中有和尚等情节，引起台湾当局以及社会各界的强烈不满。

1月16日

福克斯公司制片助理麦克纳与艾伟德一同宴请了山西籍民意代表及中国国民党台湾竹党部主任委员郭澄等人，听取各方关于《六福客栈》的拍摄意见。

1月18日

台湾当局向20世纪福克斯电影公司提出“必须修正”与“建议修正”的45点意见。

月底

台湾当局与20世纪福克斯公司再次进行磋商，终未达成一致。

2月初

20世纪福克斯公司正式发出公告，取消在台拍摄《六福客栈》的计划。

本月

20世纪福克斯公司计划转到香港继续拍摄《六福客栈》。

2月28日

媒体刊出艾伟德以“剧本涉嫌辱华”为由，要阻止《六福客栈》在港拍摄的消息。

3月初

20世纪福克斯公司放弃在香港拍摄电影的计划，剧组转到了英国的威尔士。

8月14日

艾伟德再度抗议制片方拍摄电影时没有争取她个人的意见，也没有给她看剧本，并反对用身材高大的褒曼饰演自己。

8月19日

媒体报道称，艾伟德甚至考虑筹资去美国抗议拍摄中的电影《六福客栈》的剧情失实。

11月23日

《六福客栈》拍摄完成，首先在英国上映，反应强烈，当时有报道称，“影片《六福客栈》势将在英国打破票房纪录……英国报纸都不惜篇幅来刊载《六福客栈》的一切，有些更用半版的地位来评论这个片子，许多影评几乎一致称赞这部电影是长久以来的最佳影片。许多影评家甚至于说：假使《六福客栈》得到奥斯卡金像奖，他们也不会感到惊异。”

11月26日

艾伟德对采访她的美国记者，表达出强烈的不满。其不满的重心已不再是之前《六福客栈》剧情涉嫌辱华的方面，而是影片中不实情节对其个人名誉乃至信仰造成了伤害，“电影令她觉得很难堪，因为有太多不属实的地方。好莱坞随意地虚构了她和林南上尉的浪漫故事，对于这些爱情场景，艾伟德充满恐惧，她认为其名声被破坏，而这令她长期被困扰与折磨。”

11月27日

媒体报道称，艾伟德强烈质疑离过婚的褒曼饰演自己的资格。

12月12日

有报道显示艾伟德确实因《六福客栈》而遭到一些基督徒的指责，“（艾伟德）接到世界各地教会的来信数百封，无不指摘她以英格丽·褒曼来描绘她的一生……他们如此谴责我，我无法答复他们，我一生从未感觉过如许的难过。”

12月25日

媒体刊出《六福客栈》制片方20世纪福克斯公司对艾伟德控诉的回应，先是公开展示该公司与艾伟德签订的传记改编合约，并明确艾伟德从合约中可以得到的收益金额——2.5万美元。

大约同时，褒曼也给艾伟德写了一封信，对在电影拍摄过程中未能联系艾伟德一事进行了解释。此后的艾伟德对褒曼的态度发生了改变，承认她的演技，但对《六福客栈》则终其一生不予认可。

《六福客栈》不失为一部成功的电影，对于主演褒曼而言，更是如此。《六福客栈》最终荣获第十六届美国电影金球奖最佳影片奖，而褒曼也获得最佳女主角提名，此外，褒曼还获得美国国家评论协会评出的最佳女主角。《六福客栈》甚至被学者称为20世纪西方关于中国题材的重要电影之一。

本年，艾伟德在香港建立希望传道会伯利恒堂，是一个基督教传教机构。

## 1959年

受电影《六福客栈》上映的影响，艾伟德收到来自世界各地的大量演讲邀约。

4月

在世界展望会（World Vision）的邀请与资助下，艾伟德赴美进行旅行布道。这次美国旅行为期10个月，共筹得3000美元。于是，她在台北木栅保仪路购地二千余坪，建平房三栋，每栋十床，门房、厨房、洗衣房各一栋，成立艾伟德孤儿院。艾伟德孤儿院收容对象以全孤、半孤、贫苦失依儿童为限，经费来源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全部来自美国教友捐助。

## 1960年

2月

艾伟德起程赴加拿大及美国地区旅行演讲，又是11个月。其中在美国7个月，讲道300余次，宣传台湾工业的进步与发展，并为加拿大、美国人士介绍台湾水灾、难民、孤儿以及寡妇生活的艰苦状况，请求给予慷慨的援助。

同样在2月，电影《六福客栈》在台湾地区接受删减以及再次审查，但最终仍未能正式公映。

## 1961年

3月

艾伟德开始在澳大利亚、新西兰长达半年的旅行演讲。在澳大利亚她的旅行地点包括堪培拉、悉尼、伍伦贡、阿德莱德、墨尔本、格拉夫顿、布里斯潘、珀斯等城市。

## 1962年

5月下旬

艾伟德再次开始全美旅行演讲，时长不详。

本年，因为财务以及人事问题，艾伟德终止了与世界展望会的合作。木栅的孤儿院院舍被展望会收回，艾伟德另在北投成立“艾伟德儿童之家”。

## 1963年

3月28日

艾伟德将台北“艾伟德儿童之家”的院务委托义女波林的丈夫卢某暂时掌管，带着养子艾启光（两岁）及秘书波德小姐飞往伦敦。

6月

艾伟德等人一起参加了英国广播公司《这是你的生活》（This is your life）电视节目的录制，而且参加了两次。

7月

艾伟德获得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接见并共进午餐。艾伟德因在台湾从事救济难民、收养孤儿的事迹受到女王的称许。

旅英期间，艾伟德除了接受电台采访外，还受到英国圣公会坎特伯雷大主教的接见，此外，先后去了88间教堂、3所大学，将其在台湾救助孤儿的情况及需要告诉了英国关心慈幼事业的人们。在这次旅行中，很多人为艾伟德朴素、动人的故事打动，主动捐钱给她在台湾的慈善事业，共计12000镑，并由此成立了以艾伟德名字命名的基金会。除了捐款之外，艾伟德还成功吸引到一名英国的女士——原是邮政局局长的史可梅（Kathleen Langton-Smith），帮助她管理在台湾抚育孤儿的工作。

12月16日

艾伟德自英国返回香港，在接受采访时，她称其在台北的“艾伟德儿童之家”收养了96名孩子。

本年，艾伟德自感年事已高、精力不济，准备在英国伯克郡觅一间小木屋退休。后因义女波林及其丈夫卢某在其旅英期间侵占“儿童之家”的财物数千英镑，导致“艾伟德儿童之家”面临关闭的威胁，艾伟德只得返回台湾进行处理，于是，退休的事只能泡汤。

## 1964年

1月

回到台北的艾伟德，接手了卢某的职务，并要求她的义女夫妇将侵占的财物缴回，却遭到拒绝。

7月

艾伟德向当地法律机关提出诉讼，处理义女夫妇侵吞“艾伟德儿童之家”的财物问题。

8月12日

当地警方传讯艾伟德，做成笔录。

孤儿院的事对艾伟德打击极大，她只想静一静，很长一段时间回避记者的采访。为了官司的事，她终日在外奔波。后来官司终于打赢，但失去的财产却难以追回。艾伟德只得继续拼搏以维持儿童之家的运行。当时她曾如此讲道：“我之前亲历了许多困难的境遇，我也必将经历目前的这一次，我不会关掉孤儿院。”

## 1965年

6月

《六福客栈》在香港上映，香港媒体盛赞该电影是“动乱时代最伟大



故事，有史以来最伟大电影。”

## 1967年

12月1日

艾伟德组织起希望传道会董事会，包括艾伟德、史可梅等五人，并向香港政府注册。翌年元旦，希望传道会名称改为笃志传道会。

## 1969年

2月17日

艾伟德给英国的亲友写信，谈到自己的诸多不如意，非常孤独苦闷，欲找人倾诉。艾伟德感到自己确实老了，开始对处于叛逆期的义子艾启光（10岁）的未来感到忧虑。为了孩子的健康成长，她甚至考虑要为他寻找一个完整的家，而将他送走。艾伟德甚为苦闷，甚至自称又老又笨。

12月25日

艾伟德给友人巴克（Ethel Barker）写了一封信，这或许是她一生中写的最后一封信。在这封信里，艾伟德谈到自己的健康状况，“他们（医生）说我的健康已不允许留在台湾，但是现在我不能离开中国，我在中国已经近四十年，无法回到英国退休。”这时的艾伟德，已感到力不从心，希望有人来接替或者帮助她的工作。

## 1970年

1月3日

艾伟德因流行性感冒引发的肺炎并发症，在台北寓所去世，享年67

岁。噩耗传出，各方莫不叹息。

1月13日

褒曼抵达台湾旅行，获悉艾伟德去世，从而调整了自己之前的行程安排。此前，两人从未谋面。

1月14日

褒曼到艾伟德的住处进行凭吊。

1月16日

褒曼去“艾伟德儿童之家”陪孩子们唱歌、游戏，一同午饭，为孤儿院捐款，还去百货公司购买了大量的物品，以示对艾伟德的敬意。褒曼后来还为“艾伟德儿童之家”拉到来自美国的定期经济资助。

1月24日

下午二时，艾伟德追思礼拜在台北市立殡仪馆景行厅举办，台湾地区领导人蒋介石题匾“弘道遗爱”（这四个字也刻在艾伟德的墓碑上），宋美龄送了十字架花圈，严家淦则送了挽幛“博爱遗徽”。约有一千余人参加了艾伟德的追思仪式。人们遵照艾伟德的遗嘱，下葬时将其头部朝向中国大陆，以示她对那片土地的眷恋，墓地位于淡水关渡基督书院内。

2月28日

《澳大利亚女性周刊》刊出艾伟德友人巴克（Barker）的纪念文章。文中还提到艾伟德未竟的计划，即1971年赴澳大利亚、美国的旅行。

3月1日

英国伦敦有近一千名民众，聚集在伦敦美以美教会的中央会堂，向已

逝的艾伟德致最后的凭吊。

5月

回到英国的褒曼，与《小妇人》的作者伯吉斯，以及台北“艾伟德儿童之家”院长史可梅（Kathleen Langton Smith）一同制作了一档节目——“艾伟德的最后时光”，通过认识艾伟德的人的记录，推出艾伟德最新的故事，以志纪念。

## 1974年

英国学者理查德·加特勒推出一部名为《女英雄列传》（*Piccolo Book of Heroines*）的书，为近代以来世界各国不同领域中涌现出的杰出女性撰写了简明扼要的小传，收入的女性包括：现代护理事业奠基者英国人南丁格尔（Florence Nightingale, 1820—1910）；英国女权运动的代表人物埃米琳·潘克赫斯特（Emmeline Pankhurst, 1858—1928）；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极为著名的《安妮日记》的作者安妮·弗兰克（Anne Frank, 1919—1945）；以及世界上首位女宇航员苏联人瓦莲京娜·捷列什科娃（Valentina Tershkova, 1937—）等，艾伟德也名列其中。

## 1975年

时值国际妇女年，联合国要求各成员国切实促进男女间的平等，发挥女性在经济、社会和文化上的作用。为了纪念这一事件，许多国家发行了特别邮票。非洲国家塞舌尔发行了一组邮票，其中纪念的人物包括英国女皇伊丽莎白一世、现代护理教育的奠基人南丁格尔以及罗斯福夫人等，艾伟德也在其中。

## 附录二 艾伟德相关文献选编

编选说明：

- 1.这里收入的主要是正文里未能充分展现全貌的一些文献，以及后来补充进来却因时间关系未能利用的文献。
- 2.为更好地概括原文献的内容，部分标题有所改动。

### 香港《华侨日报》对艾伟德返回中国的报道

一位在中国大陆西北边陲的山西省境做传道工作达二十年之久，已归化我国的英国女传教士，也是最近《读者文摘》译著中，英国BBC广播公司著名撰述员亚伦·吉斯所写的名篇《小妇人》动人的故事中的女主角艾伟德小姐，已于昨日由英伦取道香港，乘四川轮重返她所眷恋的祖国。

艾伟德小姐是于是日十一时许在基隆登岸的，她在台的两位义子女，田庄（住在嘉义中心路，在空军服务）及朱复礼小姐（别名福李，现正在台大念书），均到码头来迎接这位久别重逢的义母。

艾小姐是一位短小精干的女人，可以说是名副其实的“小妇人”，她身穿黑色云纱旗袍，戴一副老花眼镜，留着中国式的发髻，说着一口流利的山西腔的中国话，谈吐颇为文雅风趣，风度慈祥可亲，令人敬爱。

### 三十年前到达山西

她说她是二十五岁那年，单身穿过欧洲大陆，取道西伯利亚，前来中国的。今年她已经是两鬓飘霜五十五岁的“老小姐”了。她并且说，当年她来中国，并不是教会派她来传教的，而是她向往中国地大物博，她认为正是她为上帝布道的最好地方，所以她不远万里关山，而只身来到中国大陆，最初她在山西阳城县的小村庄里展开传教工作，当时却逢黄河水灾，

她看到那些罹灾难童，父母散失、无家可归，她恻焉悯之，便收容了四十余位孤雏，为了培养这可爱的难童，她把自己全部的精力都用在抚养这批难童的身上。

### 冒险偷渡抢救幼苗

到抗战的时期，她又继续收容六十余名难童，由于山西日军进攻炮火甚烈，她为孩子安全，曾不顾危险，携带着这批一百余名的难童，冒险渡过封锁线，而把难童送到西安收容，完成上帝给她博爱救人的使命。

她回忆起一段她辛苦育婴的故事时，兴奋地说，她对中国风土人情甚为熟悉，中国人的人情味很浓厚，她酷爱中国，更爱中国人。她虽未结婚，但是膝下已有百来个义子和义女，已使她满足了人生的意义。

### 义子义女杳无音信

她说，在1949年离开中国返回英国后，自此她就和这些相处二十年的义子义女失去了联络。现在她仅知道在台湾有两位义子，还有一位名许立恩的，正在美国传教，继承她的衣钵，而在大陆的许多儿女，即音信全无。她说，这是她最关心、怀念不释的一件痛苦的事情。

### 重投祖国怀抱

她这次重返久别的中国，决心要在祖国住下去，她说：“我是一个好动的人，很难住在一个地方待着不做点事，我也不希望我的孩子来侍候养活我，我要继续地为祖国的同胞服务，直至上帝结束我的余年为止。”

艾小姐现仍干她的传教工作，在她留港时，曾前往港九地区继续传教，并曾在香港喜灵洲疯人院为那些疯人传道而流连不忍离去。她表示会继续为祖国那些苦难的同胞服务。昨午，她在基隆办完手续后，则由她的两位义子陪同乘车南下，前往嘉义暂住在她义子田庄的家里。

1957年9月5日

## 《民声日报》对《六福客栈》及艾伟德权益的报道

此间廿世纪福斯公司说，该公司对于艾伟德女士所发有关《六福客栈》影片的谈话，至感沉痛。《六福客栈》影片是该公司最近根据一本叙述艾伟德在中国的生活情况的书籍而摄制的。这家美国重要制片公司说，他们希望艾伟德女士能“重新考虑”她在台北发表的谈话。

最近由台北传出的新闻报道说，艾伟德曾谓她为了根据她的传记所制的影片，不能使她满意，而感到“空虚”。同一报道并说，她反对那张被指为曲解她的传记的影片，而对于影片中所穿插之原书中所没有的恋爱故事尤表反对。

廿世纪福斯公司远东区监督乌格斯特昨天曾对此间会晤记者，提出有关该影片（该片现已在伦敦放映）的影印的文件。

这些文件中包括艾伟德女士在伦敦当着美国领事和廿世纪福斯公司签订的有关《小妇人》一书摄制影片权的合约。

乌格斯特透露依照合约，艾伟德女士将取得廿世纪福斯公司摄制该剧本版税的百分之五十，乌格斯特指出他的公司为该书的制片权大约已经付出了美金五万元给出版人。

他进一步透露，艾伟德女士已可从出版人处收取该书的版税百分之五十，以及各项连续性的权利，因而补充说，他所能了解的是她为什么要到台北叫穷。

乌格斯特所显示的文件，并且包括公理会美国西岸会督西姆里奇所签名的推荐书一件，证明该影片“从教会的观点”而论，是绝对可推荐的。

乌格斯特并透露纽约的美国尚德会最近曾建议所有的天主教徒都应该去看这部以艾伟德女士在中国的英勇传教生活为基础影片。

关于惹争执的影片中的恋爱穿插，乌格斯特断言“影片之中没有不道德或性的诱惑之处”，他补充说：“首先该片并不完全是事实，因为艾伟德女士已在合约中同意给予廿世纪福斯公司使该书小说化的权利。”

乌格斯特说，在他观看该片预映时，他本人曾流泪六次之多，他对于

艾伟德女士在艰苦的岁月中，在中国大陆上那种虔诚而英勇的传教生活表示敬仰。

1958年12月25日

### 香港《华侨日报》对艾伟德访英得到英女皇召见的报道

已归化中国的英国妇人艾伟德女士，于昨日下午四时四十一分乘英国海外航空公司班机由伦敦抵港，同行有其女秘宝尔达小姐以及不足两岁之认养小童艾启光。

艾伟德女士即电影《六福逆旅》所指“小妇人”，毕生致力于传道及收养孤儿等慈善工作。她现为台湾艾伟德儿童收养院院长。她下机后在机场对记者称，渠系于本年夏天应英国广播公司的邀请，赴伦敦参加该公司电视“这是你的生活”节目，她和秘书以及这最幼的养子艾启光一起上电视两次。

艾伟德女士继称，她于七月间应英女皇伊丽莎白二世陛下召见，在白金汉宫同进午餐，她初时不知女皇何故要召见她，后来才知道英女皇对于东亚难民备极关怀，艾氏将香港及台湾的中国难民、孤儿等一般情形向女皇报告，英女皇垂询之下，非常感动，更寄予无限同情。

她又称，其实英女皇对每一事物都很清楚，此实出意想之外。渠所得印象甚深，更感到非常荣幸。艾氏其后又前赴英国各大城市作传道讲学旅行。现来港预定逗留十天，然后转返台北。

艾氏谓，渠在英国时没有向人募款，但有些人给予若干款项。她述及在台湾有七年历史之艾伟德儿童收养院时，谓现有九十六名儿童。而渠带往英国之艾启光，系最幼的一个。她在香港亦有养子陈耀基，陈君现任百利恒堂牧师，昨亦率领一群儿女在机场欢迎。

1963年12月17日

## 香港《工商日报》关于艾伟德烦恼的报道

在中国从事抚育孤儿慈善工作三十余年的艾伟德女士，这几天因为一件也是家务，也是孤儿院业务的案件，而深深地伤心烦恼着。

这位曾因《小妇人》一书及《六福客栈》一片而驰名国际成为家喻户晓人物的艾伟德传教士，是以抚育孤儿为其终生职志，从中国大陆撤退到台湾后，又在台北市郊的风景区北投，创办了一所“艾伟德儿童之家”。然而，她的烦恼也就出在这个“家”内。当去年她去英国访问时，一位由她亲手抚养长大的养女波林（三十年前艾伟德在山西省阳城县办理孤儿院时收养的孤女），竟和她的丈夫卢某——也即艾伟德的义婿，把这个由她的爱与心血凝合而成的孤儿院院务搞得一塌糊涂，并且侵占了孤儿院内的财产。

本来艾伟德的英国之行，是一次十分愉快的旅行。她原籍英国，早年到中国大陆的山西省传教，因热爱中国而入了中国籍。去年她回到阔别数十年的故乡——伦敦，和那些“艾伟德儿童之家”的主要经费支持者——英国各教区的教友们会了面，同时在留英期间，并曾蒙英女王召见。去年十二月，艾伟德带着一颗对她的抚孤事业更大的希望与信心回到台北时，想不到由她一手创立的“艾伟德儿童之家”，竟被弄得面目全非了。

院中重要和值钱的东西不见了，大部分的公款不见了，孩子们脸上的笑容也不见了！整个院中，笼罩着一层阴郁愁苦的气氛。

原来艾伟德于去年二月赴英伦访问时，曾将院务交给她认为可靠的义女婿卢某和义女波林管理。在她留英这段时间，卢某即利用院长职权，将院内值钱的东西都拿走了。孩子们的生活费用也被占用了。艾伟德回来后，对此甚感气恼，立即免除卢某的院长职务，并要他把侵吞的公款缴还。但是，她的义女和义婿不但不悔改，当时且企图把艾伟德逐出这所由她一手建立起来的孤儿院。他们把侵吞孤儿院的款项数千英镑，用来购买自己的住宅，而“艾伟德儿童之家”的房屋，到现在还是向别人承租来的。艾伟德的希望之一，就是有一栋属于“艾伟德儿童之家”自己的房屋。艾伟德孤儿院的一位



仆人告诉本报记者说：“艾教士对此很感伤心，她一生笃信基督，且以爱与信心对待他人，尤其对她的义子义女，更是爱护备至。而今，她竟要和她昔日所爱的人对簿公堂，这对她毕生所信奉的信念打击太大了。”

这件告到官里去的经过是这样的：今年一月间，艾伟德教士念在过去的情分上，希望卢某把钱交还出来就算了。但是卢某夫妇却对此置之不理，且以一种冷淡态度对待昔日的恩人。艾伟德在失望伤心之余，乃决定于今年七月向警方提出控告。

警方乃于八月十二日传讯艾教士，做成笔录，同时，台北地方法院检察处也已受理这案件，警方就把笔录一并转移地检处办理。

这几天，六十多岁的艾伟德女士，为了孤儿院的事，为了传教的事，为了官司的事，终日在外奔跑，只晚上回家休息数小时。

记者于十四日清晨前往台北市龙江街艾教士的住宅，找到了艾教士。在此之前，曾数度前往，均屋空无人，邻居说，可能为了这件家务事伤心，不愿见新闻记者而躲开了。

伤心的“小妇人”，确实在躲避，但不是为了躲避新闻记者，她是在躲避痛苦、伤感以及一切与这件事有关的事物。

记者站在她家的小小庭院中，她拒绝见面，只由其女佣人传话，她说不愿见记者谈论这件事。记者表示，谈谈她过去的事情也好，因为许多人都在关切她，希望知道每一点有关她的事情，艾教士对过去与现在的都不愿再说起，她只希望清静一下，但是她很感激国人（艾伟德口中的国，经常是中国）对她的关怀。

她是一位慈祥的老人，也是位可怜的老人，即使她的义女义婿如此对待她，她仍曾经说过：“如果他们夫妇此时向我赔个不是，说一声‘妈，我们错了。’我也就算了。可是，他们偏不这样，硬是对我置之不理，对我不客气，这如何不使我伤心呢？”对于这样宽大待人的老妇人，实在不忍再去打扰她的清静。

但是，伤心的“小妇人”，由于过去由她抚育出来的孤儿绝大部分仍是善良的且是在社会上有作为的，因此她并未对她的理想失去信心，她的

爱心并未因此湮灭，她的宗教家伟大的“殉教”精神依然存在。在记者离开其住宅不久，她又戴着一副金边眼镜，摇着满头白发，而仆仆于台北至北投的路上！这条路她是经常来往奔波的，因为她的“艾伟德儿童之家”就是设在北投半山的一幢别墅型房子里。

同日的下午，记者又亲自到这所北投“艾伟德之家”去访问。那时艾伟德教士和这个孤儿院院长史可梅女士都不在，只由史院长的一位秘书谢小姐接待，并引导参观院内设备和孩子们的生活情形。

这是一幢钢筋水泥建筑，依山而筑，楼房顺着山壁层层上去，屋后有个露天的小型游戏场。环境清幽、风景宜人，院里充满着生机勃勃的气息。

史可梅小姐是一位英国的女传教士，由艾伟德教士于去年二月间从英国聘请来台担任院长的。六个月前，当史可梅小姐未来时，亦即由卢某担任院长期间，这里的孩子们都是睡地板，衣服肮脏不堪，脸上毫无笑容。现在他们都睡整洁的上下铺钢架床，全身打扮得整洁可爱，伙食也比以前改善了很多，天真的笑声，经常从楼房内洋溢到四周的山林中。里面有游戏室，也有教堂，一部分在外升小学的孤儿，都拿回一张第一名或第二名成绩优越的奖状，嵌在院内的一个大玻璃框内，为这个“孤儿之家”增加了不少光荣。

目前，这里共有六十余个孤儿，最大的为十二岁，最小的则还在襁褓中。维持他们的生活费用，主要是从英国各教区的教友募集来的，那里有一个“艾伟德基金会”专司其事。

走出这幢漂亮建筑的大门，即可听到前面的山溪的潺潺水声，是那么平和清越和悦耳。归途中，记者回顾了一下被夕阳映照的艾伟德儿童之家，并且想到史可梅小姐的秘书谢小姐所说的一句话：“我们多希望把这幢房子买下来，将来再予扩展，使每一个孩子，都愈感到这是他们自己的房子，这是他们真正的家。”这是艾教士的理想，然而，她目前正在为此而烦恼和伤心。

社会正义的存在和法律的公平，相信会为艾伟德解除目前所遭受的烦恼，艾伟德的理想，相信将会受到各方的鼓励而继续发扬下去。（作者：

记者谢雄玄)

1964年8月19日

## 香港《工商日报》对电影《六福客栈》的介绍与评价

二十世纪福士影片公司拍的《六福客栈》一片，由英格丽·褒曼和却佐真斯，还有两千个中国临时演员合演。在英国拍摄本片的费用是九万镑（按：这里的数字疑有误），假如在荷里活拍摄，费用要多三倍。这是福士影片公司的宣传人米克·福斯特所说的。

《六福客栈》的拍摄地点是在威尔士北部，因为威尔士北部很像华北。于是中国的万里长城便在威尔士建立起来了，这是一座真实的模型。因为这座城建筑得这样逼真，无数喜欢浏览风光的人都到这个拍摄电影外景的地方来一游。

这座长城看来很坚固，有三百五十码长，三十五尺高，用灰泥和钢条做成。有两千个真正和装扮的中国“难民”从城门涌出来。《六福客栈》一片由一个镜头是难民从他们被轰炸的城市中逃命而出。

二十世纪福士影片公司的一位发言人说：“带这些中国临时演员到威尔士来是很费事的事。我们雇用了一些中国人是全家来的，我们要把他们安置在旅店，或者我们可能在十里内找到居住的地方。”

这部影片是根据一个英国女子艾伟德的真实故事改编的。由英格丽·褒曼扮演这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到中国传道的女子。在日本进攻亚洲的时期，她的工作之一是照顾一百个难童逃到中国后方的安全区。

这位发言人说：“在近的人群镜头，我们一定要用真正的中国人。在拍摄那些看不清楚的镜头时，我们可以用当地的威尔士人穿中国衣服代替。”

1965年6月10日

## 香港《工商日报》悼念艾伟德的文章

名扬国际，原籍英国的“小妇人”艾伟德女士，于本月三日因流行性感冒引起肺炎并发症，病逝台北寓所。消息传来，各方莫不表示悼惜。

艾女士热爱中国，希望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的程度，几乎超过一般中国人，的确要令许多现在国外的想入外国籍的中国人感到羞惭。

艾伟德女士享年六十八岁，她于二十六岁时初次抵达山西省阳城县，在那里开始了她的传教生涯。四十年前的山西阳城，妇女多数仍缠小脚。艾女士认为那是封建的余毒，妇女必须放脚，因此不辞辛苦，每日下去劝导妇女自动放脚。

抗战期间，她曾单独率领一百名难童，步行越过黄河日军封锁线，途中每日和孩子们露宿于山头，饱受风霜，几次因为没有足够的粮食，几乎饿死途中，但最后凭她的坚强信心和耐劳吃苦的能力，总算度过了许多难关，平安抵达西安。后来又辗转流徙到重庆。

1949年她回到阔别十七年的伦敦，继续为当地的中国工人、留学生、教友服务。

1957年9月，她才回到台湾继续她抚育孤儿及传教的生涯，近年更仆仆风尘，周游欧美各国，宣扬中国文化，所到之处，一定是穿中国旗袍、布鞋，梳中国式的发型，讲堂上介绍中国的情况给各国人士认识。因此，“小妇人”这个响亮的名字，不仅在广大的中国同胞心目中居有崇高的地位，在国际上也因她从前在中国所创造的许多动人故事，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好莱坞某电影公司，就因为“小妇人”是家喻户晓的国际性人物，想加以利用，数度和“小妇人”洽商，欲利用“小妇人”作号召拍成电影，艾伟德女士看过剧本后，认为与事实不符，断然拒绝，不受大量金钱的引诱，这是何等伟大的精神，何等高尚的情操。

如今“小妇人”艾伟德女士在中国的领土上与世长辞了，留下来的只有带在身边九年前收养的义子艾启光 and 一手开办、惨淡经营的“艾伟德儿童之家”。“艾伟德儿童之家”现在由女传教士史可梅女士担任院长。艾

教士每星期一到院里探望孩子，及为史女士解决多种问题。这所孤儿院的主要经费来源，都是艾女士募捐而来，连孤儿院院址以及艾女士台北的寓所都是租来的，如今艾女士永远安息了，使史可梅女士感到十分彷徨。

“小妇人”艾伟德生前生活十分艰苦，衣食都非常节俭，在香港的一些英国人知道她每日搭公共汽车，曾送她一辆小车子，但她却交给儿童之家使用。她曾从英国得到不少捐款，但却全部用在养育孤儿上，这种“燃烧自己，照亮别人”的精神，确实值得我们永远悼念，而她的爱国热情，更是值得每个国民效法的。

艾伟德生前友好皮以书等人，已为她组织了“艾伟德治丧委员会”，将以隆重的礼仪来办理她的丧葬。艾伟德的遗嘱现在仍存英国伦敦某律师处，将于近日寄来台北。艾伟德的台北寓所，这几天都挤满了前往致哀的人，有学生、商人，少年和中年人、老年人，认识和不认识的，都对这位伟大的中国公民表示悼念。

### 香港《华侨日报》对英国追悼艾伟德活动的报道

将近一千名的英国人，今天聚集在伦敦美以美教会的中央会堂，向已逝世的艾伟德女士致最后的凭吊。这位后来归化中国的英国传奇女性艾伟德女士，在将她的一生全部献身于中国孤儿福利之后，于今年一月初去世。参加这次长达两小时之追悼仪式的人士中，有许多与艾伟德并无私交，但他们都知道她的故事，一个感人至深，而且将在中英的宗教史中流传下去的故事。她的故事成为畅销小说《小妇人》的主要情节，这部小说后来拍成影片，也就是这部小说和电影，更使她成为世界知名的人物。仪式在中午开始时，曾播放一段艾伟德女士的录音。她自己在这段录音中解释她四十年前到中国的动机，所有参加者都在肃静的气氛中聆听着。这些录音是数年前录制的。然后，在合唱团领导之下，数百名学童穿着制服，高唱《主是我牧人》，这首歌是中日战争期间，在逃难中，艾女士教授给她照顾下的中国孤儿的一首歌。艾伟德是一位没有派别的传教士，她不属

于任何教会。因之，今天追悼的仪式是由英国各教会联合举行。同时在伦敦的中国基督教会也预定于三月一日为艾伟德女士举行追思仪式。

1970年1月10日

## 香港《工商晚报》对“艾伟德儿童之家”的报道

每个星期日，是“艾伟德儿童之家”最热闹的时候，由远道来看宝宝的家长挤满一堂，怀里依偎着正在撒娇的宝宝，而他们的大家长，英籍的“史妈妈”则忙碌得到处穿梭。尽管室外是寒风细雨，但壁炉中闪耀着和煦的火光，温暖的笑靥绽开在室内每个人的脸上。

坐落于士林天母三路的艾伟德儿童之家，是栋占地约三百坪的二层楼洋房。宽广的草坪上，许多儿童正在大显身手荡秋千；他们的亲人在地面仰望，看到自己的宝宝在儿童之家的照拂下，长得天真活泼，他们的脸上展开了笑容，内心也感到无限安慰。

艾伟德儿童之家由大陆迁到台湾后，于1961年复设于新北投山腰上，1968年迁到士林现址。现任院长是英籍的兰登·史密斯女士，到台湾十二年了，为入乡随俗，她取了一个中国名字——史可梅，院里的人都管她叫“史妈妈”，她是继已故的创办人艾伟德女士之后，接办了这个儿童之家。头发花白的史可梅女士，将其一生最珍贵的青春岁月，完全奉献给宗教及孤儿们，但看着这些正在追逐嬉戏的宝宝，她自得地说：“我有三十一个可爱的孩子。”

这个儿童之家事实上就是孤儿院，为怕刺伤儿童的自尊心，院方尽量避免用“孤儿”等字眼，为给予儿童周到的照顾及温暖，艾伟德儿童之家采取家庭式的生活，除了身为大家长的史可梅外，还有一位秘书，六位保姆，两位管事，共有十名工作人员，而院童仅有三十一名，平均每一人照顾三个宝宝，因此每个宝宝都能得到妥善的照顾，充分分享到家庭的温暖。

三十一名儿童中，最小的两岁，最大的九岁，十有三名已在临近的士东国小就读，院方每天派人接送，其余的由院方聘请幼稚园教师，每日来教导他们唱歌、绘画等，不但以院为家，也以院为校。许多基督书院的学生，利用假日到院中辅导儿童功课，并带他们四处游山玩水，使得艾伟德儿童之家平添无限欢荣气氛。

“史妈妈”怀中搂着一对三岁大，长得一模一样，身穿一式衣服的双胞胎——“定国”与“治国”。他俩出生后即一直住在院中，“史妈妈”抚摸着他们，无比怜爱地说：“这两个小捣蛋最淘气了，经常弄得大家可笑又可气。”别看他俩小小年纪，可真有同胞爱，每当一个人做错事，经常另一个自告奋勇出面顶罪，连保姆一时也难分真假，查清楚后大家都啼笑皆非。

追溯起艾伟德儿童之家的历史，使人联想到五年前逝世的“小妇人”艾伟德这位伟大的慈善家，于1916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由英国到达中国大陆，她看到许多无家可归的儿童，乃变卖财产，到处奔走募捐，终于在山西创办了“艾伟德育幼院”，收容数百名战时难民及孤儿，她逝世时，蒋公亲题“弘道遗爱”匾额，现仍悬于士林艾伟德儿童之家的正厅里面。

提起艾伟德，史可梅女士无限伤感，回忆起在英国时，她俩共同致力于慈善事业，不料艾伟德遗志未竟即撒手人寰。

目前“艾伟德儿童之家”每年所需经费约新台币五十万元，都是由艾伟德基金会所提供，并不十分充裕。当地美侨见状，乃捐赠洗衣机、烘干机等，使得院中拥有许多新颖的设备。

最近“史妈妈”面临一个难题：儿童之家现址是以两年八千美元的租约租来的，最近租期届满，而房东酝酿着要高幅度涨价。终身为孤儿贡献心力的“史妈妈”，有一个最大的愿望，她衷心盼望“艾伟德儿童之家”拥有自己的房子，她希望社会善心人士捐赠米、奶粉给该院，而后将结余的经费累积下来，为她的孩子们买下一个真正属于他们的家。

1975年11月20日

## 友人巴克在澳大利亚《女性周刊》发表的纪念文章（译文）

1970年，艾伟德去世后仅一个月，澳大利亚《女性周刊》用了整整一版篇幅刊载了其友人巴克的纪念文章，并刊出艾伟德人生中最后一封信的图片。

编者附言：

艾伟德68岁，今年1月逝世于台湾台北市，身边环绕着她深切爱着的孤儿。

1930年，她开始涉足中国，并开始接触中国的孩子。当时她仅带了九便士的现金，二英镑旅行支票，一本《圣经》，就离开了伦敦，决心到中国去传教。

艾伟德和另一传教士劳森夫人一起，将阳城县城内一个即将倾倒的房子整建成八福客栈。在这个客栈中，旅客们听到了艾伟德讲的《圣经》故事，有人即因此而皈依基督教。当1938年日本侵略中国时，艾伟德已经加入中国国籍。

战争中，艾伟德带领100多孤儿艰难行进200英里，跨过黄河抵达西安。后来她回国治疗在日寇手里遭受的伤痛，遇到作家阿兰·伯吉斯（Alan Burgess），就是这个人她为她写了一部传记，名为《小妇人》。

1957年，艾伟德回到台湾。1958年根据她的生平改编并由褒曼主演的电影《六福客栈》上映后，艾伟德感到有些窘迫。后来她用电影和自传版权的收入返回之前在台北创办的孤儿院。在圣公会的赞助下，1961年，艾伟德在澳大利亚做过一系列演讲。

“像一切伟大人物一样，艾伟德拥有孤独”——艾伟德的一位昆士兰读者如是写道。

艾伟德这个名字，自阿兰·伯吉斯的《小妇人》（书中向世人讲述了艾伟德在中国时从日本人手中挽救中国儿童的事迹）出版后，已经家喻户晓。当我听到其去世的消息，我即如同他的，不管是过去的还是现在的孩子们一样，感到永远失去了一个朋友。



两年前，我曾与她共度过一天的时光。我永远不会忘记她人格的魅力。那是1967年11月，我在一次海上环球旅行中，要到日本去。英联邦停战日（11月11日）是个周六，轮船在香港靠了岸。周日，我买了台照相机，准备做些有纪念意义的事。我请了一个向导，把我放在九龙的圣安德鲁教堂。带着之前在九龙采购的东西去教堂，向导以为我疯了。

在拥挤的教堂里，我当然不认识身边坐着的这位身材娇小、穿着中式旗袍、漂亮鞋子的西方女人（虽然她自称是传道者）。仪式结束后，有人邀请一起喝咖啡，“那边那个人就是艾伟德，她这周从台北过来香港访问。你见过她，也愿意见她吧？”“不。艾伟德，你指的是小妇人么？”我惊呆了，“是的，我的意思是我愿意，当然我愿意认识她。”就在那时，我意识到那台新相机的重要性，我在想，我想知道她是否介意我给她拍张照片，并在我的亲友间分享。“嗯，现在我不能讲。你很快就会明白，拍照的话，她将不高兴而且会推脱的。”

我感到有些尴尬，但是能理解她的感受。

然后，一个热心的英国女人走过来，“过来，给我你的相机。我会请乔治来拍。”后来我听说乔治是个著名的摄影师。“把相机交给乔治，你和我一起去见艾伟德。”

当介绍到我们时，头发花白、梳着中式发髻的一张小脸抬了起来。她的眼微笑而有神。我发现她是可以接近的，而且很有趣。

她很温柔，快乐的外表下内心很宁静，具有所有伟大人物特有的孤独感。艾伟德拿出皮夹子，给我看她在台北的孩子们的照片，有些已经成年，已经结婚，并抱着下一代。

艾伟德谈到她在台北创立的那家孤儿院：“他们（医生）说我的健康不允许留在这里，但是现在我不能离开中国，我在中国已经近四十年，不能回到英国退休。”孤儿院里有三十个孩子，艾伟德感到每个孩子都是基督徒，而且认为所有的孤儿都应该得到帮助，“政府帮助我们，我们从不拒绝为任何需要帮助的孩子提供一个家，无论我们多么困难。”“我现在非常需要一、两位女士来帮忙照顾孩子。作为我们祈祷的一个结果，目前

已有一位英国女士愿意投身于这项事业，她正在努力学中文。语言是我们在中国工作的很大障碍，中文很不容易学。在我这里工作的人，必须可以用孩子们的母语同他们讲话。然而，这种工作通常会吸引到许多成年的女性，对她们而言，学习一门新的语言是非常困难的事，更不用说是学习汉语。但是我们得克服困难，继续努力。”

我提出要拍照的问题。“拍照，当然可以。但是我……”艾伟德表现出一种自嘲的神情。英国女人把乔治喊过来。“我已经拍了一张，大家站好排好，我再来拍一张。”

我们聊了很久，然后发现教堂里大部分人都已经离开了。艾伟德注意到我的向导也不见了。“我会带你去购物。”她主动说道。于是，对我而言很奇妙的一段时光开始了。

艾伟德说：“你知道，在香港购物，就像身处于阿拉丁宝库那样的仙境，不要忘记四十大盗。”我们开始看我的采购清单：丝绸、珍珠项链，给我妹妹买的锦缎、遥控玩具汽车，等等。我们都很迷惑，但是要感谢一位阿姨的好意，把我们买的种类、类型都记了下来。我们最后还能冲进一家玩具店，令人惊喜，然后，就看到艾伟德用汉语与几个店员滔滔不绝地讨价还价，而我乐意在旁边做一个旁观者。

为了我要的丝织品，我们去了许多家店。

“看，那边是一家基督徒开的店，我知道远处还有几家。”“为什么你认识那么多人？”“亲爱的，我不认识他们。但是基督徒的店铺多在周日关门，直到教会的事情结束以后才会再开始营业。对他们而言是很大的牺牲。你看，那家店主人刚刚才打开大门。”

艾伟德的“希望传道会”设立在香港九龙，照顾那些不幸的穷人，据她讲已经出现财政亏空。“但是，我想继续办下去，因为人们需要它，是很多人最终可以求助的地方。这也是我这周末来香港的原因，几小时后我就会飞回台湾。一些来自圣安德鲁教堂的香港商人组成董事会，管理教堂事务，所以不用关闭了。”

艾伟德再次看了一下我的购物清单，“我们从福利院手工作坊买

那些玩偶的话，你就可以帮助联合难民救助组织，各种各样的人做出东西通过难民组织进行销售。他们的手工玩偶做得栩栩如生、非常漂亮。”“我会告诉你一些靠近你所乘坐的邮轮的商店，如果你愿意，明天还可以去买。”

我们一起聊天、一起走了好几个小时，以至于我们忘了吃午饭，后来才意识到肚腹空空。“我很想带你去我的公寓，可是我要说的是，我很高兴我马上就要搬离那里了。”艾伟德如此说道。“那里有住着二十来个人，那里总是向所有人敞开着，有时感到有些不堪重负。”艾伟德没时间到我的邮轮，也没时间在那一起吃饭。当我拿出向导给我写的如何打的以及如何付费的纸条时，艾伟德说：“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们可以一起乘电车回去，乘电车并不远。”

乘电车的经历很美妙。（看到艾伟德后）许多中国人的脸上都显出熟悉与尊敬的表情，我们很快就有了座位，整个旅程聊得很开心。

我像是一个旁观者。这个有着谦逊外表的小妇人内心却非常强大，个性坚强、常有喜乐，而且富有智慧。

在我们走向邮轮时，艾伟德忆起她一年前最后一次乘海轮离开英国的情形：“我有件衣服上写有我的名字，只有那是英文。当我回到英国的时候，我做了多次旅行讲演，很快我带回的那些中国手工艺品、展览物品就全都卖完了。然后，当我准备离开时，有人问我是否愿意卖掉我的衣服——我穿的大部分衣物是中式的。”“哦，亲爱的，这种机会是绝不该错过的，我卖掉衣服，带着所有的钱返回台北儿童之家。这难道不是意外之财么？”

在邮轮扶梯口，守护邮轮的香港警察例行公事般看了我们一眼，然后再看了一眼，突然敬起礼来。我知道那是向“小妇人”敬礼，不是向我。

第二天，当我在手工艺品中心买到玩偶时，当我提到推荐我来这里的艾伟德时，女经理抬起了头。“艾伟德，我不知道她来了香港。您肯定清楚，她本人就是一个活生生的奇迹。”

去那里购物当然是很好的建议，我后来把它告诉老家的朋友，也告诉

他们我曾经遇到过艾伟德。

照片洗出来，我给艾伟德写信并寄给她照片，也提到了购物的事。接下来的圣诞节，我们彼此写信问候，她还送给我一张台北儿童之家的孩子们所做的漂亮贺卡。

1969年圣诞节，在繁忙中，我忘记了写信给她。但是她的信件以及贺卡，作为海外邮件有点延迟，新年后到了我的手里。收到它们以后的两天里，每次想到她抽出时间给我写信，就感到非常温暖。我正想给她回信，并且期盼她1971年再次到澳大利亚访问，这时收音机里传来她去世的消息。

1969年12月25日，艾伟德写给巴克的书信内容如下。

亲爱的朋友：

你最近怎么样？我们都很好，因为上帝我们充满喜乐。你很清楚，每件事都很顺利。艾启光现在已经成为大男孩，在上二年级，很聪明，也很淘气，但是非常可爱。上帝的恩典很够用，送给我们远超出我们所想要的，因此我们要赞美他。

我很高兴，让你了解我们的情况。上帝了解我们的一切，每天都有奇妙的作为。我计划1970年3月到美国去，1971年去你的家乡澳大利亚，那时我们可以见面聊一聊。（译自Ethel M. Barker, *The small woman, The Australian Women's weekly*, p.9, 18 February, 1970.）

一直为你祈祷、永远爱你的

艾伟德

## 英格烈·褒曼、阿兰·伯吉斯等人纪念艾伟德的报道（译文）

1949年，BBC制片人阿兰·伯吉斯正在准备制作《不可战胜的人——战后英雄返乡系列》（*The Undefeated about War Heroes Returning Home*）广播纪录片，这时他听到一个简短的报道，一个在中国工作二十年的传教士

刚刚返回英国。

他打电话到那家报社，问到艾伟德家的地址，然后驱车去了埃德蒙顿区，在路边一家排屋前敲了门。“开门的女士身高还不到我的肩膀，”伯吉斯回忆道。“她戴一副角质架的眼镜，身穿高领中国式的旗袍。我说我是英国广播公司的，她看起来很吃惊。我告诉她我在做的节目，”她说：“我并没做什么令你们感兴趣的事。”但是她还是让我进去喝了杯茶。

就是在喝茶的这段时间，艾伟德讲述了她历时一月，带领百余孤儿跨越华北山西的大山逃离日本人魔爪的艰辛旅程。阿兰·伯吉斯将这一故事变成时长一小时的广播纪录片，首次播出是在1949年10月。剧中艾伟德由希尔雅·约翰逊（Celia Johnson）饰演。约翰逊由是得以见过艾伟德数次。“她举止非常得体，很机智。”希尔雅·约翰逊回忆道：“她个子虽然很小，但能力巨大、精力充沛、有决断力。”

1954年，该纪录片出现第二部，然后伯吉斯创作了关于艾伟德的传记小说《小妇人》。1958年好莱坞进行了改编，拍摄成电影《六福客栈》，剧中女主人公原型即艾伟德，由英格丽·褒曼饰演。

伯吉斯解释说：“艾伟德从未看那部电影，她对褒曼所饰演的角色很困扰、顾虑。”“事实上，将电影当作事实的各地电影观众，并未给她以安慰。”英格丽·褒曼本人很为艾伟德的人格所打动。“我确信她们两个都具有同样强烈的精神品质。”伯吉斯说。

褒曼从未见过艾伟德。1969年12月，她在香港拍电影，并且决定去台湾，艾伟德在那里管理一所孤儿院。“但是当我到那的时候，”褒曼说：“她刚刚过世一个星期。”接替艾伟德负责孤儿院的史可梅带着褒曼四处看了看，“她带我去了艾伟德工作的地方，将我介绍给孤儿以及所有她的朋友。这是我一生中最为感动的经历之一。”

1970年1月3日，艾伟德在台北死于流感，享年68岁。现在伯吉斯已经完成一档节目，讲述艾伟德最后的时光。“我们目前在利用认识艾伟德的那些人的记录，推出艾伟德最新的故事。”他说：“我们也将以询问那些到过中国且了解艾伟德或其他传教士工作情况的传教士来结束这档节目。

(译自：Peter Gillman, *Gladys Aylward: The last chapter*, *Radio Times*, p.14, 14 May, 1970.)

## 阳城的天使（译文）

艾伟德一生为贫穷以及有需要的人服务。本文是关于她的故事，是由她救助过的许多孩子中的一个讲述的。

在退休前，艾伟德习惯告诉愿意听她讲话的每个人，她退休后想住伯克郡某处遍布玫瑰花的小木屋里。这个梦想两年前几乎成真，但又是何其的短暂。她深爱的中国一次次地召唤她，即便她已年近七旬。她收拾起可怜的小箱子，出发去了更需要她的地方——中国。她肯定清楚，当她告别伯克郡的小木屋时，可能再也见不到英国，但她没有丝毫的犹豫。

全世界的人们都是从英格丽·褒曼主演的《六福客栈》里了解艾伟德的故事，但我知道她从未从那部电影里得到过快乐。

她认为那部电影过于戏剧化，没有足够重视真正掌管她生命的那些要素，比如她对上帝绝对的信任，以及从未使上帝蒙羞等事实。

我在台湾遇到她，那样的瘦小、脆弱，以至于我很难相信她曾经拯救过上百名孤儿。她带着那些孩子，年纪从幼儿到十二岁，翻过高山丘陵，经历恶劣的天气，把他们带到平安地带。我忆起许多年前她对我讲话的那一日，“罗斯，如果没有上帝的指示，我永远不会那样做。亲爱的，你明白的，我走近上帝，问他要做什么，我知道他会指示我。”

我不是基督徒，这位传奇女性令我感到亲近的一件事，是她从未强迫我皈依基督教。她的信仰是很私人的，但当我请她谈一谈信仰时，她简单而温馨地谈到那位她还是女孩时在伦敦一夜之间寻觅到的上帝。

这是一则很著名的故事，艾伟德，一直梦寐以求要登台演出的伦敦女仆，20世纪20年代在一次盛会中被拉上台演出，她太过害羞以至于未能做到。许多年后，她说：“进入那个厅时，我就感觉有事情要发生在我身上。我发现自己在倾听并开始意识到已经被呼唤去做上帝的工作。”

当她读到中国成千上万人无家可归、饥饿难熬的时候，开始攒钱，她要去那里做她能够做的事。她不了解中国，没有钱，也没有相关训练，除了惊人的信念（信仰）之外，她一无所有。

26岁时，艾伟德攒到足够的钱，买了一张去中国的票。碰巧的是，她遇到一个老妇人劳森夫人，将要返回中国继续做传教的工作，这两个女人，一老一少，一同出发去了中国。

在阳城，他们建起一座旅馆，她们称作“六福客栈”。这家店主要是为骡夫开设的，两个女人还会给骡夫们讲中国龙与虎的故事，接着是一些《圣经》故事。

艾伟德的客栈成为旅客的最爱，直到抗日战争的到来。

有一次，艾伟德在去一个遥远的小村子时，路经一个岔道口，她知道那里有日军活动，但是不知道怎样走，以及日本人发现她的话会做些什么。于是她停了下来，问上帝该走哪一条路。她之前从未听过上帝的声音，她也从未声称看到过什么异象。她是一个实际的女人，但是她知道上帝什么时候对她讲话。“他告诉我翻过那座山就会找到和河道平行的一条更好的路。我走了一会儿，看到我下面本来要走的那条路，有一群日本兵。假如我走那条路，他们就会抓住我，因为那边无处藏身。”艾伟德后来那样说。当敌人要占领艾伟德收养上百孤儿的那个村子时，她不知该如何去做。她之前听过一些日军残暴的故事，终于明白，无论如何，必须要带着她的孩子们离开，去安全的地方。

“我随意打开《圣经》，”艾伟德说：“当我陷入困境或不知所措时，我总是在《圣经》中寻求帮助，上帝的话从没令我失望。”

艾伟德带着她的孤儿们开始了以后成为传奇的征程。他们经过厚厚的积雪，常常饥饿，什么都不想，只考虑孩子们的安全。她的脚伤痕累累，而且裂开，她的身体非常瘦弱，因为只能找到很少的食物，她总是先给孩子们吃，有剩余的时候自己再吃。

“我从不害怕，”艾伟德说，“一点不夸大，仅仅陈述事实。我知道我们所选择的路上每一寸都是上帝为我们选的，我知道我们一定能平安抵

达西安。”

整个旅程下来，她没有抛下一个孩子。

最终，她退休到伯克郡的木屋居住，但还一直同台湾的朋友保持联系。蒋介石，中国国民党的领导人，还有他的妻子常写信给她。来自其他朋友的令人烦心的信件也不少。台湾有许多孤儿，生活艰辛，许多死去了。

在英国，艾伟德出现在电视节目“这是你的生活”上，许多人被她的朴素、动人的故事打动，捐出钱来帮助她在台湾的孤儿慈善事业。她总计收到12000镑捐款。这些钱被送到台湾，但是艾伟德获悉每一分钱都被盗用了。偷钱的人虽然被捕，但对艾伟德来说是无济于事的。钱还是没了。

她毫不迟疑，要继续为孤儿们奔波工作。她说：“基督徒从不退缩。我之前亲历了许多困难的境遇，我也必将经历目前的这一次，我不会关掉孤儿院。”

孤儿院里一片混乱，没有床，没有床上用品，没有食物。但是艾伟德着手工作，先是恢复简单的秩序。

我认为我们没有人了解艾伟德当时所处的形势是多么得令人绝望。我们只是发现，当我们知道她过着怎样的生活时已经太晚，她死了。（译自：*The Angel of Yangch'eng*, by Rose Ho as told to Borghild Larssen，作于艾伟德去世之后，所刊杂志名称不详，相关剪报藏于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图书馆）

## 艾伟德秘书为其作为中国军队间谍的指控进行的辩护

威尔士人、传教士艾伟德的私人秘书，已经站出来抨击电视台的制片人丑化已故的女士名誉的行为。

曾经做过艾伟德七年半私人秘书的梅尔·摩尔根·格蕾说，艾伟德绝不会在中日战争中将其朋友的生命置于危险的境地而不顾。

“当我看到电视档案节目中称20世纪30年代中日战争中艾伟德为中国



军队获取情报的报道感到非常吃惊。”居住在圣戴维斯76岁的摩尔根·格蕾如是说。

“他们为何要在一个可怜的女人去世后那么久才拾起这个问题来聊，人们都想知道。”

艾伟德带领数十个孤儿逃离敌人占领区的义举在电影《六福客栈》中得到永存。

1970年去世的艾伟德，因着英格丽·褒曼的饰演，被世人尊为基督教界的女英雄。

但是，在威尔士斯旺西当地一家制片公司最近的一档电视节目中，却描绘出另一幅景象，一个为中国军队提供情报的女人，随着流血战争的演进，将自己的同事陷于受审、遭受酷刑乃至死亡的境地。

该节目采访到莫雷·戴维斯，是曾在中国服务而在艾伟德逃到安全区后遭到日本人逮捕的威尔士传教士戴维·戴维斯的儿子。

然而，当制片人声称艾伟德冒险出走是“被信仰蒙蔽了眼睛”时，摩尔根·格蕾却说她不是间谍，只是在为上帝服务问题上不妥协而已。

她说：“艾伟德在中国的第二年就加入了中国国籍。”

“当她（1963年）返回中国进行了多场旅行演讲，并在BBC节目‘这是你的生活’上出现之后，很明显，艾伟德在个性上也成了中国人。”

“虽然中国的敌人（日本）已经毁掉并野蛮地对待那么多艾伟德所爱的中国人，但是我确信她不是间谍。”

“不管怎样，在艾伟德的意识里，她是中国人，人们不该任意揣测什么该不该发生。战争就是战争，会导致很多奇异的事情发生——但是如果没有任何证据，就不该有人被判有罪或者遭受谴责。”

格蕾补充道：“我能理解莫雷·戴维斯对其父母悲惨遭遇的痛苦心情，但是他的父亲是上帝的工人，不会披露或者抱怨个人的遭遇。”

“我十分确信目前的争议并非莫雷的父母所期待发生的事情，也确信他们本就明白发生的这一切。”

莫雷·戴维斯告诉节目制片人他希望讲出故事（艾伟德的壮举）里其

父亲的那一面，但是他特别强调，尽管父亲戴维·戴维斯遭到被捕及酷刑折磨，却从没有对朋友（艾伟德）表示过不满。

节目制片人托马斯补充道：“如今电视上仍在播放电影《六福客栈》，我们只是想发掘事情的另外一面。我相信艾伟德告诉过中国人日本军队的行踪。”

“即便有些人不能被说服，但是看一个节目能引起一些争议或者讨论就是好的。”

### 梅尔·格蕾如何争取的捐赠

50年前，梅尔·格蕾遇到正在加地夫（威尔士海港）的浸会教堂演讲的艾伟德。没有她的帮助，艾伟德不会得到数以千计英镑的捐助。她走近那位伟大的传教士，对她说：“我想你需要帮助”，自此梅尔担任艾伟德私人秘书七年之久。“上帝告诉我艾伟德需要秘书的帮助”，梅尔·格蕾如是说。“三周后，她带着一堆盒子抵达加地夫车站，并把它们交给我负责。”这些盒子里有艾伟德未能回复的来信以及推脱不掉的赠品。“她本来想丢掉，因为太多根本拿不了，但是我可以，于是她出发去了苏格兰。然后，我们的关系开始了。”

梅尔补充道，听艾伟德演讲是种不可思议的体验。“她可以轻松使教堂坐满人，然后滔滔不绝讲上三小时，却给人感觉就像半个小时一样，因为她是那样的充满活力。”（<http://www.walesonline.co.uk/news/wales-news/ex-secretary-defends-aylward-against-spy-2444126>）

2004年3月8日

## 后 记

人文科学研究向来注重积累，在掌握大量文献的基础上，才可能取得较为出色的成果。在博士阶段，本人的研究领域是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曾涉及大量与传教士相关的中外文献。2012年，到山西大学工作以后，考虑之前的学术积累，本人将山西近代基督教史作为个人的主要领域。但很快发现，相关研究的开展面临了许多的问题，比如基督宗教（包括天主教与新教）在近代山西流布很广，但山西地方志中关于基督教的记载较之临近的河北、山东、陕西、河南等省少之又少。档案馆相关的收藏多少是一个方面，开放程度却乏善可陈。于是本人只得暂时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方面是尽量在一些基督教或者天主教信仰覆盖的村庄做些调查访谈，寻找感觉；另一方面，则是利用各种资源，收集山西基督教相关的外文文献。然而，如何着手进行研究却仍是问题。

2014年，行龙教授牵头研究沁水流域，吸引到山西大学多学院、多学科学者的参与。在行老师的直接指导下，本人确定以20世纪30年代在山西省阳城县传教的英国女传教士艾伟德为个人的研究选题。正是借助这个选题，本人才真正进入山西基督教史的研究领域。故而，要特别感谢行龙教授关心与帮助。

而在收集史料过程中，感谢山西大学校研基金的支持，以及挚友李丹婕在本人查阅北大图书馆所藏艾伟德英文传记时所提供的帮助，感谢山西大学教师国外培养计划的资助，使本人有机会赴德国汉堡大学亚非学院访学，从而有更为便利的条件收集研究所需的文献。而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图书馆所藏之艾伟德个人档案的获得，则要特别感谢在伦敦大学就读的占蓓蓓博士以及余琼博士。至于识读艾伟德的英文手稿方面，则要特别感谢与本人在同一办公室的山西大学博士后、美国友人倪志宏（Matt）。

此外，本人还要感谢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的胡英泽教授与《六福客栈：小妇人艾伟德传奇》的作者张石山先生惠赐新著；也要感谢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的其他同事在本人研究过程中所给予的支持与鼓励。最后，还要感谢从未谋面的台湾友人陈中陵先生，感谢他惠赐自己的硕士论文。

由于本人学识浅陋，理论功底一般，加之时间仓促，文献无法穷尽，以至于目前所呈现这部小传不足之处必多，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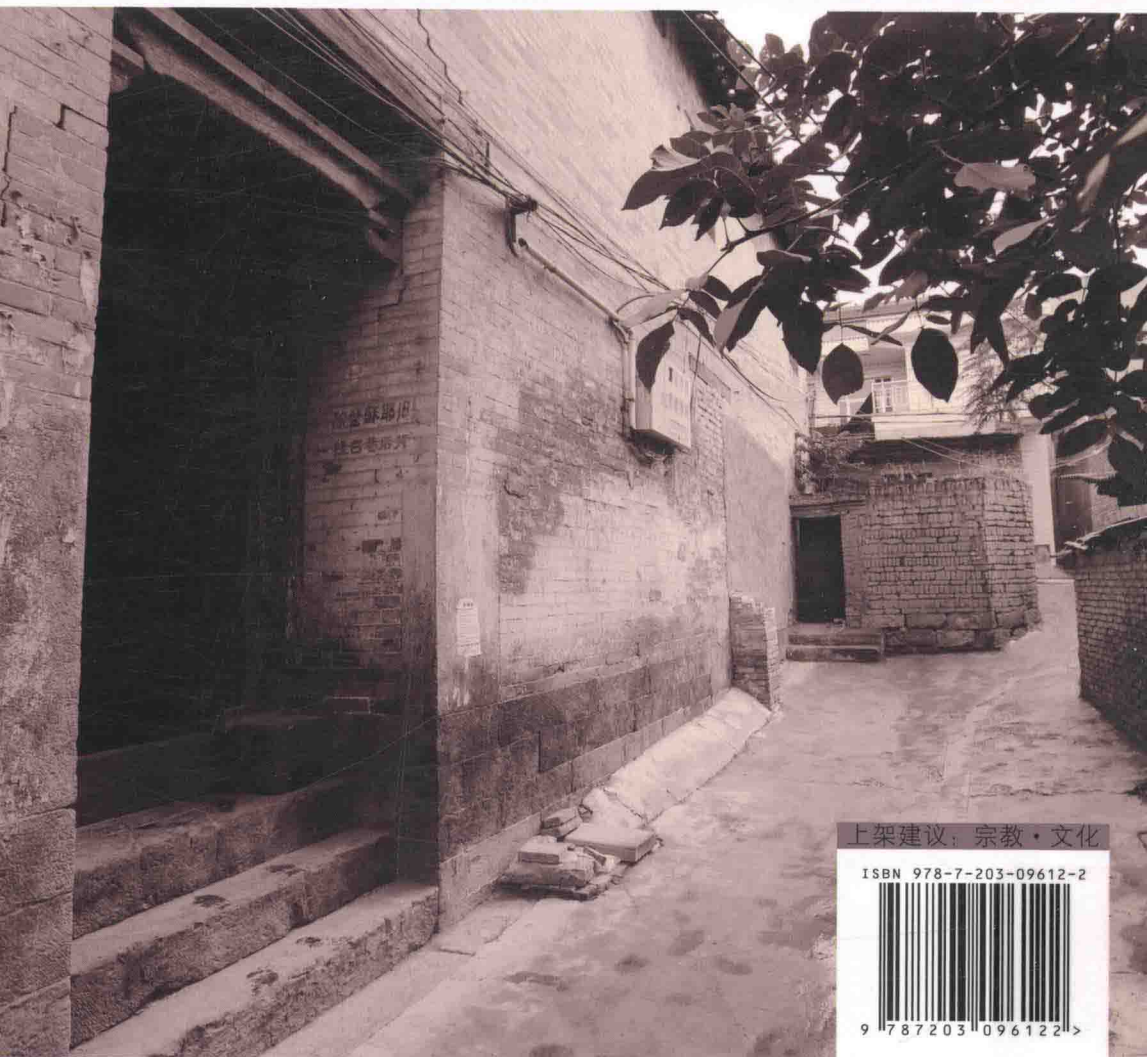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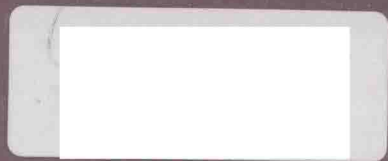
赵中亚

2016.02.14

风韵是那前代流传至今的风尚和韵致。词有流风余韵，风韵犹存。

沁河是山西的一条母亲河。沁河流域有其特有的风尚和韵致，

那悠久而深厚的历史文化传统，至今依然风韵犹存。



上架建议：宗教·文化

ISBN 978-7-203-09612-2



9 787203 096122 >

定价：45.00元